

南北朝彌勒圖像與信仰

李玉珉
國立故宮博物院
書畫處

提 要

南北朝時期，彌勒信仰流行，彌勒造像數量可觀，圖像樣貌繁雜。本文從區域研究的的角度出發，運用藝術史圖像學與圖像結構學的方法，結合造像題記和歷史文獻，來討論南北朝的圖像發展、地域特色、圖像源流和流傳、信仰內涵等問題。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對中國早期的彌勒圖像影響深遠，但到了北魏中、晚期，彌勒信仰鼎盛一時，不但造像數量可觀，圖像也變化多端，其中不乏中國自創的彌勒圖像。同時，本研究亦發現，南北朝各地流行的彌勒圖像，不但南、北兩方不同，太行山的東、西兩地也有別。最後，本文根據彌勒像的配置、圖像特徵、題記稱名和祈願內容等，指出南北朝彌勒信仰雖有上生與下生之說，但二者的目標實無軒輊，殊途同歸。

關鍵詞：南北朝、南朝、北朝、彌勒信仰、彌勒圖像、區域研究

前言

彌勒的巴利文為 Metteya，梵文作 Maitreya，意譯為慈氏。彌勒是吐火羅語 Metrak 的音譯。¹ 祂一方面將在釋迦牟尼佛之後，於久遠的未來成佛，故稱為「未來佛」；另一方面祂又是在兜率天宮內院說法的一生補處菩薩，故彌勒在佛教藝術中可以佛和菩薩兩種形象出現，極為特殊。

彌勒信仰興起於何時？目前無從查考，不過從現存大量西元一至三世紀的犍陀羅（Gandhāra）和秣菟羅（Mathurā）的彌勒造像來看，貴霜王朝時（Kushan Empire，西元一世紀至四世紀初）祂的信仰在印度已普遍流行。隨著佛教的東傳，彌勒信仰在西晉時（265-316）已傳入中土。四世紀初竺法護翻譯了《彌勒成佛經》和《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² 兩部重要的彌勒系經典，奠定了中國彌勒信仰的基礎。道安（312-385）率領弟子僧輔、法遇、曇戒、道願、王嘉等八人，在彌勒像前立誓往生兜率天瞻仰彌勒，³ 更為中國彌勒信仰的嚆矢。⁴ 清末端方的《陶齋吉金錄》收錄了一件北魏徐常樂造銅菩薩像，⁵ 該像的造像記云：「登國五年（390）三月三日，佛弟子徐常樂為合門大小，敬造彌勒像一區供養。」⁶ 此像是四世紀彌勒信仰流傳的一個實證。五世紀初，鳩摩羅什（343-413）在長安先後譯出《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和《佛說彌勒大成佛經》；⁷ 劉宋孝武帝時（452-464）沮渠京聲在建康（今南京）翻譯了《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⁸（以下簡稱《彌勒上生經》），六世紀初菩提流支在洛陽又譯出《彌勒菩薩所問經》和《彌勒菩薩所問經論》，⁹ 與彌勒信仰有關的重要經論至此已大抵翻譯完成。此外，兩晉（265-420）與南北朝（420-589）流行的佛教經典，如《法華經》、《觀佛三昧海經》、《禪秘要法經》、《五門禪經

1 季羨林，〈梅呾利耶與彌勒〉，收入《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頁 278-290。

2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錄〉，頁 32、36-37。根據《歷代三寶記》，竺法護於西晉太安二年（303）完成《彌勒成佛經》的翻譯工作。（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六，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第 49 冊，頁 63 上。）

3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五，〈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傳〉，頁 183；寶亮，《名僧傳抄》〈道安傳〉，收入藏經書院編輯，《卅續藏經》，第 134 冊，頁 12 下 -13 上。

4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217-219；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 1 卷，頁 365-366。

5 端方，《陶齋吉金錄》，卷八，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 7 冊，頁 5726。

6 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頁 173。

7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錄〉，頁 50；根據《歷代三寶記》，鳩摩羅什於弘始四年（402）完成《彌勒成佛經》的翻譯工作。（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八，收入《大正藏》，第 49 冊，頁 78 上。）

8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錄〉，頁 61。

9 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九，收入《大正藏》，第 49 冊，頁 86 上。

要用法》等，又屢屢提及，若依法讀誦、修持，或可往生兜率天面觀彌勒，或在來生參與龍華三會，聽聞彌勒佛宣說法要，證得佛果，¹⁰ 這些經典在南北朝彌勒信仰的傳播上也具推波助瀾之效。

隨著彌勒信仰的流行，中國人也開始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編纂彌勒偽經，在一般平民百姓間廣為流傳，使得彌勒信仰更深植民心。僧祐（445-518）在《出三藏記集》〈疑經偽撰雜錄〉中，已列有《彌勒下教經》一卷，¹¹ 此乃文獻記載中最早的一部彌勒偽經。到了隋代（581-618），法經《眾經目錄》（594年撰成）載錄與彌勒信仰有關的偽經，已增至四部之多，分別為《彌勒下教經》一卷、《彌勒成佛本起經》十七卷、《彌勒下生觀世音施珠寶經》一卷和《彌勒成佛伏魔經》一卷。¹² 雖然這些偽經現已不存，但從經名來看，都和彌勒下生成佛，為眾生除厄解災的觀念有關。¹³ 這種救濟思想對南北朝長期處於戰亂的人民來說，深具心靈撫慰的效果，自然也促進了彌勒信仰的流行。北魏延昌四年（515），沙門法慶在冀州（轄境為今河北省中南部、山東省西端及河南省北端）聚眾造反，自稱「大乘」，打著「新佛出世，除去舊魔」的口號，大肆殺戮。¹⁴ 口號中的「新佛」，無疑指的就是從兜率天宮下生閻浮提的未來佛——彌勒。由於在傳世的彌勒經典裡並未發現彌勒掃魔之說，推測這一口號很可能受到當時所流傳《彌勒成佛伏魔經》這部偽經的啟發。¹⁵

道宣的《釋迦方志》（650年撰成）云：「自晉、宋、梁、陳、魏、燕、秦、趙，國分十六，時經四百，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獲其將救者，不可勝紀。」¹⁶ 顯然南北朝時，彌勒信仰已十分隆盛。此外，南北朝的造像題記也頻頻提到「值遇彌勒」、「龍華三會，願登初首」、「俱登三會」、「彌勒下生，龍華三會，聽受法言」、「面奉彌勒，常聞正法」等與彌勒信仰相關的詞語；同時，在中國各地的石窟與世界各博物館裡，又保存著大量南北朝的彌勒造像，這些都是當時彌勒信仰盛行的具體證明。

10 王裕昌、魏文斌，〈麥積山早期洞窟的彌勒造像與信仰〉，《敦煌研究》，2010年3期，頁39-40。

11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頁225。

12 法經，《眾經目錄》，卷二，〈眾經偽妄六〉，收入《大正藏》，第55冊，頁126下。

13 張淼，〈佛教“疑偽經”與彌勒信仰——以佛教經錄為中心的考察〉，《宗教研究》，2006年1期，頁173-174。

14 參見魏收，《魏書》，卷九，〈肅宗紀〉，第1冊，頁222-223；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列傳〉，第2冊，頁445-446。

15 唐長孺，〈北朝的彌勒信仰及其衰落〉，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203-205。

16 道宣，《釋迦方志》，卷下，收入《大正藏》，第51冊，頁972中。

南北朝時期，不但彌勒造像的數量可觀，圖像樣式也變化多端，很早就引起學界的注意，1904年起釋清潭發表了一系列的〈彌勒菩薩形象考〉，¹⁷ 探討中國南北朝至唐代（618-907）彌勒圖像的變化，乃中國彌勒圖像研究的肇端。回顧過去這一百餘年，許多學者如 Max Wagner、¹⁸ Alexander Soper、¹⁹ Rei Sasaguchi、²⁰ 本人、²¹ 石松日奈子、²² 肥塚隆、²³ 劉鳳君、²⁴ 許湘苓²⁵ 等都曾進行南北朝彌勒圖像的探討，在南北朝彌勒圖像的特徵、來源和演變上，積累了豐碩的研究成果。²⁶ 不過，迄今學界在部分南北朝彌勒圖像的辨識上仍無共識，例如有的學者認為半跏思惟菩薩像當代表彌勒，²⁷ 有的則主張應是悉達多太子；²⁸ 有的學者以為交腳佛當是彌勒，²⁹ 有些則主張應為釋迦；³⁰ 有的學者認為南北朝的倚坐佛應被視為彌勒，³¹ 有些則主張部分為釋迦，部分代表彌勒。³² 筆者認為造成這些分歧的原因，是由於學者們沒有考慮到中國幅員遼闊，各地佛教圖像的發展並不一定同步，某一種圖像在甘陝地區可能代表某一尊佛或菩薩，但在另一個地區則可能另有所指。因此，本人試圖從區域研究的角度出發，一方面探索南北朝時期各地區彌勒圖像的特徵和發展

17 釋清潭，〈彌勒菩薩形象考〉，《國華》，第 175 號，頁 139-144；第 176 號，頁 153-158；第 178 號，頁 191-200。

18 Max Wagner, "Ikonographie de chinesischen Maitreya,"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vol. 15 (1929), pp. 156-178, 216-229, 252-270.

19 Alexander C. Soper, *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 pp. 211-219.

20 Rei Sasaguchi, "The Image of the Contemplating Bodhisattva in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21 Yu-Min Lee,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83.

22 石松日奈子，〈中國交腳菩薩像考〉，《佛教藝術》，第 178 號，頁 55-83；石松日奈子，〈彌勒像坐勢研究——施無畏印・倚坐の菩薩像を中心に〉，《Museum》，第 502 號，頁 4-26。

23 肥塚隆，〈莫高窟第 275 窟交腳菩薩像與犍陀羅的先例〉，《敦煌研究》，1990 年 1 期，頁 16-24。

24 劉鳳君，〈山東省北朝觀世音和彌勒造像考〉，《文史哲》，1994 年 2 期，頁 48-53。

25 Eileen Hsiang-lin Hsu, "Visualization Meditation and the Siwei Icon in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Artibus Asiae*, vol. 62 (2002), pp. 5-32.

26 與彌勒信仰和圖像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尚可參見王惠民，〈彌勒信仰與彌勒圖像研究論著目錄〉，《敦煌學輯刊》，2006 年 4 期，頁 173-184。

27 裴建平，〈西安碑林藏北魏佛龕像考釋〉，《碑林集刊》，第 7 期，頁 116；趙超，〈略談中國佛教造像中彌勒佛形象的演變〉，《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 2 期，頁 8-9。

28 李靜杰、田軍，〈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 年 3 期，頁 79；金申，〈談半跏思惟菩薩像〉，《中國歷史文物》，2002 年 2 期，頁 79。

29 Yu-Min Lee,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pp. 288-290；趙超，〈略談中國佛教造像中彌勒佛形象的演變〉，頁 6。

30 東山健吾，〈敦煌莫高窟北朝期尊像の圖像的考察〉，《東洋學術研究》，24 卷 1 期，頁 86-91。

31 Yu-Min Lee,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pp. 286-288.

32 金申，〈榆林發現的劉宋金銅佛像質疑〉，《文物》，1995 年 12 期，頁 61；東山健吾，〈敦煌莫高窟北朝期尊像の圖像的考察〉，頁 94-95。

脈絡，另一方面也嘗試考察各種彌勒圖像的傳播路線，希望能夠釐清中國早期彌勒圖像研究上的一些困擾。同時，在此研究基礎上，結合造像題記、佛教經論、歷史文獻等資料，筆者也擬說明南北朝彌勒信仰的內涵。

一、彌勒圖像的區域研究

根據筆者收集的兩晉、南北朝造像題記，確認造像為彌勒者有一百三十餘尊；依圖像特徵、石窟內窟龕的尊像配置關係等，考訂為彌勒者更多達四、五百尊。分布的地區廣濶，西至現在的甘肅，東至山東，西南至四川，東南至浙江皆有發現。雖然作者深知，現存的彌勒像恐不及當時所雕造鑄作的萬分之一，甚至於百萬分之一，實不足以反映南北朝彌勒圖像的全貌，但筆者以為若仔細檢視、比較各地區的彌勒圖像，仍有助於一些問題的釐清。

由於南北朝時期，各國的疆域與州郡轄區時有更動，為了討論上的方便，在南北朝部分，筆者的論述將依現行的行政區來進行。不過寧夏、遼寧二地所存北朝彌勒龕像的數量不多，無法對該地彌勒圖像的發展作系統性的整理與整體的觀照，故本文將不討論。在南朝方面，因為彌勒造像的遺存數量稀少，且多集中於四川地區，故本文的論述將結合文獻與實物一同討論，但不進行區域分析。

（一）甘肅

甘肅省與新疆毗鄰，東西長達一千六百餘公里，位於北朝疆域的最西側，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東段。西漢張騫通西域以後，此地即成為中原與西域陸路交通的必經之地，也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重要孔道。十六國時期，河西地區先後被前涼（313-376）、後涼（386-399）、西涼（400-421）、南涼（397-414）和北涼（397-439）五個王國所統治。五涼君主大多崇信佛教，在他們的積極護持下，佛教迅速發展。現存最早的漢譯彌勒經典，便出自世居敦煌的竺法護（西元三至四世紀）之手，在北涼的寫經或造塔題記上，又屢屢發現「將來之世，值遇彌勒」、³³「捨身彌勒菩薩前」、³⁴「捨身受身，值遇彌勒」³⁵等字句；甘肅石窟也保存了許多五、六世紀的中國

33 北涼丙寅歲（426）和丁卯歲（427）的〈優婆塞戒經後記〉，見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九〈優婆塞戒經記〉，頁341；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頁83。

34 《佛說首嚴三昧經》卷末太緣（太延）二年（436）令狐廣嗣和史良奴的題記，見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頁84。

35 北涼緣禾三年（434）〈白雙旦造塔題記〉，見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頁31。

彌勒龕像。十六國至北周（557-581）時期，彌勒信仰在甘肅地區顯然廣泛流行。

甘肅永靖炳靈寺第 169 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紀年洞窟，在該窟的壁畫中，就發現兩身彌勒菩薩像，一身畫於第 6 龕北側的壁面上，該尊菩薩上身袒露，肩披天衣，右手上舉至胸，可能作施無畏印，左手手肘微彎，下垂至胯部。由於壁畫剝蝕嚴重，無法判識其手印與持物，但祂頭光右側則墨書「彌勒菩薩」³⁶四字。第 6 龕有西秦建弘元年（420）的墨書題記，此尊彌勒菩薩像的繪製時間當與之相去不遠。此外，在該窟北壁上還發現一身交腳菩薩像（圖 1），其頭戴寶冠，僅著下裙，上身全袒，雙手在胸前作轉法輪印。交腳坐姿和轉法輪印是犍陀羅（圖 2）和中亞彌勒菩薩（圖 3）重要的圖像特徵，炳靈寺第 169 窟的這身交腳菩薩像也當代表彌勒菩薩無疑。

佛經記載，彌勒是繼承過去六佛以及現在佛釋迦牟尼的法統、未來將下生閻浮提的未來佛，在印度貴霜王朝的造像裡便發現不少未來佛彌勒以菩薩形象和七佛並列的三世佛浮雕。³⁷在甘肅發現的北涼石塔也保存了這樣的造像傳統。

現在已知的北涼石塔計 13 座，³⁸除了在新疆吐魯番發現的 2 座外，其他的 11 座皆發現於河西走廊。其中，6 座在酒泉發現，4 座在敦煌出土，1 座（圖 4）收藏於武威市博物館。除武威市博物館的石塔外，其他的 12 座北涼石塔皆由八角形塔基、圓柱形塔基、覆鉢塔身和塔剎四部分組成，且覆鉢塔身均雕 8 個佛龕。在這些北涼石塔裡，承玄二年（429）的田弘塔塔身殘損殘嚴重，彌勒菩薩像已經不存；緣禾三年（434）白雙且塔的塔身則分為上下兩層（圖 5、5A），每層皆開 8 龕，第一層開 6 個坐佛龕和 2 個菩薩龕，第二層雕 7 個坐佛龕和 1 個菩薩龕；其餘諸塔的塔身皆雕 7 個坐佛龕和 1 個菩薩龕。敦煌出土的□吉德塔的尊像旁尚見「第二式佛」、「第三隨葉佛」、「第四句留秦佛」、「第七釋迦牟尼□□」和「彌勒佛」等題名。³⁹從北涼石塔尊像的配置來看，除了白雙且塔外，石塔上所見的菩薩像皆當為彌勒無疑。至於白雙且塔，第二層的交腳菩薩像應代表未來佛彌勒菩薩，而第一層 8 龕中所見的交腳菩薩，坐姿和手印皆與上層的交腳菩薩像完全一致，且又置於第

36 張寶璽主編，《甘肅石窟藝術——壁畫編》，頁 132。

37 參見 Yu-Min Lee,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pp. 169-170, 207-208; Inchang Kim, *The Future Buddha Maitreya*, figs. 7, 23, 49.

38 雖然殷光明與 Standley Abe 皆認為現存的北涼石塔有 14 座，但由於本人對緣禾四年（435）索阿後塔（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的真偽存疑，未將其列入。殷光明與 Standley Abe 的北涼石塔研究，見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Stanley K. Abe, *Ordinary Images*, pp. 103-171.

39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頁 41。

二層交腳菩薩像的正下方，也當是彌勒菩薩。因此，第一層彌勒菩薩右側龕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則應代表悉達多太子。

根據在酒泉、敦煌發現的北涼石塔上所發現 10 尊彌勒菩薩像的圖像特徵，可歸納為四類：

1. 交腳而坐，雙手於胸前作轉法輪印：有 6 例，分別見於白雙且塔第一、二層（圖 5A）、甘肅省博物館所藏的北涼殘塔、⁴⁰ 承玄元年（428）的高善穆塔（圖 6、6A）、太緣二年（436）程段兒塔⁴¹ 和岷州廟塔。⁴²
2. 交腳而坐，右手作無畏印：有 2 例，見於承陽二年（426）的馬德惠塔⁴³ 和王翼堅塔。⁴⁴
3. 結跏趺坐，右手作無畏印，左手置於膝上：僅沙山塔⁴⁵ 1 例。
4. 立像，右手於胸前作施畏印，左手下垂：僅丙寅年（426）□吉德塔⁴⁶ 1 例。

在這 10 尊彌勒菩薩像中，交腳而坐者計 8 尊，雙手於胸前結轉法輪印者又多達 6 尊。此外，在這 6 尊手作轉法輪印的彌勒菩薩像裡，5 尊的身後有靠背。在犍陀羅和中亞，無論是交腳坐姿、轉法輪印、或身後有靠背，都是彌勒圖像的重要特徵。⁴⁷ 由此看來，北涼的彌勒圖像深受西域佛教圖像的影響。

武威市博物館所藏的北涼石塔（圖 4）雖然保存狀況不佳，但在甘肅早期彌勒圖像的研究上至為重要。此塔的塔基為四方形，塔身呈圓錐形，逐層向上收分，塔頂平面作圓形。圓錐形塔身分三層，每層開 8 個圓拱淺龕。雖然此塔的龕像多處風化缺損，但仍依稀可辨第一層為 7 個坐佛龕和 1 個半跏思惟菩薩龕，第二層為 7 個坐佛龕和 1 個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菩薩龕，第三層為 8 個禪定坐佛龕。固然此塔的形制與上述的北涼石塔不類，不過圖像配置的理念一致，尤其是第二層的交腳菩薩像就刻於第一層的半跏思惟菩薩像之上，顯然此塔上所見的半跏思惟像、交腳菩薩像，以至於在交腳菩薩像上方、手作禪定印的結跏趺坐佛像都應視作彌勒。⁴⁸ 學者

40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圖 22。

41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圖 98。

42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圖 107。

43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圖 6。

44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圖 54、58。

45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圖 50。

46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圖 42。

47 圖見 Harald Ingholt, *Gandharan Art in Pakistan*, pl. 285.

48 由於最上層的彌勒佛圖像特徵與過去七佛完全相同，故結跏趺坐、手作禪定印的佛像不能作為甘肅地區辨識彌勒圖像的重要依據。

的研究指出，雖然在印度的貴霜藝術與中亞壁畫中已有半跏思惟像的發現，可是與彌勒菩薩並無關連。⁴⁹ 不過從武威市博物館所藏的北涼石塔觀之，北涼時期半跏思惟菩薩像與彌勒的關係顯然已經確立，反映了佛教美術在地化的發展。

北涼時期開鑿的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以西壁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圖 7）為主尊，祂身後有三角形靠背，台座的兩側各塑一隻獅子，代表獅子座，右手原作施無畏印，今已殘損，左手作與願印。頭戴三珠寶冠，冠的正中央有一尊禪定坐佛，此一圖像特徵在高善穆塔（圖 6A）和沙山塔彌勒菩薩像的頭冠上⁵⁰ 也可發現。早在二世紀時，秣菟羅的彌勒菩薩像就出現了冠有坐佛的圖像特徵，⁵¹ 此又為甘肅早期彌勒圖像受到貴霜藝術影響的具體事證。

至於這些彌勒菩薩像冠中坐佛的尊格為何？雖然有些學者主張其為釋迦佛，⁵² 但筆者認為這尊坐佛代表無數無量化佛的可能性較大。《彌勒上生經》提及在兜率天化生的彌勒菩薩，「其天寶冠有百萬億色，一一色中有無量百千化佛，諸化菩薩以為侍者。」⁵³ 玄奘（600-664）翻譯的《讚彌勒四禮文》又言：「至心歸命禮，當來彌勒佛。慈尊寶冠多化佛，其量超過數百千。」⁵⁴ 這兩段文字皆清楚指出，彌勒寶冠中應有許多「化佛」。雖然上述這些彌勒菩薩的頭冠上僅刻畫一尊坐佛，但實際上這「一尊」卻象徵著「無量百千尊」。⁵⁵

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南、北兩壁，下層畫本生故事與佛傳圖，上層自西而東開鑿二闕形龕和一圓券龕（圖 8、9），闕形龕象徵兜率天宮，龕內皆塑交腳菩薩像，或作轉法輪印，或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代表著在兜率天宮內院說法的彌勒菩薩。從石窟龕像的配置和布局來看，圓券龕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圖 10）也

49 李玉珉，〈「半跏思惟像」再探〉，《故宮學術季刊》，3 卷 3 期，頁 42-45；宮治昭，《涅槃と彌勒の圖像學》，頁 321-348。

50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圖 51。

51 Yu-Min Lee,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fig. 6；宮治昭，《涅槃と彌勒の圖像學》，圖 204；Inchang Kim, *The Future Buddha Maitreya*, fig. 35.

52 Inchang Kim, *The Future Buddha Maitreya*, p. 67; Dorothy C. Wong, "Maitreya Buddha Statu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rientation*, vol. 32, no. 2 (February 2001), pp. 25; Dorothy C. Wong, *Chinese Steles: Pre-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 p. 93.

53 沮渠京聲譯，《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收入《大正藏》，第 14 冊，頁 419 下。

54 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十六，〈敬佛篇·彌勒部〉，第 2 冊，頁 535。

55 本人的博士論文曾指出，彌勒菩薩寶冠中的坐佛應代表法身佛毗盧遮那（Yu-Min Lee,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pp. 164-167），但重新檢視資料，筆者認為過去的解釋失當。

應作彌勒。莫高窟第 275 窟的彌勒菩薩像數量眾多，並以交腳彌勒菩薩像為全窟的主尊，此窟與彌勒信仰關係之密切自不必多言。直到北魏（386-534）晚期，甘肅天水麥積山第 134、169 等窟，仍以交腳彌勒菩薩像作為主尊，北魏時期，彌勒信仰在甘肅佛教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

經調查，敦煌莫高窟現存 23 個交腳彌勒菩薩龕和 5 個半跏思惟彌勒菩薩龕。這些交腳彌勒菩薩像中，除雙手殘損者外，其他諸尊或作轉法輪印，或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在這 28 個彌勒菩薩像龕裡，除第 290 窟中心柱西向面的交腳彌勒菩薩龕為北周之作外，其餘的 27 龕皆出現在北涼或北魏窟內。牠們出現在南北兩壁的上層，如第 275、259 窟；或中心塔柱南、北兩向面的上層，如第 246、251、254、257、260、435 和 437 窟；或人字披的下方，如第 254 窟；或入口上方，如第 431 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龕像都被安置於石窟壁面的上層。同時 27 龕裡，龕形作雙闕形式者更高達 23 個。其中，20 龕內塑交腳菩薩像，3 龕塑半跏思惟菩薩像。凡此種種在在顯示，這些石窟的設計者特別重視彌勒菩薩在兜率天宮內院說法的宗教意涵。

北涼與北魏時期，敦煌莫高窟的半跏思惟彌勒菩薩像龕與交腳彌勒菩薩像龕多處於對等的地位，成組出現，類似的布局在天水麥積山的北魏窟中也屢見不鮮。魏文斌的研究指出，北魏早期至景明年間（500-503），天水麥積山石窟流行著交腳彌勒菩薩像和半跏思惟彌勒菩薩像呈左右對稱的組合形式，牠們皆安排於主尊的兩側（圖 11）。依其在洞窟出現的位置，魏文斌將這種組合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交腳和思惟菩薩均對稱地造於正壁上方兩側近頂部的圓拱形龕內。第二階段：交腳和思惟菩薩雖對稱地造於正壁上方兩側近頂部的龕內，不過開始出現交腳或思惟菩薩在上，釋迦、多寶二佛並坐或一佛在下的組合。第三階段：此時的交腳或思惟菩薩雖仍以對稱形式出現，不過有些已不在壁面的最上層，而是降到第二層。同時，魏文斌又指出，在麥積山石窟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中的交腳彌勒菩薩像雙手皆在胸前作轉法輪印。直到第三階段，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始逐漸普遍。這種配置對稱的形式主要流行於北魏早、中期的洞窟，北魏晚期較少，之後便消失。⁵⁶ 實際上，自西魏（535-556）始，在敦煌莫高窟裡也不再發現半跏思惟彌勒菩

56 魏文斌，〈麥積山石窟交腳與半跏思惟菩薩對稱構圖的研究〉，收入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麥積山石窟研究》，頁 69-85。魏文斌在該研究中指出，麥積山石窟的半跏思惟菩薩與交腳菩薩這種對稱布局的形成，最初的祖型應該是犍陀羅。由於在犍陀羅造像中尚未發現半跏思惟形式的彌勒菩薩像，所以在這一點上，筆者並不同意魏文斌先生的觀點。

薩像龕和交腳彌勒菩薩像成對的組合。此現象說明，甘肅的東、西兩地，彌勒圖像的發展大體同步。

在甘肅北魏彌勒圖像的研究中，金塔寺石窟特別值得注意。金塔寺石窟位於張掖市南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境內的臨松山上，目前僅存東、西兩窟。據研究，東窟約開鑿於五世紀六〇年代，西窟則開鑿於五世紀的七〇年代或稍晚。⁵⁷ 這兩個石窟皆為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分三層，下層每面開一大龕，每龕的主尊都為結跏趺坐佛像。東窟中心柱的上層為十方佛與天宮供養菩薩；中層每面均開三龕，除了南向面為元代補塑，在此不論外，西向面三龕的主尊分別為釋迦牟尼苦行像、交腳佛坐像和禪定佛坐像；北向面三龕的主尊皆為禪定坐佛；東向面三龕的主尊為禪定坐佛、交腳佛和禪定坐佛。此三龕的大小相近，又無主從之分，從其設計意念來分析，金塔寺東窟的中層三龕可能皆代表三世佛。因此推測，西向面和東向面的交腳佛可能為未來佛彌勒。西窟中心柱的上層塑天宮菩薩，中層並不開龕，除了南向面的主尊已重塑改造外，其他三向面的主尊分別為半跏垂足菩薩坐像（圖 12）、交腳佛坐像（圖 13）和倚坐佛像（圖 14）。這尊半跏垂足菩薩像的坐姿與半跏思惟像的姿勢相同，可是祂的右手並不作支頤的思惟狀，而作施無畏印，這種形象雖與敦煌或麥積山石窟所見的彌勒半跏思惟像略有不同，應可視為彌勒半跏思惟像的變形。又因西窟中心柱上所見的交腳佛，與東窟的交腳彌勒佛圖像雷同，故也可視作彌勒。至於倚坐佛，北魏中期以來，在雲岡石窟便出現彌勒佛倚坐像（詳見下論），同時考量此窟中心柱中層各尊像的組合關係，筆者認為這尊倚坐佛像很可能代表彌勒。由此觀之，金塔寺西窟與彌勒信仰的關係十分密切。⁵⁸ 只是金塔寺西窟的兩尊彌勒佛像，其雙手或殘毀、或後補，無法知曉原來的手印為何，推測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可能性很大。

不過在此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並非甘肅石窟中所有的交腳佛和倚坐佛皆代表彌勒。以敦煌為例，東山健吾的研究指出，在敦煌莫高窟 30 個北朝窟中，以交腳佛為主尊者有第 268 窟（北涼窟）和 254 窟（北魏窟）兩窟，以倚坐佛為主尊者則多達 24 窟。仔細考察這些石窟的尊像和壁畫的配置關係，他認為敦煌莫高窟的北朝洞窟中作為主尊的交腳佛和倚坐佛皆當代表釋迦佛。⁵⁹ 換言之，甘肅北魏的交腳

57 李玉珉，〈金塔寺石窟〉，《故宮學術季刊》，22 卷 2 期，頁 45。

58 Angela F. Howard, "Liang Patronage of Buddhist Art in the Gansu Corridor during the Fourth Centu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entral Asian Style," 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的宗教藝術與考古》，頁 260-262；李玉珉，〈金塔寺石窟〉，頁 45-54。

59 參見東山健吾，〈敦煌莫高窟北朝期尊像の圖像の考察〉，頁 86-96。

佛和倚坐佛，有時代表釋迦，有時又作彌勒。據觀察，在甘肅這兩種圖像大多代表釋迦，僅有少數幾例較確定與彌勒有關，除了西塔寺西窟之例外，尚有麥積山石窟第 133 窟 16 號造像碑⁶⁰下層的三佛龕，該龕的中央為右手施無畏印的倚坐佛，左右各有一趺坐佛，由於這三尊坐佛代表著三世佛，因此居中的倚坐佛可能也代表著彌勒。

前文已述，七佛與一菩薩的三世佛圖像傳統早在北涼時期即已傳入甘肅，六世紀初，在隴東還保存了這種三世佛的造像傳統，不過在圖像的配置上更為複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開鑿於永平二年（509）的慶陽北石窟寺第 165 窟和開鑿於永平三年（510）的涇川南石窟寺第 1 窟。此二窟皆為涇州刺史奚康生所創建。北石窟寺第 165 窟高 14 公尺，寬 21.7 公尺，深 15.7 公尺；南石窟寺第 1 窟高 11 公尺，寬 18 公尺，深 13.2 公尺，規模宏偉壯觀。二窟的平面皆呈橫長方形，正壁及左右兩壁雕七尊立佛，入口兩側則各雕一尊菩薩坐像。⁶¹根據石窟尊像的配置，這兩窟入口兩側的菩薩像都應代表彌勒。南石窟寺第 1 窟入口兩側的菩薩像，皆交腳而坐，右手作施無畏印，圖像特徵與許多甘肅五世紀的彌勒菩薩像一致。北石窟寺第 165 窟入口北側的彌勒菩薩像也是交腳而坐，右手作施無畏印，不過入口南側的彌勒菩薩像（圖 15）雖然右手也作施無畏印，但其雙腿下垂，兩足的腳踝並未交叉，而採倚坐的姿勢。北魏晚期，這種彌勒圖像出現後，漸漸流行。甘肅省博物館藏所藏的王令猥等造像碑，碑陰（圖 16）的主龕內雕倚坐菩薩三尊像，中尊菩薩的右手也作施無畏印，圖像特徵與北石窟寺第 165 窟的彌勒菩薩倚坐像雷同，該造像碑的造像題記云：

建德二年（573）歲次癸巳五月丙寅朔，正信佛弟子堡主王令猥……敬造石塔壹區，高四尺，彌勒壹堪（龕）、釋迦門（文）壹堪（龕），前有二獅子。伏令忘（亡）息等神生淨土，值遇諸佛，龍花三會，願在祈首，合家眷屬，一年以來，百年以還，眾災消滅，含生之類，普同斯願。⁶²

足見，此碑碑陰主龕的倚坐菩薩即為彌勒，而題記所言之「龍花三會，願在祈首」更證明此碑像與彌勒信仰息息相關。此例亦可作為比定北石窟寺第 165 窟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菩薩為彌勒的一個佐證。

60 張寶璽，《甘肅佛教石刻造像》，圖 163；天水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圖 101。

61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慶陽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編，《隴東石窟》，圖 22-28、90-94。

62 此則題記參考《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和《甘肅佛教石刻造像》二書的錄文，重新校訂。參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 291；張寶璽，《甘肅佛教石刻造像》，頁 218。

依據圖像特徵，除了右手作施無畏印、結跏趺坐的彌勒菩薩像僅發現 1 例，不予討論外，甘肅北涼和北魏主要的彌勒圖像可分為八類：（一）右手作施無畏印的菩薩立像，（二）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菩薩坐像，（三）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菩薩坐像，（四）半跏思惟菩薩像，（五）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菩薩像，（六）冠有化佛的菩薩像，（七）交腳佛坐像，以及（八）佛倚坐像。其中第一、二、六類出現的時間最早，第五類出現的時間最晚，第二、三和四類最為常見。而第一類的彌勒像僅見於炳靈寺第 169 窟和敦煌出土的北涼口吉德造石塔。第六類冠有化佛的彌勒菩薩像，在北涼時期即已出現，但在甘肅的北魏造像裡卻消失無蹤。此外，在甘肅石窟中，目前僅能確認金塔寺東、西兩窟的交腳佛和倚坐佛與彌勒有關，其他洞窟中的交腳佛或倚坐佛則代表釋迦的可能性較高。因此整體而言，十六國、北魏時期，甘肅的彌勒佛像的數量遠遜於彌勒菩薩像。除此之外，在隴東地區尚發現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佛像和兼具菩薩和佛像兩種特徵的彌勒像，其圖像體系與甘肅系有別，而與陝西的彌勒圖像關係密切（詳見下論）。

西魏、北周時期，甘肅彌勒造像的數量銳減，不但石窟中鮮少發現祂的蹤跡，即使在傳世和出土的單尊造像裡，彌勒像的數量也不多。同時，此時彌勒圖像種類大幅度減少，僅見上述第三類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菩薩坐像和第五類右手作施無畏印倚坐彌勒菩薩像兩種。

表一 甘肅十六國與北朝彌勒圖像流傳時間表

品名	圖像特徵		420 440 460 500 535 550 581 
	姿勢	手印或持物	
彌勒菩薩	立姿	右手施無畏印	—
	交腳坐姿	轉法輪印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半跏垂足	思惟相	
	倚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冠有化佛		
彌勒佛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倚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1. 此表僅為示意圖，在此示意圖中，黑色線條代表這類造像的數量多，為當時的主流類型；灰色線條代表這類造像的數量少，為當時的非主流類型。
2. 僅發現 1 例者，本表不列。

(二) 陝西

長安是佛教東傳的重要門戶，據湯用彤的考證，西晉太始二年（266）至四世紀初，竺法護時常往來於長安（今陝西西安）、敦煌、酒泉、洛陽之間，曾在長安翻譯多部佛經，⁶³並於長安青門外建立佛寺，「精勤行道，德化四布，聲蓋遠近，僧徒千數，咸來宗奉。」⁶⁴帛法祖也「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帝（290-306 在位）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⁶⁵太元四年（379）道安又應前秦苻堅之請，赴長安弘法。道安在長安居住的六年期間，不但講經說法，更參與譯經工作，研覈經義理趣，校正經文。⁶⁶三、四世紀時，長安顯然已是中國北方佛教的重鎮。後秦姚興（366-416）崇尚三寶，弘始三年（401）自涼州迎請鳩摩羅什入關，並待之以國師之禮。在姚興的支持下，長安佛教大興，「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⁶⁷從鳩摩羅什入關至遷化（401-413），他在長安翻譯的經論就達三百餘卷，其中包括了《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和《佛說彌勒大成佛經》這兩部彌勒系經典；同時，當時從其習佛的門徒更多達數千名，義學名僧群聚長安，法筵之盛，震鑠古今。

四、五世紀在長安活動的名僧中，竺法護和鳩摩羅什翻譯了多部彌勒經典，道安又篤信彌勒，立誓往生兜率天。在他們的推動下，關中地區的彌勒信仰想必相當興盛。

鳩摩羅什亡歿後，關中混亂，他的徒眾四散。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蓋吳在杏城（今陝西黃陵縣）起義，太武帝（424-452 在位）出兵鎮壓。次年，在長安佛寺中發現大批兵器、釀酒用具、地方官員和富豪寄託的財物等，又發現僧侶與女子私通，大為震怒，便接受崔誥的建議，「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⁶⁸正式敕命廢佛。長安為北魏滅佛的發難之地，該地的佛教自然遭到嚴重地破壞。《南齊書》提到：「初，佛狸（即北魏太武帝）討羯胡於長

63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158-163。

64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三，〈竺法護傳〉，頁 518。亦參見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一，〈晉長安竺曇摩剎傳〉，頁 24。

65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一，〈晉長安帛遠傳〉，頁 26。

66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196-197。

67 房玄齡，《晉書》，卷一一七，〈姚興傳上〉，第 4 冊，頁 2985。

68 魏收，《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 8 冊，頁 3034。

安，殺道人且盡。」⁶⁹ 足見當時長安佛教的元氣大傷。

由於太武帝的廢佛，現存的陝西早期佛教造像極為稀少，但在京都藤井有鄰館的收藏中，發現一尊陝西三原出土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的金銅彌勒菩薩立像（圖 17）。這尊金銅菩薩像頂有高髻，長髮披肩，唇上有髭，上身全袒，胸佩兩重璎珞，戴臂釧，肩披天衣，下著長裙，足穿草履，造像風格明顯受到犍陀羅菩薩像的影響。唯此菩薩立像的頭手比例較大，肌理處理不似犍陀羅菩薩像那麼壯實，推測出自中土匠師之手。這尊菩薩像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下垂持淨瓶，圖像特徵與犍陀羅的彌勒菩薩像（圖 18）如出一轍，犍陀羅應是關中這類彌勒菩薩圖像的祖源。此外，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德國科隆東亞藝術館的收藏中，也各發現一尊類似的彌勒菩薩像。⁷⁰ 從其風格觀之，也應是三至四世紀的作品，只可惜二者的出土地均不可考。

西安西郊出土的一件菩薩五尊龕像（圖 19），為五世紀五〇年代前後的作品，正面大龕的主尊菩薩交腳坐在束帛座上，腳的兩側各蜷伏著一隻獅子。其雙手交疊於胸前，這種手印雖與典型的轉法輪印略有出入，但應為其變形。有趣的是，這種雙手交疊式的轉法輪印僅在陝西北魏的彌勒造像上始有發現，頗具地方特色。由於這尊菩薩的圖像特徵與犍陀羅彌勒菩薩像（圖 2）雷同，當作彌勒菩薩。此龕像背面浮雕睺子本生故事和佛傳圖。⁷¹ 結合此龕像正反兩面的圖像，全作將現在佛釋迦和未來佛彌勒佛法傳承的意旨盡表無遺。這尊交腳彌勒像的左右各雕一半跏思惟菩薩像和一脇侍菩薩立像。前文已述，在甘肅，半跏思惟菩薩像有時代表彌勒菩薩，有時又可以比定為悉達多太子，那麼此龕像中兩尊半跏思惟菩薩像的尊格為何？因彌勒菩薩為一生補處菩薩時，釋迦牟尼佛已經入滅，以悉達多太子作為未來佛彌勒的脇侍，於理不合，故筆者以為這兩尊半跏思惟菩薩像可能代表主尊彌勒菩薩的化現。⁷² 只是在陝西的北朝窟龕造像裡，筆者僅在這件菩薩五尊龕像上發現與彌勒信仰有關的半跏思惟菩薩像，且其並非龕像的主尊，而是以主尊化現的身分出現，顯然其重要性無法與甘肅地區的彌勒半跏思惟像相提並論。

69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第 3 冊，頁 990。

70 孫迪，〈日本藏傳陝西三原出土西晉十六國金銅彌勒菩薩立像〉，《文物》，2006 年 5 期，圖 4、7。

71 裴建平，〈西安碑林藏北魏佛龕像考釋〉，《碑林集刊》，第 7 期，頁 114-119。

72 裴建平的研究也指出，這兩尊半跏思惟菩薩像與主尊彌勒之間一定存在某種聯繫，牠們的身分與彌勒是沒有區別的。（見裴建平，〈西安碑林藏北魏佛龕像考釋〉，頁 116。）雖然我們二人的結論相同，可是推論的過程並不一致。

自五世紀中葉至北魏末，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在陝西十分流行，分布的地區廣闊，除了關中以外，北至洛川，西至長武，都可以發現這種彌勒菩薩像。不過，北魏以後，在陝西的造像中就再未發現以這種彌勒像作為主尊的佛龕、碑像，重要性顯然大幅度地減弱。此外，在現存的陝西造像中，也發現少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如陝西歷史博物館所藏神平三年⁷³（530）的彌勒菩薩坐像⁷⁴（圖 20），不過這些作品皆為北魏晚期之作。

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博物館的收藏中，有一件北魏和平元年（460）比丘法亮造金銅坐佛三尊鎚鑄像，⁷⁵此作的主尊為一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的結跏趺坐佛，左右各有一脇侍菩薩。該像的題記稱這尊坐佛為彌勒。⁷⁶張秩瑋根據西安西郊出土的一件太和七年（484）追遠寺眾僧造金銅坐佛三尊鎚鑄像，指出和平元年的法亮造彌勒佛三尊鎚鑄像和大阪市立美術館所藏的延興四年（474）比丘尼□□造釋迦佛三尊鎚鑄像⁷⁷都應是陝西之作。⁷⁸雖然和平元年和延興四年鎚鑄像的主尊坐佛手印和姿勢皆相同，而且風格、尺寸與構圖也都一樣，不過根據題記，二者的稱號卻有別，這一現象正應證了侯旭東所言：「因銅像假手工匠鑄造於作坊，又多為模鑄，可較大批量生產，更易於進入市場流通。銅像亦是製作完工再刻簡短記文，應是有了買主以後才刻。」⁷⁹由於這類造像可能具有佛事商品的性質，主尊的尊格依購買者的信仰需要而題刻，故本文不視比丘法亮造彌勒坐佛三尊鎚鑄像為陝西彌勒圖像的典型。

陝西興平縣出土的一尊皇興五年（471）清信士京□□造的交腳佛坐像（圖 21），其髮作大漩渦狀，長耳垂肩，兩頤豐腴，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於胸前交疊作轉法輪印，交腳而坐，腳下尚有一項有圓光的地神托足。⁸⁰背屏後剔地雕儒童本生和佛傳圖。該像的台座背面雖刻有造像記，可惜並未提及主尊的名號。不過這種

73 北魏建義元年（528）萬俟醜奴在高平（今寧夏固原）自稱天子，年號神平。

74 此像的題記云：「神平三年三月八日，清信弟子楊伏生敬造彌勒金像一區（軀）。憑此後（厚）福，願四大康寧，眷屬家潤；飛妖橫禍，永相離遠。一切有生，皆蒙此願。」見朱捷元，〈“神平三年”楊伏生造鑿金彌勒銅像〉，《文物》，1979 年 7 期，頁 80。

75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一〉，圖 33a。

76 此鎚鑄像的題記云：「和平元年，比丘法亮為父母造彌勒像，願與一切眾生□成佛道。」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 246。

77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中國古式金銅仏と中央・東南アジアの金銅仏〉，圖錄 57。

78 張秩瑋，〈北魏小金銅佛風格與圖像研究〉，頁 100-103。

79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頁 280。

80 Dorothy C. Wong, *Chinese Steles: Pre-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 p. 96.

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佛像，在陝西北魏中、晚期的造像中時有所見。西安碑林博物館的收藏中，有一尊景明年間（500-503）所雕的交腳佛三尊像⁸¹（圖 22），無論是髮型、袈裟樣式、手印與坐姿等均與皇興五年交腳佛坐像類似，該像台座上的題記言：「清信士劉保生、清信士王媚姜為亡女英洛，敬造彌勒像一區。」⁸²由此可知，在陝西手作轉法輪印、交腳而坐的佛像被視為彌勒佛。和五世紀中葉的菩薩五尊龕像（圖 19）一樣，皇興五年像正反兩面的圖像也在表達現在佛和未來佛間法脈傳承的觀念。西安西關出土的一件北魏晚期的造像碑（圖 23），正面上層龕的主尊頂有肉髻，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交腳而坐，右手作施無畏印。由於施無畏印在北魏時亦具說法的意涵，故這尊交腳佛亦可視為彌勒。只是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佛在陝西並不常見。

除了上述的各種彌勒圖像外，和甘肅地區一樣，西元 500 年左右，陝西也出現了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彌勒菩薩像和倚坐彌勒佛像。法國巴黎居美美術館所藏正始元年（504）的彌勒菩薩倚坐像（圖 24），和皇興五年像（圖 21）一樣，也表現了地神托彌勒雙足的圖像特徵。西安北郊出土的徐安洛造像碑，其側面分為上下兩層龕，上層龕為一菩薩立像，下層龕為一身著袈裟、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撫膝的倚坐佛像（圖 25），下方題刻的造像記部分殘毀，但仍保存了紀年與所造尊像的稱名，云：「景明二年（501）四月……徐安洛敬……彌勒、无量……觀世音……。」明確地稱下層龕的倚坐佛為彌勒。

在陝西的北魏造像中，尚發現數尊兼具佛和菩薩特色的彌勒造像。陝西長武出土的郭伏安造佛三尊像龕（圖 26），龕中的主尊兩手交疊於胸前作轉法輪印，足側尚有兩隻獅子。祂頭戴寶冠，狀似一位菩薩，但又身著袈裟，腰間繫帶，與佛像相彷彿。龕下台座上題刻的造像記言：

延昌二年（513）歲在癸巳十一月辛朔二壬子，弟子郭伏安為己身敬造一石彌勒像一軀（軀）。願心无退轉，志無餘想，龍花（華）三會，願在初首，公（功）菓（果）成就，所願如是。

（右側）清信士郭供養佛時。⁸³

81 這尊造像雖然沒有紀年，但西安碑林博物館的收藏中，有一尊景明三年（502）劉保生造無量壽佛坐像（圖見西安碑林博物館編，《長安佛韻——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 49），風格與這尊劉保生造彌勒像十分近似，推測這尊彌勒像的雕鑿時間大約在景明年間。

82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 259。

83 張燕、趙景普，〈陝西省長武縣出土一批佛教石造像碑〉，《文物》，1987 年 3 期，圖 35，頁 74。

這則題記稱這尊兼具佛和菩薩特徵的交腳像為「彌勒」。此外，陝西華縣瓜坡出土的北魏建明二年（531）朱輔伯造像碑（圖 27）、朱法曜造像碑以及沒有紀年的朱黑奴造像碑，⁸⁴ 正面開龕造像，皆分二或三層。最上層龕的主尊為彌勒菩薩倚坐像，天衣在腹前交叉，穿著長裙，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彌勒像皆不戴冠，而有磨光的肉髻，與佛無異。在陝西，這種兼具佛和菩薩特徵的彌勒造像在關中地區分布甚廣，北至洛川，西至長武皆有發現，但在關中及其鄰近的地區外，卻又不曾發現，極具地方特色。裴建平和趙力光皆認為，這種兼具佛與菩薩特色的彌勒像，融合了彌勒上生和下生信仰的元素，達到兼而信之的目的。⁸⁵ 雖然早在貴霜王朝時，秣菟羅就出現了多尊胸佩瓔珞，頂有螺髮，身著袈裟，兼具佛與菩薩兩種圖像特色的彌勒像；⁸⁶ 在五世紀下半葉開鑿的阿姜塔石窟第 17 窟入口門楣上方，亦可以發現這種彌勒像，⁸⁷ 不過在中亞、甘肅均未發現這類彌勒菩薩像，同時在北魏早、中期的陝西佛教造像裡也不曾看到祂的蹤跡，關中地區的這類彌勒像可能是出自僧尼、大德的開示，也可能是出自當地匠師的發想。

依據圖像特徵，陝西北魏的彌勒圖像種類可分為七類：（一）雙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菩薩像，（二）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菩薩像，（三）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菩薩像，（四）雙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佛像，（五）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佛像，（六）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佛像，以及（七）兼具佛和菩薩特徵的彌勒像。其中以交腳彌勒菩薩像的數量最多，但第一類出現的時間較第二類早，且數量較多。第四類的彌勒像在北魏中期即已出現，一直流傳至北魏晚期。第五類的彌勒像的數量稀少，僅在北魏晚期始有發現。其中，第四與七類的彌勒像應是陝西地區特有的彌勒圖像。

因為地緣關係，甘肅寧縣出土的一件太和（477-499）晚期的交腳佛三尊像龕，⁸⁸ 身著通肩袈裟，兩手置於胸前，雖然有些殘損，仍知其原來應作雙手交疊的轉法輪印。其頭部較大，衣紋繁密，無論在風格或圖像上皆明顯地受到陝西的

84 西安碑林博物館編，《長安佛韻——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 15、16、20、21。

85 裴建平，〈西安碑林藏北魏朱輔伯造像碑考〉，收入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30-232；趙力光，〈西安碑林藏佛教造像藝術略論〉，《碑林集刊》，第 16 期，頁 3。

86 Inchang Kim, *The Future Buddha Maitreya*, pp. 34-37.

87 肥塚隆、宮治昭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十三卷・インド》，圖版 259。

88 張寶璽，《甘肅佛教石刻造像》，圖 81。

影響。另外，甘肅華亭南川出土的一件北魏晚期造像碑，⁸⁹ 該碑的最下層開兩龕，右側龕以一交腳像作為主尊。祂右手作無畏印，左手撫膝，胸佩瓔珞，肩披天衣，下著長裙，著菩薩裝，不過卻頂有肉髻，狀若一尊交腳佛，圖像特徵與陝西第七類的彌勒像一致。甘肅的寧縣和華亭均位於隴東，地近陝西，北魏時與陝西西部分別屬於豳州和涇州的轄區，故該地的佛教圖像與陝西相關，自不足怪。

在筆者所收集的五十餘件陝西彌勒碑像裡，沒有發現西魏之作，屬北周時期者約佔三分之一，只是在圖像種類上沒有北魏那麼豐富，僅發現三種，分別為上述第二類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菩薩像（圖 28）、第三類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菩薩像（圖 29），以及第六類的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佛像（圖 30），天和元年（566）釋普淨造倚坐佛三尊像的題記明確記載著「敬造彌勒石像一區」，⁹⁰ 更是北周時倚坐佛被視為彌勒的明證。

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的北周天和年間（566-572）造釋迦彌勒四面像（圖 28），此作的圖像配置頗富深意。其正面開兩大龕，下層龕為手作禪定印的釋迦牟尼佛三尊像，在兩脇侍菩薩的上方各有一尊半跏思惟菩薩像，作為主尊釋迦牟尼佛的化現；換言之，這兩尊半跏思惟菩薩像可比定為悉達多太子。上層龕是彌勒三尊像，中央的彌勒菩薩頭戴寶冠，胸佩瓔珞，右手作施無畏印，交腳而坐。引人注意的是，在兩脇侍比丘的上方各有一尊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菩薩像，二者當可視作主尊彌勒菩薩的化現。由此觀之，北魏時期所流行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雖然在北周的佛教造像裡不再作為主尊，但此圖像的意涵並沒有被人們完全遺忘。

89 張寶璽，《甘肅佛教石刻造像》，圖 118。

90 該像乃日本私人所藏，其題記云：「維周天和元年歲次丙戌七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顯蔭寺比丘尼普淨，仰為國主、師僧、父母、檀越、因緣眷屬、四生眾生，敬造彌勒石像一區。（以下題名不錄）。」（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 292；圖見同書，〈圖版二〉，圖 364a。）雖然該像的出土地不明，可是從造像風格來看，應為陝西之作。

表二 陝西北朝彌勒圖像流傳時間表

品名	圖像特徵		420	440	460	500	535	550	581
	姿勢	手印或持物							
彌勒菩薩	交腳坐姿	轉法輪印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倚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彌勒佛	交腳坐姿	轉法輪印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倚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彌勒像	兼具佛與菩薩雙重特徵								

(三) 山西

西晉覆滅以後，中原戰亂頻仍，西元 386 年，拓跋珪糾合舊部，恢復代國，同年改國號曰「魏」。天興元年（398），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並即帝位，是為魏道武帝。自天興元年至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遷都洛陽為止，平城為北魏國都長達 96 年。這段期間，北魏征服各個政權所掠奪的財物皆集中於平城一帶，所俘獲的人民也大批地被強制遷徙至平城及其附近的地區。宿白先生的研究指出，當時徙至平城一帶的人口，最保守的估計約在百萬以上，其中不乏人才、工巧；而被強制徙出的地點如山東六州、關中長安、河西涼州、東北和龍（即龍城）與東方的青齊，都是當時北中國經濟、佛教、文化最發達的地方，平城已成為當時的政治、經濟、佛教、藝術以及文化中心。此外，自太武帝以來，北魏即與西域諸國，如鄯善、焉耆、龜茲、于闐、罽賓、粟特等，往來頻繁。這些國家大抵信奉佛教，故西域傳入的佛教與藝術元素也為平城佛教文化的發展帶來了新契機。⁹¹ 在平城附近所開鑿的雲岡石窟，無疑就是北魏平城時期佛教藝術的代表。

《魏書》〈釋老志〉載：

和平（452-465）初，（道人統）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曇

91 宿白，〈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收入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頁 177-183。

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奇偉，冠於一世。⁹²

文中所言，在武州塞所開鑿的石窟即今雲岡石窟。雲岡石窟是文成帝（452-465 在位）下令恢復佛教後，最重要的佛教事業之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國家主持經營的大規模石窟營造工程。直至北魏末，雲岡石窟的開鑿造像不曾中斷。依石窟形制、造像風格、尊像配置等變化，雲岡石窟的發展可分為（一）和平年間、（二）文成帝死後到孝文帝遷都洛陽（465-494），以及（三）孝文帝遷都洛陽至北魏末（494-534）三個階段。根據筆者目前所收的資料，在雲岡石窟第一、二、三期的洞窟裡，彌勒龕像至少有 180 龕。整理和分析這些彌勒龕像，我們大致可以鉤勒北魏時期山西彌勒圖像發展的脈絡。

在筆者所收的雲岡彌勒龕像資料中，主尊為交腳彌勒菩薩者約 160 龕左右，佔全數的九分之八，顯然北魏時期，在山西交腳彌勒菩薩像十分流行。其中，手結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在第一期即已出現，第 17 窟的主尊交腳彌勒菩薩像雖然雙手已殘，但左手舉起，左手肘下尚存一雕出的石柱作為支撐，推測其原來可能即作轉法輪印。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彌勒菩薩像主要是集中第一、二期的窟洞中，第三期的洞窟裡僅在第 24 窟裡發現一例。第 18 窟南壁下層西側的這類交腳彌勒菩薩龕（圖 31），寶冠之中尚見一尊化佛。此一圖像特徵在北涼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圖 6A、7）上時有所見，應是受到北涼佛教造像的影響。

受到涼州的影響，雲岡石窟也出現了北涼石塔所見七佛一菩薩的三世佛圖像，不過在尊像配置上，平城的設計者有了自己的詮釋與表現，例如第 13 窟的主尊為交腳彌勒菩薩像，但在明窗下方與入口上方的壁面，與主尊交腳菩薩像相對的位置，雕鑿了七尊立佛。⁹³ 又如第 35 窟門口東側延昌四年（515）所造的彌勒菩薩龕像，該龕的主尊彌勒菩薩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交腳坐於盞頂龕中，足下有地神捧足。龕楣分為七格，每格均浮雕一尊坐佛，⁹⁴ 此龕的題記稱此龕是「為亡弟安？鳳，造彌勒并七佛、口立菩薩。」⁹⁵ 然而與北涼石塔不同的是，彌勒菩薩在雲岡七佛一菩薩組合的三世佛圖像中，已不再與過去七佛平起平坐，而是作為石窟或佛龕的主尊，其重要性顯然大幅度地提昇。這種安排方式很可能與北魏「當今皇

92 魏收，《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 8 冊，頁 3037。

93 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二）》，圖 111、118。

94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第 8 卷，〈圖版篇〉，圖版 18。

95 張焯，《雲岡石窟編年史》，頁 146。

帝即彌勒」的國家佛教性格有關。⁹⁶

在雲岡石窟中，最常見的彌勒圖像為右手作施無畏印、交腳而坐的菩薩像，據筆者的統計有 130 餘龕；其左手或作與願印者，或撫膝（圖 32），有些的寶冠中還刻有化佛。另外，還發現一種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執持淨瓶的彌勒菩薩像。第 17 窟明窗東側的太和十三年（489）龕（圖 33）是雲岡石窟中最早的紀年龕，該龕分為上下兩層，下層開一券形龕，龕內雕兩尊結跏趺坐佛像，上層開一帳形龕，龕內雕一尊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撫膝的交腳菩薩像。二佛並坐龕下銘刻的題記云：

大代太和十三年歲在己巳九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比丘尼惠定身遇重患，發願造釋迦、多寶、彌勒像三區（軀）。願患消除，願現世安穩，戒行猛利，道心日增，誓不退轉。以此造像功德，逮及七世父母、累劫諸師、无邊眾生，咸同斯慶。⁹⁷

根據這則造像記，此龕下方的二佛並坐當代表釋迦、多寶佛，而上方在獅子座上交腳而坐的菩薩即為彌勒，這樣的設計顯然典出《法華經》。《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稱，若有人受持、讀誦《法華經》，並深入瞭解此經的旨趣，「是人命終，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墮惡趣，即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⁹⁸ 值得注意的是，這尊彌勒菩薩左手的中指與無名指間尚夾著一個淨瓶。據筆者的觀察，這種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撫膝並執持淨瓶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只在第 11、13 和 16 窟等雲岡第二期的窟洞中始有發現，來源為何？頗值深究。

在甘肅和陝西，不曾發現手執淨瓶的交腳菩薩像，即使在印貴霜王朝的造像裡也不曾看到，可是在新疆克孜爾石窟的彌勒說法圖中，卻找到數例（圖 34），⁹⁹ 無論是坐姿、手印或執持水瓶的方式皆與太和十三年惠定所造的彌勒菩薩像近似。根據《魏書》，太延三年（437）和五年（439）、太平真君十年（449）、皇興五年（475）、太和元年（477）至三年（479）龜茲曾多次遣使朝獻。¹⁰⁰ 世祖時，為了經

96 雲岡石窟最流行的造像題材為釋迦佛和彌勒佛，考察這些尊像在雲岡石窟的組合關係後，佐藤智水指出，其充分反映了「過去帝即釋迦，現皇帝即彌勒」的國家佛教性格。（佐藤智水，〈雲岡佛教の性格——北魏國家佛教成立の一考察〉，《東洋學報》，第 59 卷 1、2 期，頁 27-45。）

97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會、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雲岡石窟》，圖 81。

98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七，〈普賢菩薩勸發品〉，收入《大正藏》，第 9 冊，頁 61 下。

99 圖尚見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一）》，圖 57；Herbert Hartel, Mariane Yaldiz, etc.,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 Berlin State Museums*, catalogue 27.

100 魏收，《魏書》，卷四，〈世祖紀上〉、卷六，〈顯祖紀〉、卷七，〈高祖紀上〉，第 1 冊，頁 89、90、103、141、144、146、147。

營西域，又曾命萬度歸征伐龜茲。可見北魏早、中期與龜茲往來密切，雲岡第二期洞窟中所出現的龜茲式彌勒菩薩像，或許就是這種歷史背景下的產物。

此外，在這些手持淨瓶的交腳菩薩像裡，尚發現一些寶冠中刻畫著化佛的例子，如第 11 窟東壁第三層的交腳彌勒菩薩龕（圖 35）、第 11 窟南壁下層的交腳彌勒菩薩龕¹⁰¹等，這種融涼州與龜茲的彌勒圖像於一爐的表現方式，也是山西北魏彌勒圖像的一大特色。

整理雲岡石窟的彌勒菩薩圖像時，筆者發現，在交腳彌勒菩薩像兩側分別配置一半跏思惟菩薩像的佛龕居然多達五、六十個，比例之高，特別引人注意。這種配置方式始見於第一期的洞窟，如第 18 窟南壁下層的彌勒菩薩坐像龕（圖 31），一直到北魏末，仍屢見不鮮，類似的組合在山西的單尊碑像上亦有發現，¹⁰²顯然有其特殊的意涵。前文已述，西安西郊出土、五世紀中葉雕造的彌勒菩薩龕像（圖 19）即已出現這樣的組合形式，而雲岡第 18 窟的彌勒菩薩坐像龕無論在龕形的樣式或造像風格上，都與西安西郊出土的彌勒菩薩龕像十分近似，平城與關中的佛教藝術必有淵源。

對雲岡石窟彌勒龕中所出現的半跏思惟菩薩像，學者的訂名不一。塚本善隆直接稱之為彌勒，¹⁰³可是水野清一與長廣敏雄的看法則沒有那麼明確，他們指出彌勒為一生補處菩薩，與悉達多太子同樣具有菩薩的性格，由於二者性格類似，故雲岡石窟出現上述的圖像組合方式；後來，半跏思惟菩薩像逐漸轉化為彌勒菩薩。¹⁰⁴許湘苓則說，這些半跏思惟菩薩像為觀想自己往生兜率天宮的虔誠彌勒信徒。¹⁰⁵雖然各家的看法有別，不過大部分學者都同意，在這種龕像中，半跏思惟像不只是單純的脇侍。

上述諸說，許湘苓的解釋太過浮泛，可能性不高，不予考慮。因為雲岡石窟出現一些以半跏思惟菩薩為主尊的像龕，如第 6 窟明窗西壁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龕、¹⁰⁶第 29 窟南壁中層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龕¹⁰⁷等，在這些龕裡主尊菩薩的足前尚雕有白

101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第 8 卷，〈圖版篇〉，圖版 18。

102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一〉，圖 115b。

103 塚本善隆，《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頁 232。

104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第 8 卷·第 9 卷，〈本文篇〉，頁 13。

105 Eileen Hsiang-ling Hsu, "Visualization Meditation and the Siwei Icon in Chinese Sculpture," pp. 6-9.

106 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圖 128。

107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第 15 卷，〈圖版篇〉，圖版 41b。

馬告別的畫面，故這些半跏思惟菩薩像應代表悉達多太子而非彌勒菩薩，因而依塚本善隆的說法，直接稱這些彌勒龕中成對出現的半跏思惟像為彌勒，似乎又不太穩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雲岡石窟這種「類」脇侍的半跏思惟菩薩像只出現在彌勒菩薩或彌勒佛龕內，顯然與彌勒的關係十分密切。前文已述，在五世紀中葉，長安地區已出現結構類似的彌勒龕像，受到關中佛教藝術的影響，雲岡這些彌勒龕中的半跏思惟菩薩像比定為主尊彌勒的化現可能較為合適。

山西左權石佛寺石窟的第2窟為北魏孝昌二年（526）¹⁰⁸所開鑿的三壁三龕窟，正壁與左壁皆為趺坐佛龕，右壁則為一菩薩龕。從此窟的尊像的配置來看，窟內二佛與一菩薩的組合當代表三世佛，因此右壁龕中的菩薩當代表彌勒菩薩。這尊菩薩左腿下垂，右足置於左腿之上，坐姿與半跏思惟像類似，然而其右手並不支頤，而作施無畏印，這種形式的菩薩像無疑是半跏思惟菩薩像的變形。

前文已述，在甘肅和陝西，有些北魏的交腳佛像和倚坐佛像代表彌勒，因為涼州和長安對平城佛教與佛教藝術影響甚鉅，是否在雲岡石窟中也可以發現一些彌勒佛的龕像？令人惋惜的是，雲岡石窟的造像題記稀少，故在尊格的比定上，學界的意見往往分歧。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¹⁰⁹以及東山健吾¹¹⁰皆主張，雲岡石窟的倚坐佛像應代表釋迦，John C. Huntington則認為雲岡石窟第19窟二耳室的主尊倚坐佛為彌勒佛。¹¹¹這些學者的意見孰是孰非？值得討論。

雲岡石窟中倚坐佛的數量不多，不過出現的卻很早，早在第一期窟洞中即有發現，一直到第三期仍續有雕鑿。今仔細檢視雲岡石窟的倚坐佛像，筆者雖同意長廣敏雄、水野清一、東山健吾等的意見，認為雲岡石窟部分的倚坐佛應代表釋迦，¹¹²不過筆者並不認為雲岡石窟所有的倚坐佛都應比定為釋迦。例如，雲岡石窟第8窟正壁的主龕（圖36）分為上下兩層，下層龕的主尊為一尊坐佛，上層龕的尊像雖然久經風化，面目已失，但依然可知其原為五尊像龕。位居中央的是一尊右手作無畏

108 2012年6月23日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李裕群研究員告知，左權文物管理所姜杉所長近年調查該石窟時，在左權石佛寺石窟的第2窟的窟頂發現一則孝昌二年的開窟題記。由於該窟的窟頂已被薰黑，故此則題記久未被發現。

109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第8卷·第9卷，〈本文篇〉，頁5。

110 東山健吾，〈敦煌莫高窟北朝期尊像の圖像の考察〉，頁94-95。

111 John C. Huntington, "The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of The 'Tan Yao' Caves at Yungang," *Oriental Art*, vol.32, no.2 (Summer 1986), pp. 149.

112 例如雲岡第6窟中心塔柱西面下層的倚坐佛龕，在佛龕兩側上方浮雕著七步行吟與九龍浴佛兩個佛傳的畫面，龕中的這尊倚坐佛自當比定為釋迦佛。

印、左手安置在左膝上的善跏倚坐佛，祂的左右各有一尊交腳菩薩，左側的交腳菩薩右手作施無畏印。雖然因為風化，全龕最西端的雕像已蕩然無存，所幸的是東端的半跏思惟菩薩像卻保存得完好無缺，故推斷西端原來也應有一半跏思惟菩薩像。

與之比鄰的第7窟，石窟的形制、平面、大小皆與第8窟相近，且兩窟前室相鄰的壁面又鑿有甬道相通，二窟內佛龕的安排和尊像的配置等也彼此呼應，第7、8窟顯然是一組對窟。第7窟正壁主龕（圖37）也分為上下兩層，下層龕內雕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上層龕內也雕一組五尊像（圖37A）。與第8窟不同的是，該龕的主尊為一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兩側各有一尊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裾的倚坐佛，東西兩端則是半跏思惟菩薩像。第7窟正壁上下龕的組合形式基本上與惠定造釋迦、多寶彌勒龕像（圖33）一致；換言之，第7窟正壁下層龕的主尊應是《法華經》的靈魂人物——釋迦、多寶佛，上層則是以兜率天宮內院教主交腳彌勒菩薩為主尊的彌勒龕。

由於第7窟和第8窟乃一對窟，石窟的布局完全呼應，故推測第8窟正壁下層龕的主尊應是宣說《法華經》的釋迦牟尼佛，而上層龕的主尊倚坐佛則代表下生閻浮提，在華林園說法的未來佛彌勒。倘若依水野清一、長廣敏雄、東山健吾的看法，視第7窟的倚坐佛為釋迦佛的話，那麼第7窟正壁上層龕的圖像組合就變成現在佛釋迦作為未來佛彌勒的脇侍，這樣的解釋很難令人信服。因此，筆者以為第7、8兩窟中的倚坐佛均代表彌勒，只是第7窟是以兜率天宮的彌勒菩薩作為主尊，兩側的倚坐佛和半跏思惟菩薩像皆為主尊彌勒菩薩不同形貌的化現；第8窟則是以將來下生閻浮提，於龍華樹下得道的彌勒佛為主尊，兩側的交腳菩薩和半跏思惟菩薩像為主尊彌勒佛不同形貌的化現。位於雲岡石窟西端的第29窟，其正壁分為上下兩層，上層開三龕，以倚坐佛龕為中心，左右各開一交腳彌勒菩薩龕，而倚坐佛龕主尊的兩側則各雕一半跏思惟菩薩像。顯然，此窟正壁上層諸龕與第7、8兩窟正壁上層龕的設計觀念雷同，說明與第7、8窟類似的表現方式一直延續至雲岡第三期。綜上所述，依據雲岡石窟內尊像配置的關係，筆者以為雲岡石窟中部分倚坐佛像應該代表彌勒，不應視作釋迦。

在雲岡石窟的二期窟裡，還發現一些交腳佛龕。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認為，雲岡石窟的交腳佛龕應是配合相對的交腳菩薩龕所作的造型變化，¹¹³ 八木春生則主

113 東山健吾，〈敦煌莫高窟北朝期尊像の圖像の考察〉，頁94-95。

張，有些雲岡石窟的交腳佛可視為彌勒。¹¹⁴ 從石窟中尊像的配置關係，或許可以找到一些解決爭議的線索。第 12 窟前室的東壁（圖 38）分三層，最下層圓券龕中安置釋迦、多寶佛，中層屋形龕的主尊為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菩薩，足下尚有一地神捧舉彌勒的雙足，台座兩側各雕一隻獅子，左右各雕一半跏思惟菩薩像；西壁（圖 39）也分三層，下層雕釋迦佛降伏火龍的兩個畫面，中層屋形龕的中央為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佛三尊像，台座兩側各雕一隻獅子，左右各雕一尊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佛像。這兩壁的圖像配置顯然與第 7、8 窟這組對窟正壁龕的設計理念相通，只是第 12 窟前室的西壁下層以降伏火龍的釋迦佛取代了第 8 窟正壁下層的釋迦佛龕，因此筆者推測，第 12 窟西壁中層的主題亦應與彌勒有關。位居交腳佛兩側的倚坐佛，皆右手作施無畏印，圖像特徵與第 7、8 窟的彌勒倚坐佛相似，若以上筆者對 7、8 窟的解析可以被接受的話，這兩尊倚坐佛便可視為中尊交腳佛的化現，那麼位居此龕中央的交腳佛當然就應代表彌勒佛。類似的對應關係在雲岡石窟的二期洞中時有發現，如第 9 窟前室東壁上層屋形龕的中尊為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左右各雕一半跏思惟菩薩像；西壁上層屋形龕的主尊為一尊右手作施無畏的交腳佛坐像，左右各雕一脇侍菩薩立像。第 10 窟前室東壁上層屋形龕的中尊為交腳佛坐像，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裾，左右各雕一手持淨瓶的脇侍菩薩立像；西壁上層屋形龕的中尊為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左右各雕一半跏思惟菩薩像。只是雲岡石窟的交腳彌勒佛出現的時間很短，只在第二期洞窟中始有發現。

前文已述，交腳彌勒佛是北魏時期陝西流行的彌勒圖像，出現的時間較雲岡石窟略早，故雲岡石窟交腳彌勒佛的祖源可能來自陝西。不過比較二地交腳彌勒佛的圖像特徵，又發現陝西的交腳彌勒佛大多作轉法輪印，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佛像則遲至北魏晚期才出現。據此推測，平城的彌勒圖像固然受到陝西交腳彌勒佛圖像的啟發，但卻以取轉法輪印而代之以施無畏印，來傳達彌勒說法的意涵。

雲岡石窟的彌勒像不但數量眾多，且圖像種類豐富，其中，冠有化佛的交腳菩薩像、左手持淨瓶的交腳菩薩菩薩像以及交腳彌勒佛像，都不曾在山西其他石窟或單獨的佛教碑像上發現，也顯示平城的佛教藝術亦有其特殊性。不過在山西北魏單獨的碑像裡，也發現了兩種雲岡石窟所不見的彌勒像。一種為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彌勒菩薩像（圖 40），另一種為佛立像。

114 八木春生，《雲岡石窟文樣論》，頁 57。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收藏中，有一尊高達 140.5 公分的鑲金佛立像（圖 41），此佛身著通肩式袈裟，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雙手皆為縵網掌，立於蓮台之上。其髮作大渦紋，袈裟貼體，身軀輪廓畢露。依蓮台邊緣陰刻的題記，此像乃太和十年（486）正月閻氏、程氏等家族為太皇太后和邊地眾生所造的彌勒像。¹¹⁵ 據傳，此像原在山西東北部五臺山的碧山寺。¹¹⁶ 無獨有偶地，在義大利貝魯森研究所（The Bernard Berenson Collection of Oriental Art）也發現一尊圖像特徵相同的山西彌勒佛立像，¹¹⁷ 該像的題記云：

永安二年（529）閏七月二日訖□。石艾縣（今山西省平定縣東南）人韓德醜零慎造彌勒像一軀（軀）。上為皇帝陛下、國土人民、含生之類、師僧父母、兄弟姊妹、眷屬大小，彌勒三會，盡在[初][首]。¹¹⁸

由此看來，在山西這類彌勒佛立像於北魏中期即已出現，一直到北魏晚期仍有製作。

綜上所述，依據圖像特徵，山西的北魏彌勒圖像可分為十類：（一）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菩薩坐像，（二）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菩薩坐像，（三）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撫膝並持淨瓶的交腳菩薩坐像，（四）半跏思惟菩薩像，（五）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半跏垂足菩薩像，（六）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菩薩像，（七）冠有化佛的彌勒菩薩像，（八）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佛坐像，（九）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佛倚坐像，以及（十）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佛立像。整體來說，北魏時期，山西的彌勒菩薩像數量與種類都遠遠超過彌勒佛像。

在山西的十類彌勒圖像中，第一類出現的時間最早，第六類始見於北魏晚期，出現的時間最晚。第二類的數量最多，在這類中，左手撫膝者的數量又是左手作與願印者的 2.5 倍，說明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撫膝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在雲岡最為流行。第三類和第八類僅出現於雲岡的二期洞窟中。至於第四類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雖然筆者在沁縣南涅水村出土的一些石塔節上，發現數個半跏思惟菩薩像龕，但由於這些龕像既無題記，也無法從四面圖像的配置關係中確認其與彌勒的關係，故筆者不敢貿然將其比定為彌勒。目前僅能確認，出現於彌勒佛或彌勒菩薩兩側的半跏思惟菩薩像，可以視為彌勒的化現。這種組合不僅在雲岡石窟中極為普遍，在山西

115 Denise Patry Leidy and Donna Strahan, *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p. 57-58.

116 Denise Patry Leidy and Donna Strahan, *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 58.

117 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論》，〈圖版一〉，圖 205a、b。

118 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 270。

的北魏石雕碑像上也偶有發現。¹¹⁹固然在山西的北魏佛教造像裡，尚未發現以典型的半跏思惟菩薩像作為主尊的彌勒菩薩像，可是北魏晚期，在山西卻發現少量從半跏思惟菩薩像變化而來的第五類彌勒菩薩像。第七類冠有化佛的彌勒菩薩像，在雲岡第一、二和三期的窟洞中都有發現。另外，在雲岡第二期和三期的洞窟裡，還常發現一些地神捧足的交腳彌勒菩薩像，¹²⁰此一特徵在印度、中亞、甘肅的佛教藝術裡均不曾見到，僅出現在山西（圖 38）和陝西（圖 21、24）的佛教造像裡。然而由於二地的彌勒像出現此一特徵的年代相近，究竟是陝西影響山西？抑或是山西影響陝西？目前難有定論。

北魏滅亡以後，山西的東半部以及中部屬東魏（534-550）、北齊（550-577）的領土，西側則歸西魏、北周管轄。根據筆者所收這段時期山西的佛教造像，發現此一時期彌勒像的數量頓減，圖像的豐富性也無法與北魏時期相提並論，僅出現北魏時期的第二、五、六、九這四種類型。其中，第五類的右手作施無畏的半跏垂足菩薩像數量最少，可是卻出現題記中明確稱呼這種造像為彌勒的例子。在山西博物院的收藏中，有一件天保七年（556）的造像碑，碑陰上方開一雙樹龕（圖 42），龕內雕即雕一右手作施無畏印，半跏垂足而坐的菩薩像，兩側各有一雙手合什的脇侍比丘。在右脇侍比丘的身側尚鐫刻著「大彌勒像」四字，類似的圖像在賓州大學所藏、原在太原天龍山的武平六年（575）造像碑¹²¹上亦有發現，清楚說明直到北朝晚期，山西人並沒有遺忘半跏思惟菩薩像與彌勒的關係。此外，在北朝晚期，第二類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菩薩像（圖 43）、第六類的倚坐菩薩像（圖 44）和第九類倚坐佛像（圖 45）均時有出現。西魏大統十七年（551）艾殷所造四面像（圖 44）的題記云：

大統十七年歲次辛未三月乙巳朔□五日己未，佛弟子衛大將軍行猗氏縣事
安次縣開國男艾殷，敬造定光、釋迦、彌勒、普賢四□□。□皇帝陛下、
七世父母、過去見（現）在眷屬、一切含生，恒與善俱，咸昇大寂。妻彭
白妃、息男仙伯。¹²²

119 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論》，〈圖版一〉，圖 70。

120 如第 1 窟中心柱東向面上層的交腳彌勒菩薩像龕、第 12 窟前室東壁的交腳彌勒菩薩像龕、第 16 窟明窗東側的交腳彌勒菩薩像龕、第 35 窟門口東側延昌四年（515）常主匠造彌勒七佛菩薩像龕等。圖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第 1 卷，〈圖版篇〉，圖版 34；第 9 卷，〈圖版篇〉，圖版 6；第 11 卷，〈圖版篇〉，圖版 50；第 15 卷，〈圖版篇〉，圖版 69a。

121 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論》，〈圖版二〉，圖 471。

122 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 286。

足見此四面像中，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倚坐菩薩像當為彌勒無疑，而題記中所言猗氏縣，故治即在今山西臨猗縣南二十里鐵匠營村。

表三 山西北朝彌勒圖像流傳時間表

品名	圖像特徵		420	440	460	500	535	550	581
	姿勢	手印與持物							
彌勒菩薩	交腳坐姿	轉法輪印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持淨瓶							
	半跏垂足	思惟相							
	半跏垂足	右手作施無畏印							
	倚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冠有化佛								
彌勒佛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倚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立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四) 河南

東漢桓、靈之世（146-189）西域來華弘法的高僧，如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均曾在國都洛陽駐錫，並翻譯佛經。此外，在洛陽活動的胡商，熱心佛事者亦不在少數。《後漢書》〈桓帝本紀論〉提到，桓帝「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¹²³ 根據文獻，東漢末年，洛陽已有佛寺的建立。¹²⁴ 三國時期（220-280），洛陽更成為北方佛教重鎮。¹²⁵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載：

至晉永嘉（307-313），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494），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暨永熙

123 范曄，《後漢書》，卷七，〈孝桓帝紀〉，第1冊，頁320。

124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81。

125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124。

多難，皇輿遷鄴（534），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547）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鍾聲罕聞。¹²⁶

西晉永嘉年間洛陽已有 42 寺，足證當時洛陽佛教已有長足的發展。五胡亂華，晉室南遷，洛陽不復為國都，先後為後趙、前燕、前秦、後燕、後秦所統治，爭戰不斷，發展趨於遲緩，佛教的盛況不再。¹²⁷ 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北魏孝文帝行幸洛陽時，便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¹²⁸ 可見那時的洛陽已十分蕭條。直到次年，孝文帝遷都洛陽，洛陽才又蓬勃發展。遼耀東的研究指出，新都洛陽的都市計畫、建築設計等均深受平城的影響，¹²⁹ 佛教藝術自然也不例外。

雖然早在三世紀，洛陽已是中國佛教重鎮，不過由於屢經戰亂，早期的佛教造像已蕩然無存。現在不但在洛陽，甚至於在河南，均鮮少發現北魏遷都洛陽以前的佛教窟龕、碑像。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太和十九年（495）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造彌勒菩薩龕像¹³⁰（圖 46），龕中的彌勒菩薩上身全袒，肩披絡腋，右手作與願印，左手撫膝，交腳而坐，地神雙手擎足。現在這尊彌勒菩薩像的面部殘毀，但根據舊照片，祂的寶冠中尚有一尊化佛。¹³¹ 無論從風格或圖像上看，這尊彌勒菩薩像顯然深受雲岡（圖 32）的影響。據石松日奈子的統計，龍門古陽洞中有 105 個交腳菩薩像龕，¹³² 蘇玲怡又指出，其中 28 龕的造像記明確稱這種交腳菩薩像為「彌勒」。¹³³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手部殘毀者外，這些彌勒像的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或作與願印，或撫左膝，這種形式的彌勒菩薩像正是雲岡石窟中最流行的彌勒圖像。只不過在交腳的姿勢上略有出入，古陽洞的彌勒菩薩像多是左足在前，而雲

126 楊銓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頁 1-2。

127 嚴耕望製作的〈高僧傳東晉時代高僧標目地統計表〉中並未載錄洛陽，依他製作的〈高僧傳東晉時代高僧遊錫地統計表〉，東晉時至洛陽遊錫者也僅發現 2 例。參見嚴耕望遺著，李啟文整理，《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頁 33-34、38。顯然西晉滅亡之後，洛陽在中國佛教發展上的重要性頓減。

128 魏收，《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第 1 冊，頁 173。

129 遼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頁 195-225。

130 該龕的造像題記云：「太和□九年十一月，使持節司空公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為亡息牛楸，請工鑿石，造此彌勒像一區。願牛楸捨於分段之鄉，騰遊無礙之境。若存託生，生於天上諸佛之所。若生世界，妙樂自在之處；若有苦累，即令解脫。三途惡道，永絕因趣。一切眾生，咸蒙斯福。」（劉景龍、趙會軍編著，《古陽洞——龍門石窟第 1443 窟》，〈附冊〉，頁 55。）

131 石松日奈子，〈中國交腳菩薩像考〉，頁 67。

132 石松日奈子，〈中國交腳菩薩像考〉，頁 66。

133 蘇玲怡，《龍門古陽洞研究》，〈附錄三：古陽洞彌勒造像資料〉，頁 146-150。

岡石窟的彌勒菩薩像多是右足在前。¹³⁴ 在古陽洞中尚發現許多地神托足的交腳彌勒菩薩像，以及少數交腳彌勒菩薩像兩側各雕一尊半跏思惟菩薩的龕像。¹³⁵ 此外，在河南的單尊碑像上還發現交腳彌勒菩薩在上，下方為二佛並坐龕的三世佛組合。¹³⁶ 偃師小灣村出土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圖 47），不但冠有化佛，足下尚見地神，左手也持淨瓶。凡此種種在在顯示，河南交腳彌勒菩薩圖像直接承襲雲岡石窟的傳統無疑。

在龍門石窟的北魏窟中，有數個三壁三龕窟，以二佛和一菩薩的組合來表現三世佛的觀念。例如慈香洞的正壁和北壁為坐佛五尊像，而南壁五尊像的主尊則是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撫膝的交腳菩薩；彌勒洞的南北兩壁皆為立佛，可是正壁則是交腳菩薩五尊像；六獅洞的正壁和北壁為坐佛五尊像，而南壁五尊像的主尊也是一尊交腳菩薩，上述三窟中的交腳菩薩都代表未來佛彌勒無疑。不過完成於孝昌三年（527）的皇甫公窟，正壁為坐佛七尊像，北壁為釋迦、多寶佛龕，而南壁菩薩五尊像龕（圖 48）的主尊右手已殘，左手作與願印，也當比定為彌勒。可是其不作交腳坐姿，而採右足在上的半跏趺坐姿勢。

由於鞏縣石窟中並未發現交腳菩薩像，故過去有些學者認為，鞏縣石窟並無彌勒菩薩像的雕鑿。¹³⁷ 不過檢視石窟配置後發現，此說需要修正。鞏縣第一、三和四窟皆為中心塔柱窟，中心柱的三面均開坐佛龕，而東向面皆為半跏趺坐菩薩龕；第五窟為一個三壁三龕窟，正壁與西壁皆是坐佛龕，而東壁則是一半跏趺坐菩薩龕。由於鞏縣和皇甫公窟的開鑿年代相去不遠，故推測上述的鞏縣石窟半跏趺坐菩薩像皆代表彌勒。由此看來，隨著洛陽佛教文化的日益成熟，北魏末年也發展出自己的彌勒圖像。

河南的北魏造像中，彌勒佛像的數量極為罕見，筆者目前僅發現三尊，分別為河南新鄉博物館所藏的永平三年（510）尚元壽造彌勒佛坐像、¹³⁸ 鄭州市西西崗村紅石坡寺院遺址出土的正光二年（521）扈豚造像碑碑側（圖 49）和原在延津東北

134 石松日奈子，〈中國交腳菩薩像考〉，頁 64-68。

135 劉景龍、趙會軍編著，《古陽洞——龍門石窟第 1443 窟》，圖 74、118。

136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一〉，圖 180。

137 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銘考〉，《史學雜誌》，第 86 編第 10 號，頁 1436；陳明達，〈鞏縣石窟寺的雕鑿年代及特點〉，收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頁 196。

138 該像的造像記云：「永平三年五月廿七日，尚元壽造彌勒像一區，為父母兄弟、因緣眷屬，常與佛會。」圖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一〉，圖版 110c。

四十里蔣村區清寺的孝昌三年（527）蔣伯仙造彌勒佛立像¹³⁹（圖 50）。三者中，尚元壽造彌勒佛像和蔣伯仙造彌勒佛立像皆依造像題記訂名。尚元壽造彌勒佛像是一尊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結跏趺坐像。扈豚造像碑的正面為結跏趺坐佛三尊像，左右兩側的龕內分別雕一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彌勒交腳菩薩像，以及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佛像。從其對稱的關係來看，這尊倚坐佛像或可比定為彌勒。蔣伯仙造彌勒佛立像左手已斷，右手雖然略殘，但推測應作施無畏印。這三尊北魏的彌勒佛像，雖然皆右手作施無畏印，但祂們或結跏趺坐、或倚坐、或站立，圖像特徵各不相同，很難歸類。

依據圖像特徵，河南的北魏彌勒像可分為六類，分別為：（一）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菩薩坐像，（二）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撫膝並持淨瓶的交腳菩薩坐像，（三）半跏垂足、一手作思惟印的菩薩坐像，（四）半跏趺坐的菩薩坐像，（五）冠有化佛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和（六）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佛像。其中，以第一類的交腳菩薩坐像的數量最多，且出現的時間最早；第六類的數量最少，第二類手持淨瓶的彌勒菩薩像、第三類的半跏思惟彌勒菩薩像和第五類冠有化佛的交腳彌勒菩薩像數量也不多；其中半跏思惟彌勒菩薩像也僅作為化現的身分出現；第四類半跏趺坐彌勒菩薩像則直到北魏末期才開始雕鑿，是五類菩薩像裡出現最晚的一種類型。不過在其他地方未曾發現這類彌勒像，應是河南獨創的彌勒圖像。此外尚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肅、陝西和山西，北魏晚期已出現彌勒菩薩倚坐像，在河南的北魏造像中卻尚未發現。

北魏以後，河南地區保存的彌勒造像數量較其他地區略豐，但仍無法與北魏時期相提並論。第一類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在東魏與北齊仍有發現，但數量大幅度地減少。第三類的半跏趺坐彌勒菩薩像到東魏末、北齊初仍偶有雕鑿，如龍門石窟的汴州洞南壁的主尊、¹⁴⁰安陽小南海石窟中洞東壁上方的彌勒為天眾說法浮雕¹⁴¹等，到了北齊中期以後就不再出現了。不過北魏數量稀少的彌勒佛倚坐像，直到北齊末都續有鑿刻，且數量明顯增加。賓州大學博物館所藏的北齊佛像的台座，從石材與風格來看，都可能為河南的作品。此台座的四面分別線刻悉達多太子思惟、初轉法

139 此像的題記云：「魏孝昌三年歲次乙未九日辛酉朔十日庚午，司州東郡東燕人蔣伯仙敬造彌勒石像一區。……」該像題記的甚長，全文參見顏娟英主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 66。

140 溫玉成，〈龍門北朝小龕的類型、分期與洞窟排年〉，收入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頁 223。不過該頁的插圖 141 汴州洞南壁菩薩坐像的線描圖，右足的位置與實際的姿勢有所出入，繪圖有誤。

141 陳明達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 13·鞏縣天龍山響堂山安陽石窟雕刻》，圖 195。

輪、藥師琉璃光佛和日月燈明佛說法圖（圖 51）四個題材。在日月燈明佛說法圖的兩側各刻一尊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佛像，左側倚坐佛上方的銘文言道：「彌勒下生佛像主趙思奴」，足見在河南當時已視倚坐佛為彌勒了。

除了上述三種北魏已出現的彌勒圖像外，北齊時在河南還出現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彌勒菩薩倚坐像，這種彌勒菩薩像在北齊時特別流行，許多這種彌勒菩薩像的造像題記清楚載明其為「彌勒」或「彌勒下生」像，如偃師市南蔡莊鄉寺里碑村平等寺遺址出土的天統三年（567）韓永義造像碑、¹⁴²天統三年至五年（567-569）的崔永仙造像碑、¹⁴³襄城出土的天統四年（568）張伏惠造像碑¹⁴⁴（圖 52）、原在嵩山少林寺的武平元年至二年（571-572）的董洪達造像碑、¹⁴⁵原在登封市會善寺的武平七年（576）的宋始興造像碑¹⁴⁶等。除此之外，張伏惠造像碑的彌勒倚坐菩薩像側，出現一菩薩七尊像龕，主尊菩薩右足置於左膝之上，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置於右小腿上，左側的題記言：「上坎（龕）彌勒像主孫散、妻衛口好、妻王鑲姜、息口和。」依此來看，這尊半跏垂足的菩薩像也當是彌勒。這類的半跏垂足菩薩像在北齊的河南造像碑上時有所見，襄城孫莊村出土的天保十年（559）高海亮造像碑（圖 53）的碑額中央開一帳形龕，龕中的主尊菩薩右腿彎曲置於台上，左腿下垂，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圖像特徵與張伏惠造像碑中的彌勒菩薩半跏垂足坐像近似，推測也是一尊彌勒。

142 碑陽碑額倚坐菩薩龕側題刻：「彌勒像主。」相關資料與圖片參見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北齊圖錄 15。

143 碑陽碑身下層倚坐菩薩龕側題刻：「彌勒像主宋天□、□□□。彌勒佛主崔永仙。」相關資料與圖片參見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北齊圖錄 18。

144 碑陽第一層右側倚坐菩薩龕右側題刻：「上坎（龕）彌勒像主張三王、妻麻聞好、孫女何休。」相關資料與圖片參見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北齊圖錄 16。

145 碑陽碑額倚坐菩薩龕下題刻：「彌勒下生主石方僖。武平二年十一月廿七日，用錢五百文買都石像主一區。董伏恩。彌勒下生主閔州騎兵參軍、倉州洛陵縣令董相勝。彌勒下生主董通達。」相關資料與圖片參見水野清一，《中國の佛教美術》，頁 251-253。

146 碑陽碑額倚坐菩薩龕兩側分別題刻：「彌勒主宋方生侍佛。彌勒主辛妙資」。相關資料與圖片參見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北齊圖錄 25。

表四 河南北朝彌勒圖像流傳時間表

品名	圖像特徵		420	440	460	500	535	550	579
	姿勢	手印與持物							
彌勒菩薩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持淨瓶							
	半跏趺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倚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半跏垂足	思惟相							
	半跏垂足	右手作施無畏印							
	冠有化佛								
彌勒佛	倚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五) 河北

太行山以東的河北平原，自漢代（西元前 206- 西元 220 年）以來，即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湯用彤指出，東漢末佛教可能已經傳入河北。¹⁴⁷ 四世紀時，割據河南、河北和山東一帶的後趙（319-351）君主石勒、石虎推崇以神通見稱的佛圖澄（232-348）。後趙前後兩個國都——襄國（今河北邢臺縣西南）和鄴（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都在河北，上行下效，後趙時，佛教在河北已普遍流傳。石虎時，佛圖澄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¹⁴⁸ 且「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八百九十三所。」¹⁴⁹ 此外，以格義見長的河間（今河北河間縣）竺法雅「立寺於高邑（今河北高邑縣），僧眾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偽趙太子石宣所敬云。」¹⁵⁰ 中山（今河北定縣一帶）康法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¹⁵¹ 又如中國佛教界的巨擘常山扶柳（今

147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67-70。

148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九，〈晉鄴中竺佛圖澄傳〉，頁 352。

149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九，〈晉鄴中竺佛圖澄傳〉，頁 356。

150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四，〈晉高竺法雅傳〉，頁 153。

151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四，〈晉中山康法朗傳〉，頁 154。

河北冀縣西南)道安,不但曾在飛龍山(今河北涿鹿縣境)習道,「後於至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年四十五時,又回到冀部(今河北高邑縣西南),住在受都寺,「徒眾數百,常宣法化。」¹⁵²四世紀時河北佛教顯然已經蓬勃發展。雖然湯用彤指出,道安與弟子八人誓生兜率之事應發生於道安在襄陽(今湖北襄樊)弘法期間(365-379),¹⁵³不過道安在河北傳道時,或許也已經信仰彌勒。換言之,四世紀中葉河北可能已有彌勒信仰的流傳。

北魏平城時期,當朝皇帝被視為彌勒的化身,因此彌勒信仰又加上了政治色彩。五世紀末,彌勒信仰的這種特質也傳到了河北。民國初年河北定縣料敵塔前出土的刻石〈七寶瓶銘〉言道:

太和十六年(492),道人僧暈為七帝,建三丈八彌勒像二菩薩,□一丈造素。至景明二年(501)鑄鐫訖,正始二年(505)歲次乙酉二月壬寅朔四日銘,旨三州教化。大像用赤金卅六萬六千四百斤,黃金二千一百斤;二菩薩用赤金四萬六千斤,黃金一千一百斤。大魏今上皇帝陛下,忠慕□追孝誠通敏,班旨三州,樂宣功就,略表始末,銘之後代耳。七寶瓶。前定州刺史彭城王元勰、定州刺史城陽王元鸞。¹⁵⁴

根據隋開皇五年(585)定縣〈七帝寺碑〉,〈七寶瓶銘〉的刻石原來應在定縣七帝寺。七帝寺的興建不見於史,然而應和太和十五年(491)太廟始成,孝文帝遷七廟神主於新廟有關。¹⁵⁵此篇銘文最後署名的彭城王元勰,¹⁵⁶乃獻文帝(466-471在位)的兒子,是孝文帝同父異母的兄弟;城陽王元鸞又是景穆帝(即太子監國晃)之孫。¹⁵⁷雖然這巨大的金銅彌勒三尊像的供養人僧暈究竟為何人?目前已不可考,但推測他極可能也是一位北魏皇室的成員。如此看來,七帝寺造像顯然上承文成帝為太祖以下的五帝鑄造五尊釋迦立像的傳統而作。僧暈發願所造的彌勒三尊像,費時十年始成、花費不貲,毫無疑問地是七帝寺大殿的主尊,極可能象徵著僧暈發願時的當今皇帝——孝文帝。北魏晚期,河北彌勒信仰普遍流行,深植人心,在這個

152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五,〈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傳〉,頁178。

153 湯用彤,《漢魏兩晉北朝佛教史》,頁217。

154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3冊,頁19。

155 有關七帝寺的研究參見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和北魏時期〉,《故宮學術季刊》,11卷4期,頁23-24;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附錄一:從七帝寺看定州佛教〉,頁118-129。

156 魏收,《魏書》,卷二十一下,〈彭城王勰傳〉,第2冊,頁571-583。

157 魏收,《魏書》,卷十九下,〈城陽王鸞傳〉,第2冊,頁509-510。

基礎上，延昌四年沙門法慶才能利用「新佛出世」這個口號，在冀、瀛二州聚集了五萬餘人造反。¹⁵⁸ 隋大業九年（613），唐縣（今河北唐縣）人宋子賢還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作亂，最後事洩被斬，並坐其黨羽千餘家。¹⁵⁹ 受到末法思想的影響，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565-572）唐邕於河北邯鄲峰峰礦區北響堂山石窟南洞外銘刻數部經，其中即有一部《彌勒成佛經》，¹⁶⁰ 足見北朝時彌勒信仰在河北已有深厚的群眾基礎，現存數量眾多的河北北朝彌勒像，就是這種宗教氛圍下的產物。

河北北朝造像中存留為數不少的金銅或石造像，許多銘刻著造像題記。依據題記，這些造像可明確地訂名為「彌勒」者就多達四十餘尊，以河北隆化縣出土的北魏泰常五年（420）劉惠造彌勒佛坐像（圖 54）年代最早，此像的題記云：「李翟平用同（當作銅）四斤。泰常五年五月五日，佛弟子劉惠造彌勒佛像。」¹⁶¹ 這尊彌勒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交疊於腹前，作禪定印，在獅子座上結跏趺坐。除此之外，太和二年（478）張賈造彌勒佛像和劉敬造彌勒佛像，¹⁶² 也採取與劉惠造像同樣的坐姿與手印。《觀佛三昧海經》〈觀四威儀品〉云：「此人觀像因緣功德，彌勒出世。見彌勒佛初始坐於龍華樹下，結跏趺坐。見已歡喜，三種菩提，隨願覺了。」¹⁶³ 這種彌勒佛禪定像或許典出這段經文。

義大利私人收藏中有一件太平真君五年（444）耿崇等造彌勒佛立像（圖 55），這尊立佛身著右袒式袈裟，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雖然這尊彌勒佛立像的出土地不明，但根據題記，¹⁶⁴ 此像的供養人是漁陽人耿崇及他的家人，漁陽在今河北省密雲縣西南三十里，故推斷此像乃河北之作。這類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彌勒佛立像，在世界各博物館及私人收藏中，屢見不鮮，如太和十六年（492）王常兄弟造彌勒佛立像、熙平元年（516）張圖等三十八人造彌勒佛立像、

158 有關十六國至北魏時期河北佛教的研究，參見顏尚文，〈隋龍藏寺碑考（一）——定州地區與國家佛教政策關係之背景〉，收入顏尚文，《中國中古佛教史論》，頁 399-407；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和北魏時期〉，頁 1-4、22-25。

159 魏徵等，《隋書》，〈五行志下〉，第 1 冊，頁 662-663。

160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響堂山石窟》，頁 62-63。

161 劉建華，《義縣萬佛堂石窟》，頁 141。

162 有關北魏河北彌勒造像的資料與研究，參見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和北魏時期〉，頁 1-80，以下不一一援引。

163 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七，〈觀四威儀品〉，收入《大正藏》，第 15 冊，頁 681 下。

164 該像的造像記云：「太平真君五年歲在甲申八月十二日，漁陽人松居耿崇、妻名陽□、耿雲、耿鎮、耿照衛，為父母、□兒，造彌勒尊像。東華化生，一會說法，得無生法忍。」（見 Alexander C. Soper,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Bronzes*, fig. 3c, 3d.）

正光五年（524）午猷造彌勒佛龕像（圖 56）等，根據題記，這些彌勒佛像的供養人也都是現今的河北人氏；在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土的造像中，亦發現數尊此類的彌勒佛像。此外，尚有數尊彌勒佛立像，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或握袈裟的衣角，如延興五年（475）韓令姜造彌勒佛像、太和廿二年（498）普貴造彌勒佛像等；又有一尊景明三年（502）劉未等彌勒佛立像，其左手下垂，但手掌向內，這些都可視為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彌勒佛立像的變形。

除了上述兩種彌勒佛外，在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的北魏佛像中，正光二年（521）張開造彌勒佛坐像¹⁶⁵（圖 57）和真王五年（529）楊天仁等二百人邑義造彌勒佛坐像，¹⁶⁶皆為右手作施無畏印、結跏趺坐的佛像。正光四年（523）邸拔延造彌勒佛像¹⁶⁷則雙足下垂，作倚坐的姿勢，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除了彌勒佛像外，在河北的北魏造像中，筆者僅發現 5 尊交腳彌勒菩薩像。河北易縣出土的一尊和平六年（465）交腳菩薩殘像，¹⁶⁸上身全殘，無法得知其手印為何。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的交腳菩薩三尊像（圖 58），從其風格觀之，似屬五世紀五〇年代前後之作。其雙手殘損，但原來應作轉法輪印，當是一尊彌勒菩薩像。在北魏晚期的河北金銅造像中，神龜元年（518）邳夏口金銅彌勒菩薩坐像，雖交腳而坐，但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下垂，屈無名指和小指，當可視為與願印的變形。另外尚有兩尊彌勒交腳菩薩像出現在熙平二年（517）傅次胡造觀音菩薩立像¹⁶⁹和武泰元年（528）鄧法念造觀世音菩薩立像¹⁷⁰背光的背部。至於延昌二年（513）陽穎原造金銅菩薩立像，¹⁷¹雖然祂的造像記稱之為「彌勒」，但右手作施無畏

165 該像題記云：「正光二年九月廿日，佛弟子張開為父母造彌勒上生像一軀。」（楊伯達著，松原三郎譯，《埋もれた中國石仏の研究》，拓片 2-1、2-2，頁 164。）

166 該像題記云：「真王五年正月八日，上曲陽城內唯那楊天仁等二百人邑義，為亡邑義造彌勒像一區。上為皇帝，下為受苦蒼生、見（現）在邑義，同生淨國，在佛文（聞）法，邊（遍）佛德（得）法，願願成佛，所求如意。」（胡國強主編，《你應該知道的 200 件曲陽造像》，頁 21，圖版 5。）

167 該像題記云：「正光四年七月廿三日、上曲陽人邸拔延為亡父、見（現）存母兄、既（自）身、合家養（眷）屬、造彌勒像一區。願生生直（值）佛。拔延侍佛。」（楊伯達著，松原三郎譯，《埋もれた中國石仏の研究》，頁 165，圖版 6。）

168 金中，〈易縣北魏交腳菩薩像造型上的幾個問題〉，《文物》，1997 年 7 期，頁 61-63；金中，〈關於北魏和平六年交腳菩薩像的補正〉，《文物》，1998 年 10 期，頁 41。

169 Alexander C. Soper,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Bronzes*, fig. 11d.

170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鄴城考古隊，〈河北臨漳鄴城遺址出土的北朝銅造像〉，《考古》，1992 年 8 期，圖一 1。

171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一〉，圖 64c。該像的造像題記云：「延昌二年歲在癸巳三月乙卯廿一日乙亥，泉州人陽穎原，為亡父、亡弟造彌勒像一軀。」（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 240。）題記中的泉州縣在今河北武清縣東南四十里。

印、左手下垂的圖像特徵與北魏晚期的觀世音菩薩像相同。¹⁷² 又因此像是一尊高僅 15 公分金銅像，恐具有佛事商品的性質，不視其為河北彌勒菩薩圖像的典型。

依據圖像特徵，河北的北魏彌勒圖像可分為六類：（一）雙手作轉法輪印的菩薩坐像，（二）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菩薩坐像，（三）雙手作禪定印的結跏趺坐佛像，（四）右手作施無畏印的結跏趺坐佛像，（五）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佛立像，以及（六）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佛像。目前筆者收得北魏刻具題名的河北彌勒像計 22 尊，彌勒佛計 18 尊，彌勒菩薩像有 4 尊，二者的數量相去甚遠。由此可見，在河北，彌勒佛的圖像較菩薩像更為流行，而彌勒佛像出現的年代又較彌勒菩薩像早，此點也頗引人注意。在上述四類的彌勒佛像類型裡，以第五類的數量最多，有 12 件，是河北最常見、最具代表性的彌勒圖像。

根據筆者所收河北北朝晚期造像資料，東魏的彌勒像有 5 尊，北齊有 18 尊，大部分的作品皆依題記定名，顯示北朝晚期河北的彌勒信仰仍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北齊的造像中有 3 尊交腳彌勒菩薩像，其中，乾明元年（560）莊嚴寺邑義造石彌勒菩薩坐像¹⁷³ 僅存下半身，雙手的手印不明。天保二年（551）張雙臥造彌勒菩薩坐像（圖 59）其右手舉起及肩，手掌向內，似持一蓮苞，左手作與願印，足下尚有二小神擎足。天保九年（558）劉白仁造彌勒菩薩坐像（圖 60）右手雖殘，但從斷毀的殘痕推測，原來可能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較特別的是，在其兩側各有一半跏思惟菩薩像。前文已述，這樣的尊像組合在陝西和山西北魏中、晚期的彌勒龕像中時有所見，可是在河北卻遲至北齊始出現，且數量稀少，值得注意。

除了交腳彌勒菩薩像外，上述的北魏第四、五、六類彌勒佛像在北齊時期皆有雕造。不過，第四類的右手作施無畏印的結跏趺坐佛像僅發現天保八年（557）黃海伯夫妻造彌勒佛坐像¹⁷⁴（圖 61）一例，而第五類的彌勒佛立像直至隋代仍有雕

172 李玉珉，〈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收入邢義田主編，〈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頁 268-269。

173 該像的題記云：「乾明元年七月八日，莊嚴寺共寺下諸趙邑人等，敬造彌勒下生像一區。仰皇帝陛下、師僧父母、法界有形，一時成佛。」（胡國強主編，〈你應該知道的 200 件曲陽造像〉，頁 90，圖 72。）

174 該像造像題記云：「天保八年正月廿日，佛弟子黃海伯并妻汲為七世內外，敬造白玉彌勒像一區。下及法界眾生，託生西方，上為皇陛下、趙郡大王、群僚百官、州郡令長，俱登彼岸。」（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 292。圖見同書，〈圖版一〉，圖 398。）

造，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的開皇五年（585）張波造彌勒佛立像¹⁷⁵即為一例。至於第六類的倚坐佛，在鄴都附近的北齊石窟中常可發現，如邯鄲峰峰礦區南響堂石窟第5窟右壁龕的主尊、第7窟左壁龕的主尊、涉縣娲皇宮北窟的主尊等。

除了上述諸種北魏時期已有的彌勒圖像，東魏、北齊時期，河北還出現兩種北魏不見的彌勒圖像，其中學界討論最多的就是半跏思惟菩薩像。馮賀軍的研究指出，在曲陽出土的兩千餘件造像及殘像中，題刻具年款的發願文者有271件，思惟像計47件。其中東魏9件，題記稱為太子思惟像者有1件，思惟像有4件，未具體指名者有4件；北齊有27件，題記稱作太子像或太子思惟像者有1件，龍樹思惟像者有3件，思惟像者有10件，未具體指名者有7件；隋代11件，有太子思惟銘者1件，思惟名者3件，未名思惟者7件。¹⁷⁶除了曲陽之外，同隸屬於古定州的河北藁城、正定等地也都有半跏思惟菩薩像出土，這種菩薩像無疑是東魏、北齊定州地區流行的佛教造像題材。根據造像記，大部分的半跏思惟菩薩像稱作「思惟像」，尚有一小部分稱為「太子」、「太子思惟像」、或「龍樹思惟像」。李靜杰和田軍認為，在定州的半跏思惟像的銘記中，並未發現彌勒的題名，同時定州半跏思惟像的造像記亦不見與彌勒有關的內容，這類造像題記中所見的「龍樹」與彌勒的成道樹——龍華樹——無關，所以定州的龍樹思惟像應代表悉達多太子。¹⁷⁷可是馮賀軍則指出，在定州半跏思惟像的造像記可發現部分與彌勒關係密切的內容，所以主張「龍樹思惟」就是彌勒思惟。¹⁷⁸究竟二者的看法孰是孰非？或許從天保九年劉白仁造彌勒菩薩坐像（圖60）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天保九年劉白仁造彌勒菩薩坐像的題記言：

天保九年十月八日，高貴安妻劉白仁為亡息高市興，造龍樹坐像一區，上為國家，右（又）為邊地，亡者生天，見令德（得）富。¹⁷⁹

這尊菩薩像交腳而坐，從圖像特徵觀之，應代表彌勒菩薩，所以此像題記中的「龍樹」理當指彌勒的成道樹龍華樹無疑。由此推斷，定州的龍樹思惟像應該指的就是彌勒思惟菩薩像。河北滄州博物館的收藏中，有一尊僧慶造半跏思惟菩薩像（圖

175 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的隋開皇五年（585）張波造彌勒佛立像，即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該像的題記云：「開皇五年七月廿七日，為忘（亡）息張文學，敬造彌勒像一軀。張波為息。」（胡國強主編，《你應該知道的200件曲陽造像》，頁127，圖107。）

176 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頁82。

177 李靜杰、田軍，〈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頁79。

178 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頁85-89。

179 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頁183。

62)，題記曰：「大齊天保八年（557）歲次丁亥五月己丑朔十五日，比丘僧慶敬造彌勒一區。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州郡令長、師僧父母僧。」¹⁸⁰此作更是認定部分河北的半跏思惟菩薩像就是彌勒的鐵證。目前筆者發現 4 件龍樹思惟像¹⁸¹皆為北齊定州之作，而僧慶造的彌勒半跏思惟菩薩像也雕鑿於北齊時期，如此看來，河北這類彌勒菩薩像大概只流傳於北齊時期。

除了半跏思惟菩薩像外，東魏末，河北還出現遊戲坐的彌勒佛像。正定縣秦家莊出土的一尊東魏武定七年（549）智顏淨勝造彌勒佛坐像，¹⁸²其右手已殘，左手舉起及胸，手掌向內，作歸命印。類似的彌勒像在河北藁城出土的河清元年（562）建忠寺門徒造雙彌勒坐像（圖 63A）也有發現。此像為一透雕，雕刻繁縟華麗。正面的二佛皆作遊戲坐，內側的手皆上舉至胸，手掌向內作歸命印，外側的手皆握衣角，無論二者的坐姿或手印皆與智顏淨勝造彌勒佛坐像相似。該像的題記稱這龕造像為「彌勒破坐像」。¹⁸³有趣的是，在主尊的背面則雕半跏思惟菩薩雙身像（圖 63B）與正面的彌勒佛雙身像互相呼應。不過，這類彌勒佛坐像皆雕鑿於東魏末至北齊初，流傳時間很短，且數量也不多。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收藏著一尊北齊坐佛五尊像（圖 64A），主尊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在雙樹下交腳而坐，足下各有一天神擎足，圖像特徵與張雙臥造彌勒菩薩坐像（圖 59）有些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該像背光背面（圖 64B）的樹葉上浮雕三尊佛坐像，其下雕一坐佛三尊像，主尊坐佛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兩側各有一半跏思惟菩薩像。由於在北齊的河北佛教造像中，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結跏趺坐佛有時代代表彌勒佛（圖 61），左右兩側的半跏思惟

180 魏文斌，〈麥積山石窟交腳與半跏思惟菩薩對稱構圖的研究〉，頁 83。

181 這 4 件龍樹思惟菩薩像分別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天保三年（552）寶副造龍樹思惟像、河北省博物館所藏天保六年（554）邸龍副造龍樹思惟像和天保九年（558）張寄興夫妻造龍樹思惟像，以及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天保十年（559）惠祖等造龍樹思惟像。前三件皆為河北曲陽修德寺出土的作品，而惠祖等造龍樹思惟像僅餘台座。參見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頁 85-86；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 296；圖見同書，〈圖版二〉，圖 394a、b、c、d。

182 該像的題記言：「武定七年二月十七日永固寺尼智顏、淨勝姊妹、兄弟三人等，上為國家、師僧、父母、邊地眾生，造彌勒玉像一區。」（王巧蓮、劉友恒，〈正定收藏的部分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1998 年 5 期，頁 74。圖版見同文，圖 3、7。）

183 該像的題記云：「河清元年八月廿日，建忠寺比丘尼賈度門徒等，上為國主檀越、邊方一切、七世西（先）忘（亡）、師僧父母、過去見（現）在、緣際道俗、有形之背（輩），敬造白玉彌肋（勒）破坐像一軀，通光夫（趺）三尺七寸。願使有緣之徒，生生世世，值佛聞法，常住快樂。施地造建忠寺主賈乾德。」（徐男英，〈河北藁城出土的北齊河元年銘白玉二仏坐像について——「彌勒破坐」銘の解釈を中心に〉，《美術史》，第 170 號，頁 319。）

像亦可視為至尊彌勒的化現。從此像的正、反兩面的圖像互相呼應的關係來看，這尊河北地區僅見的交腳佛可能也代表彌勒。

表五 河北北朝彌勒圖像流傳時間表

品名	圖像特徵		420	440	460	500	535	550	579
	姿勢	手印與持物							
彌勒菩薩	交腳坐姿	轉法輪印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半跏垂足	思惟相							
彌勒佛	結跏趺坐	禪定印							
	結跏趺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立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倚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遊戲坐	一手作歸命印							

(六) 山東

山東古稱齊魯，地處海陸交通樞紐，東漢時期篤信佛教的楚王英（？-71）和笮融（活動於二世紀末）即在魯南、蘇北一帶活動，所以山東是中國佛教發展較早的一個地區。在山東的東漢文物中，還出現一些受到佛教影響的圖像，更是東漢時期佛教在山東流傳的具體證明。¹⁸⁴ 西晉滅亡以後，山東成為羯、鮮卑、氐和漢等族的爭奪地區，先後受到後趙、前燕、東晉、前秦、後燕和南燕的統治。而後趙、前秦和南燕的君主都崇信佛教，在他們的護持下，山東佛教日益盛行。¹⁸⁵ 皇始元年（351）由河北移錫泰山的僧朗即在金輿谷崑崙山中建立精舍，四方聞名而來追隨僧朗的修行者多達百餘人，形成了山東最早的佛教教團。東晉義熙六年（410）劉裕率晉軍消滅南燕以後，山東便歸東晉管轄。劉裕稱帝（420）以後，這一地區又屬於劉宋的勢力範圍。劉宋與北魏對峙以來，山東一直是兩方的爭奪之地，戰事不

184 李玉珉，〈山東早期佛教造像考——劉宋至北魏時期〉，《故宮學術季刊》，21 卷 3 期，頁 2。

185 山東早期的佛教發展參見黃志成，〈四至六世紀山東地區佛教之研究——以寺院、僧侶與義邑為中心〉；李玉珉，〈山東早期佛教造像考——劉宋至北魏時期〉，頁 8-12。

斷。皇興三年（469）魏將慕容白曜攻陷東陽，山東始納入北魏版圖。義熙六年至皇興三年間，東晉和南朝統治山東地區達半個世紀之久，該地的佛教自應與晉宋同風，尚義理，闡教法。同時，該地又沒有受到北魏太武帝滅佛的波及，佛教維持穩定的發展。五世紀時，許多青州（轄境約為今山東青州、臨淄、臨朐、博興、諸城等地）僧侶客遊江南，為南人所重者更不計其數；同時，深受北魏皇帝禮敬的高僧惠始（約卒於438）也是青州清河（今山東臨清東北）人。足見五世紀時青州高僧在南、北的佛教界已占有一席之地。北魏入主山東以後，隨著北方佛教的傳入，南方所強調的義理思想與北方所重視的宗教行為在山東並行不悖，山東佛教內容更加豐富。

山東的彌勒信仰始於何時？史無明載。目前在筆者所整理的47則山東劉宋和北魏時期明確記載所造尊像名稱的造像記中，29則為彌勒，占了全數的一半以上，顯示當時彌勒信仰盛行。¹⁸⁶目前傳世最早的山東造像，為劉宋元嘉二十八年（451）齊郡（今山東臨淄）劉國之造彌勒像¹⁸⁷（圖65）。這尊佛像身著通肩袈裟，雙手重疊，作禪定印，豎立於腹前，結跏趺坐於一宣字座上。衣紋以身體中心為軸，呈U字形層層布排。雖然表現手法與圖像特徵與河北隆化文管所藏所藏的泰常五年劉惠造彌勒佛像（圖54）有些相似，可是劉國之所造的彌勒像額圓頰豐，面容恬雅，杏眼小嘴，五官娟秀，且較集中，雙肩窄削，身軀較為修長，胸腹微隆，衣紋流暢且繁密，流露出南朝溫婉的氣韻。在山東博興出土的金銅造像之中，筆者發現3尊手結禪定印的彌勒坐佛，依題記分別訂名為太和二年（478）劉氏造彌勒佛坐像、正始四年（507）□□造彌勒佛坐像和熙平二年（517）劉□□造彌勒佛坐像。¹⁸⁸

除了手結禪定印的彌勒佛坐像，根據題記的稱名，筆者尚發現11尊北魏時期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彌勒立佛，以及1尊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

186 參見李玉珉，〈山東早期佛教造像考——劉宋至北魏時期〉，頁1-79。有關本文所談山東地區劉宋至北魏的佛教造像請參考該文的圖版，以下不一一徵引。

187 該像的造像記云：「元嘉廿八年歲在辛卯□□劉國之今宗齊郡，為父母造彌勒像一區。願彌勒出世，德（當作得）成佛道。劉國之像。」

188 山東惠民縣溝盤河出土的太和二年劉氏造彌勒坐像，其造像記云：「太和二年歲在戊午，阜城□□妻劉敬造彌勒尊像。願彌勒出世，夫妻□□□□集自□□□。」（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240。圖見同書，〈圖版一〉，圖7。）正始四年（507）□□造彌勒佛坐像題記云：「□□四年歲在丁亥，廣平□□□造彌勒像一尊。」熙平二年（517）劉□□造彌勒佛坐像題記云：「熙平二年一月三十日，劉□□造彌勒像一軀。」此二件皆為山東博興龍華寺遺址出土，題記見李少南，〈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銅造像〉，《文物》，1984年5期，頁28、23，圖版見同文，圖10、23。

衣裾的彌勒立佛，足見右手作施無畏印的立佛應是山東北魏最流行的彌勒圖像。太和年間所造者計 4 尊，以太和六年（482）范壽造彌勒佛立像¹⁸⁹的年代最早，永平五年（512）有 1 尊，其餘 7 尊皆為正光年間（520-525）以後之作（圖 66）。由此看來，在山東這種彌勒圖像在北魏晚期越來越流行。在這些立佛中，太和八年（484）李晃之等造彌勒像¹⁹⁰十分特殊。這尊立佛頂有肉髻，上身全袒，下著長裙，肩披天衣，右手握天衣的衣端，穿著好似菩薩一般，這身打扮與其他的佛像大異其趣，不過類似的佛像造型在西元二世紀印度的彌勒造像裡也有發現。¹⁹¹由於此像為一孤例，其是否受到印度造像的啟發？目前尚難遽下結論。

在筆者所收的北魏山東彌勒像中，僅發現 2 尊彌勒菩薩像，一為據傳為山東黃縣出土的皇興三年（469）趙瑯造交腳彌勒菩薩坐像，¹⁹²雖然該像的題記已見於清末的金石著錄，¹⁹³但從該像的開面、服式、風格特徵來看，顯然為一贗品，乃清末的偽刻，在此不論。另一件為臨流博物館所藏正光六年（525）宣景建夫妻造彌勒菩薩像，¹⁹⁴其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由於此像為一金銅菩薩像，連台座和背光的全高為 25 公分，雖然該像的造像記清楚記載此尊菩薩為「彌勒」，可是在山東的北魏晚期金銅佛像裡，大部分具同樣圖像特徵的菩薩像，造像記稱之為「觀世音」。¹⁹⁵因考慮到小型金銅佛的造像記可能因應供養者的需求，題刻尊像名號的可能性，本文也不視其為山東北魏時期具代表性的彌勒圖像類型。

依據以上的分析，山東北魏的彌勒像主要是以佛像的形式出現，與其他地區相較，其圖像種類單純，僅有雙手作禪定印的結跏趺坐佛像和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佛立像兩類。在 29 則山東的北魏彌勒像的造像記中，西元 500 年以前者僅有 8 則，500

189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六朝時代の金銅仏》，圖錄 96。雖然該書提及，此像應為東魏之作，而光背後的題記為後刻。然從該像以及題記的風格特徵，筆者認為此像可為太和六年之作。參見李玉珉，〈山東早期佛教造像考——劉宋至北魏時期〉，頁 15。

190 該像的造像題記云：「太和八年十月十六日，發干縣（在今山東省堂邑縣西南二十三公里）人李晃之、李山之上為（右側）父母，下為二房眷屬，造彌勒像一區。若願二房（背面）大小常奉干聖，願願從心，所求如意（左側）。」（大和文華館，《中国の金銅仏》，圖錄 11。）

191 印度 Ahicchatra 出土了一尊彌勒菩薩像，上身袒露，肩披天衣，僅著下身裙裳，身佩瓔珞，雖然為一尊菩薩像，不過其頂有小螺髻，又似佛像。這件作品與李晃之等造彌勒像有些雷同。圖見 Susan L. Huntington and John C. Huntington, *The Art of Ancient India*, fig. 8:34.

192 李玉珉，〈山東早期佛教造像考——劉宋至北魏時期〉，圖 3。

193 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卷二，頁 1。收入嚴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乙編之十七》，第 89 冊；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卷十，〈補遺〉，頁 25。收入嚴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乙編之二十六》，第 98 冊。

194 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 265；圖見同書，〈圖版一〉，圖 169b。

195 李玉珉，〈山東早期佛教造像考——劉宋至北魏時期〉，頁 35。

年以後者卻計 21 則，顯示北魏晚期，山東的彌勒信仰益趨流行。史載，延昌四年沙門法慶打著「新佛出世，除去舊魔」的口號在冀州聚眾造反時，很快地勃海（今山東高苑縣西北）大族李歸伯不但「合家從之」，還「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¹⁹⁶山東李歸伯支持法慶一事，可視為北魏晚期當地彌勒信仰盛行的佐證。

筆者目前收得 9 筆山東東魏彌勒像的題記，除了 2 尊未見圖像外，其他 7 尊皆為佛像，1 尊為雙手結禪定印的結跏趺坐佛，¹⁹⁷6 尊為右手作施無畏印的立佛，足見上承北魏傳統，立佛的形式仍是東魏時期山東最重要的彌勒圖像。

目前筆者僅發現 3 尊山東的北齊彌勒像，分別為天保五年（554）張子昂等造彌勒佛像、¹⁹⁸天保六年（555）孟表等造彌勒立像¹⁹⁹和河清三年（564）孔昭倂造彌勒菩薩坐像²⁰⁰（圖 67）。其中，張子昂等造彌勒佛像並未發表圖片，孟表等造彌勒立像已殘，僅存脇侍一軀，孔昭倂造彌勒菩薩坐像則為一尊交腳菩薩坐像，極為特殊。前文已述，自五世紀初以來，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交腳菩薩像是中國西北與華北中、西部最流行的一種彌勒圖像，而在山東，這種彌勒圖像不但數量稀少，而且遲至北齊始出現，充分反映北朝時期，東、西兩地的圖像發展並不同步的現象。

表六 山東劉宋、北朝彌勒圖像流傳時間表

品名	圖像特徵		420	440	460	500	535	550	579
	姿勢	手印與持物							
彌勒佛	結跏趺坐	禪定印							
	立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196 魏收，《魏書》，卷十二，〈京兆王傳〉，第 2 冊，頁 445。

197 此例為歷城黃石崖第 11 號龕，該龕為一禪定佛三尊像龕，此龕的題記云：「大魏元象二年（539）歲次己未三月廿三日，假伏波將軍魏郡丞姚敬遵敬造彌勒像一區，畫飾訖功。上為七世□父母、現在眷屬，常與善居，值佛聞法，一切眾生，咸同斯福。息暉振、彥宗、僧寶、惠鳳、清虎、子林。」（張總，〈山東歷城黃石崖摩崖龕窟調查〉，《文物》，1996 年 4 期，頁 44。）

198 題記見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頁 319。

199 題記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本文編〉，頁 295；圖見同書，〈圖版二〉，圖 385a。

200 該像的題記云：「河清三年四月八日，樂陵縣孔昭倂……造彌勒像一軀……□世六事。」（張淑敏等，《山東博興銅佛像藝術》，頁 86。）

(七) 南朝

東漢末年，篤信佛教的楚王英與笮融已在廣陵（今江蘇揚州）、彭城（今江蘇徐州）推廣佛教，江蘇連雲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發現數尊東漢晚期的佛像，²⁰¹即佛教在蘇北地區流傳的明證。另外，四川墓葬中，也發現一些東漢末至蜀漢時期（221-263）的小型坐佛，²⁰²也是佛教初傳南方的重要遺存。

孫吳時期（222-280），支謙、康僧會、維祇難、竺律炎、支疆梁接等紛紛由中原或交趾等地到建業（今江蘇南京，南朝改稱建康）弘法譯經，更奠定了江南地區佛教發展的基礎。赤烏十年（247）康僧會在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孫權令人以碓重擊他所獻的舍利，但舍利卻絲毫無損，孫權大為歎服，乃於康僧會獻舍利的地方建立塔寺，名之為「建初寺」，並稱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佛法遂興。²⁰³東晉時期（317-420），佛教依附玄談，許多高僧與南遷的貴族往來頻繁，佛教遂在貴族間廣泛流傳。南朝時（420-589），大批西域和天竺名僧至建康，南方的譯經事業空前發達。同時，南朝各代帝王均積極護持佛教，佛教發展更加蓬勃。尤其是梁武帝（464-549）「溺於釋教」，²⁰⁴不但禮遇名僧，屢次召開萬人的大型法會，並親自講經著疏，且四度捨身出家。在他統治期間（502-549），南朝佛教發展到達了巔峰。唐代法琳《破邪論》提到，蕭梁時期（502-557），僅梁都建康一地即有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眾常有萬人。²⁰⁵《辯正論》又言，蕭梁時期，全國的佛寺有 2,846 所，僧尼逾 82,700 人。²⁰⁶和東晉相比，南方的寺院增加了千餘所，而僧尼更增加三倍多，真可謂盛況空前。可惜屢經戰亂，南朝佛教寺院與藝術破壞嚴重，目前存世的南朝佛教造像僅有百餘件，根本無法反映南朝佛教的真實面貌。

在現存少量的南朝佛教造像裡，仍發現數尊彌勒像，可見彌勒信仰在南方也有

201 中國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連雲港市文物管理委員辦公室、連雲港市博物館編著，《連雲港孔望山》，圖 50、67、85。孔望山摩崖雕刻的年代眾說紛紜，《連雲港孔望山》一書的研究指出，從人物的造型、服飾、器具，以及雕刻的手法等來看，應為東漢晚期之作。（參見《連雲港孔望山》，頁 210-219。）

202 楊秋莎，〈漢魏時期蜀漢、孫吳墓葬中的佛教遺物〉，《四川文物》，2003 年 5 期，頁 44-49。

203 參見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頁 16。

204 李延壽，《南史》，卷七，〈武帝紀論〉，第 1 冊，頁 226。

205 《梁記》云：「東臺西府相繼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眾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無倦，各歷世榮也。」引文見法琳，《破邪論》，卷下，收入《大正藏》，第 52 冊，頁 487 中。

206 參見法琳，《破邪論》，卷三，收入《大正藏》，第 52 冊，頁 503 中。

流傳。許多學者指出，南方的彌勒信仰源於中原。²⁰⁷ 小野勝年又指出，南方彌勒信仰的傳播是在法顯返華（412）以後始逐漸展開。²⁰⁸ 不過《廣弘明集》載錄支道林（314-366）的〈彌勒讚〉已提到：

釋迦登幽閑，彌勒承神第，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五。龍飛兜率天，法鼓振玄宮，逸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跏曜芳蓮，寥朗高懷興，八音暢自然，恬智冥微妙。縹眇詠重玄，磐紆七七紀，應運莅中璠，挺此四八姿，映蔚花林園，亹亹玄輪奏，三摠在昔緣。²⁰⁹

根據文中「釋迦登幽閑，彌勒承神第」、「龍飛兜率天，法鼓振玄宮」、「挺此四八姿，映蔚花林園」的這些文句，彌勒不但是繼承現在佛釋迦牟尼法統的未來佛，也是正在兜率天宮說法的菩薩，同時其將來又會在華林園中主持龍華三會，普度眾生。支道林幼年即流寓江南，長期在建康附近與浙江活動。從他撰著〈彌勒讚〉的內容來看，四世紀中葉江南地區顯然對彌勒信仰已不陌生，足證江南地區流傳彌勒信仰的時間較法顯自西域返國的年代早了半個世紀。前文已述，道安率領弟子八人誓生兜率的事件應發生他在襄陽傳法之際（365-379），而支道林亡歿於晉太和元年（366）。由此看來，支道林所推動的彌勒信仰應與道安一系也無太多關連。

由於襄陽即今湖北襄樊，地屬南方，而道安的弟子僧輔與曇戒又長年在荊州傳法。²¹⁰ 四世紀下半葉道安系的彌勒信仰顯然在湖北地區廣泛流傳。此外，義熙九年（413）隨劉裕至揚都（今南京）的佛馱跋陀羅，在來華以前便篤信彌勒，²¹¹ 其在江南傳法之際，想必也宣揚彌勒信仰。在這麼多名僧的弘傳下，東晉時期彌勒信仰在南方想必已日漸普遍。

劉宋時期（420-479），奔宋的北涼安陽侯沮渠京聲又在建康翻譯了彌勒信仰重要的經典《彌勒上生經》，彌勒信仰的內容更加豐富，當時敬事彌勒的僧尼日眾。

207 宿白，〈南朝龕像遺迹初探〉，收入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頁189；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頁72。

208 小野勝年，〈新城・石城寺とその弥勒像——江南巨大石仏の史的遍歴——〉，《佛教藝術》，第162號，頁18-19。

209 道宣，《廣弘明集》，卷十五，〈彌勒讚〉，收入《大正藏》，第52冊，頁197上。

210 參見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五，〈晉荊州上明寺竺僧輔傳〉，頁196；卷五，〈晉長沙寺釋曇戒傳〉，頁204。

211 《高僧傳》云：「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五，〈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傳〉，頁70。）

吳郡尼師玄藻「常翹心注想，願生兜率。」²¹² 元嘉二年（425），曇斌在江陵四層寺的般若臺，夢見彌勒摩頂。²¹³ 元嘉九年（432）釋法祥造彌勒精舍。²¹⁴ 齊昌寺的法盛「願求捨身，必見彌勒。」²¹⁵ 蜀郡常元祖元嘉二十四年（447）往生後，在夢中與其友人言：「我從任法師，受菩薩戒，今得生兜率天。」²¹⁶ 成都香積寺的道法「於彌勒像前，養飴蚊虻，如是多年，後見彌勒放種種光。」²¹⁷ 根據這些資料，劉宋時期彌勒信仰已在各地廣泛流傳。

蕭齊高帝蕭道成（479-482 在位）崇佛甚篤，手寫《法華經》八部、金字《法華經》二部，曾「夢見自身左右有羽翼，飛到天上，即兜率宮，前入內院。彌勒告曰：『高帝并諸侯皆來我所，法華力耳。汝還人間，宜告此事，即特飛下見羽翼，是《法華》一品，諸君莫懈怠。』王臣彌發信心焉。」²¹⁸ 文惠太子（493 卒）曾造石彌勒，並令沈約作〈彌勒贊〉。²¹⁹ 蕭齊〈竟陵文宣王法集錄〉中有「龍華會并道林齋一卷」的記載，²²⁰ 蕭子良所作的〈淨住子淨行法〉又言：「奉為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眾生。敬禮一切僧寶，敬禮當來下生佛兜率天彌勒菩薩僧。」²²¹ 安樂寺的曇副曾造《法華》、《無量壽》、《彌勒》、《四天王》等經，並於夢中，或「有人語之曰：『若兜率之業已辦，無所復慮也。』」又夢彌勒佛手摩其頂。²²² 廬山香爐峰寺的僧景（440-497）「禪味始具，每斂心入寂，偏見彌勒如來。」²²³ 禪林寺尼淨秀歿後得生兜率天。²²⁴ 齊末的寶亮（443-509）「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眾經，盛于京邑。講……《法華》、……《彌勒下生》等亦皆近

212 釋寶唱著，于儒童校註，《比丘尼傳校註》，卷二，〈吳太玄臺寺釋玄尼傳〉，頁 63。

213 寶亮，《名僧傳抄》，〈曇斌傳〉，收入《卍續藏經》，第 134 冊，頁 17 下。

214 寶亮，《名僧傳抄》，〈法祥傳〉，收入《卍續藏經》，第 134 冊，頁 27 上。

215 寶亮，《名僧傳抄》，〈法盛傳〉，收入《卍續藏經》，第 134 冊，頁 26 上。

216 寶亮，《名僧傳抄》，〈道汪傳〉，收入《卍續藏經》，第 134 冊，頁 22 上。

217 寶亮，《名僧傳抄》，〈道法傳〉，收入《卍續藏經》，第 134 冊，頁 24 下。

218 僧詳，《法華經傳記》，卷八，〈齊太祖高帝〉條，收入《大正藏》，第 51 冊，頁 87 中 - 下。

219 道宣，《廣弘明集》，卷十六，收入《大正藏》，第 52 冊，頁 212 中。

220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二，〈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雙錄序〉，頁 452。

221 文宣公，〈淨住子淨行法·奉養僧田門第二十七〉，引文見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七，收入《大正藏》，第 52 冊，頁 319 中 - 下。

222 寶亮，《名僧傳抄》，〈曇副傳〉，收入《卍續藏經》，第 134 冊，頁 27 上。

223 虞義撰，〈廬山香鑪峰寺景法師行狀〉，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三，《大正藏》，第 52 冊，頁 270 上。

224 沈約〈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收入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三，收入《大正藏》，第 52 冊，頁 270 中 - 272 上。

十遍。」²²⁵ 蕭梁的僧旻（474-534）「嘗造彌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彌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²²⁶ 梁陳之際，慧思（514-577）曾「夢彌勒、彌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從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²²⁷ 蕭梁宗懷（約 500- 約 563）《荊楚歲時記》提及，「荊楚以四月八日諸寺各設會，香湯浴佛，共作龍華會，以為彌勒下生之徵也。」²²⁸ 足見，彌勒信仰在蕭梁時期已有深厚的社會基礎，自應有不少的彌勒造像，只可惜現在保存下來的卻屈指可數。筆者目前收集到的 10 則南朝彌勒造像記，其中有些造像不存，部分則真偽尚有疑異，因此以下將結合實物和文獻資料，進行南朝彌勒圖像的討論。

由於支道林〈彌勒讚〉中有「結跏趺芳蓮」之語，故而推測此文可能是為彌勒結跏趺坐像所作的讚詞。若此說無誤的話，那麼在四世紀中葉江南地區已有彌勒像的雕造，不過此像究竟是一尊佛像，抑是菩薩像？已無從查考。《法苑珠林》還有一則與東晉彌勒像有關的記載，值得注意。該書言道：

晉世有譙國戴逵（326-392），字安道者，風清概遠，肥遯舊吳。宅性居理，游心釋教，且機思通贍，巧擬造化。……逵第二子顓，字仲若。……亦繼志才巧，逵每製像，常共參慮。濟陽江夷少與顓友，夷嘗託顓造觀世音像，致力罄思，欲令盡美，而相好不圓，積年無成。後夢有人告之曰：「江夷於觀世音無緣，可改為彌勒菩薩。」戴即停手，馳書報江。信未及發，而江書已至，俱於此夕感夢，語事符同。戴喜於神應，即改為彌勒，於是觸手成妙。初不稽思，光顏圓滿，俄爾而成。有識讚仰，咸悟因緣之匪差。此像舊在會稽龍華寺。²²⁹

文中提到，江夷原本委請戴顓造觀世音像一尊，後來因江夷與觀世音無緣，故而改造為彌勒像，後來此像被迎請到會稽龍華寺奉置。因為現存的南北朝觀世音菩薩像大多為立像，故推測戴顓所造的這尊彌勒像大概也是一尊菩薩立像。

北魏酈道元（約 470-527）《水經注》〈泗水〉條載：「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泗

225 道宣，《續高僧傳》，卷五，〈釋僧遷傳〉，收入《大正藏》，第 50 冊，頁 461 下。

226 道宣，《續高僧傳》，卷五，〈釋僧旻傳〉，收入《大正藏》，第 50 冊，頁 463 中。

227 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七，〈陳南岳衡山釋慧思傳〉，收入《大正藏》，第 50 冊，頁 562 下。

228 宗懷，《荊楚歲時記》，引文見韓鄂撰，沈士龍、胡震亨同校，《歲華紀麗》，卷二，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 1 輯》，頁 15。

229 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十六，〈敬佛篇·彌勒部〉，第 2 冊，頁 543-544。

水西有龍華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²³⁰ 遠赴天竺求法的法顯義熙八年（412）在青州登陸後不久，便在彭城附近建立龍華寺。龍華樹乃彌勒的成道樹，故此寺與彌勒的關係必然密切。至於法顯所持的「龍華圖」為何？宿白先生認為，其當是圖繪彌勒於華林園龍華樹下的成道像，²³¹ 應為一尊彌勒佛像。

寶唱的《比丘尼傳》尚載，元嘉八年（431），道瓊曾在建康瓦官寺奉置「彌勒行像一軀，寶蓋瓔珞。」²³² 元嘉十六年（439）龍華寺的道矯「與建康民朱舛孫，共起佛殿三間，并諸花幡，造夾紵彌勒佛倚像一軀，高一丈六尺，神儀端嚴，開發信悟。」²³³ 雖然目前已無從查考道瓊所奉彌勒行像的圖像特徵，但從「行像」二字來推測，應為一尊立像。根據這些資料，可以確定的是，劉宋時期江南流傳的彌勒像至少有菩薩立像和倚坐佛像兩種形式。²³⁴

《出三藏記集》〈龍華像會集〉條下載錄周顒作〈宋明皇帝初造龍華誓願文〉、〈京師諸邑造彌勒像三會記〉和〈齊竟陵文宣王龍華會記〉三則品目。²³⁵ 小野勝年與宿白先生均指出，這些「龍華像」當是在表現彌勒在龍華三會為說法佛的形象。²³⁶

在南朝彌勒造像的遺存中，最重要的當屬浙江新昌寶相寺彌勒佛龕像，此即蕭齊名僧僧護發願鑿刻的剡溪石城山彌勒佛像。該窟龕的平面略作橢圓形，中雕高13.23公尺的坐佛一尊，此佛身著雙領下垂式袈裟，手結禪定印，結跏趺坐在高2.4公尺的佛座上。《高僧傳》卷十三〈僧護傳〉對此像雕造的原委記述甚詳，云：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意常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叢樹

230 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二十五，中冊，頁2144。

231 宿白，〈南朝龕像遺迹初探〉，頁187。

232 釋寶唱著，于儒童校註，《比丘尼傳校註》，卷二，〈建福寺道瓊尼傳〉，頁47。

233 寶亮，《名僧傳抄》，〈道矯傳〉，收入《卮續藏經》，第134冊，頁26下。

234 陝西歷史博物館的收藏中，有一尊陝西榆林徵集的金銅倚坐佛像，該像的題記云：「景平元年（423）正月十四日，佛弟子王世成敬造彌勒像一軀。為亡過父母、現存夫妻，為四恩六道、法界眾生，但升妙果（國）。」景平乃劉宋少帝的年號，故許多學者皆視此作為南朝之作。但金中的研究指出，此像當為偽作，本人同意金中的看法。參見金中，〈榆林發現的劉宋金銅佛像質疑〉，《文物》，1995年12期，頁61-64。

235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第七〉，頁486。

236 小野勝年，〈新昌·石城寺とその彌勒像——江南巨大石仏の史的遍歴——〉，頁19；宿白，〈南朝龕像遺迹初探〉，頁188。

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明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爐發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494-497）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疏鑿移年，僅成面璞。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507），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即馳啟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鑿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胸萬字處，猶不施金罽，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513）春就功，至十五年（516）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眾基業，以充供養，……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本卒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²³⁷

劉勰（約 465- 約 522）〈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以下簡稱〈石城寺石像碑〉）對此事的記述更詳，提到永明四年（486）僧護來到隱岳寺，其「願造彌勒，敬擬千尺，故坐形十丈」，可是雕鑿多年，「僅成面璞」。後建安王延請定林上寺的僧祐重新主持，由於其發現「初護公所鑄，失在浮淺，乃鑿入五丈，改造頂髻，事雖仍舊，功實創新。」在雕刻右掌時，「忽然橫絕，改斷下分，始合折中，方知自斷之異，神匠所裁也。及身相克成，瑩拭（當作飾）已定，當於萬字，信宿隆起」。此像自天監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動工，至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妝畫云畢，像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頂十丈，圓光四丈，座輪一丈五尺，從地隨龕光焰通高十丈。」²³⁸ 北宋咸平五年（1002）僧辯端撰〈新昌縣石城山大佛身量記〉（以下簡稱〈大佛身量記〉）又詳述此龕像的尺寸，提到：「龕高一十一丈，廣七尺（當應為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一十丈，座廣五丈有六尺；……兩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²³⁹ 小野勝年檢視上述諸文獻後指出，雖然新昌寶相寺的彌勒佛龕屢經重葺，但僧護、僧祐所

237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十三，〈釋僧護傳〉，頁 490-492。

238 劉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引文見宿白，〈南朝龕像遺迹初探〉，頁 180-181。

239 僧辯端，〈新昌縣石城山大佛身量記〉，引文見宿白，〈南朝龕像遺迹初探〉，頁 183。

設計的彌勒佛即是現在所見的禪定佛形式。²⁴⁰不過，宿白先生卻認為〈石城寺石像碑〉、《高僧傳》和辯端的〈大佛身量記〉所記大佛形象與今像有別，又因為普通六年（525）公孫伯城夫婦造彌勒銅佛是作倚坐像的造型，²⁴¹故推斷南朝時刻溪石城山的彌勒像和現在重妝的彌勒佛像差別甚大，其原本應採頂有螺髻、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佛形象。²⁴²

仔細研讀上述這些文獻，《高僧傳》和〈石城寺石像碑〉皆言僧祐「更施頂髻」或「改造頂髻」，故知此像頂有肉髻，自為一尊佛像無疑。《高僧傳》言：「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石城寺石像碑〉則載：「像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頂十丈」。根據二文中的「坐軀」或「像身坐」高五丈的記載，研判此像當為一尊坐像。至於《高僧傳》中令人費解的「立形十丈」，究為何意？今參考〈石城寺石像碑〉，筆者認為在《高僧傳》的記載中，「立形」二字前脫漏了一個「若」字，意指此尊坐佛如果站立的話，則高達十丈。至於這尊彌勒坐像的手印為何？從〈石城寺石像碑〉的「始合折中」四字來看，筆者推測，此像的雙手可能上下交疊，作禪定印。又根據〈大佛身量記〉「兩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之言，筆者推測僧祐監造完成的刻縣石城山的彌勒佛像當採結跏趺坐的姿勢，其下有一寬五丈六尺的台座。綜上所述，筆者同意小野勝年之說，蕭梁時僧祐完成的刻縣石城山彌勒佛像，大概是一尊手結禪定印的結跏趺坐佛像。實際上，山東地區鑄造的劉宋元嘉二十八年劉國之造彌勒像（圖 65）即採這種形式，這種彌勒圖像顯然很早便在南朝流傳。

目前筆者僅發現三尊刻具題記的南朝彌勒造像，一為 1921 年四川茂縣出土的永明元年（483）釋玄嵩造石彌勒、無量壽二面像。這件造像碑在流傳的過程中斷為四塊，復原後的基本狀況如下：造像碑正面龕高 120 公分，寬 60 公分，內雕身著褒衣博帶袈裟坐佛一尊（圖 68A），其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下垂，手掌向外，屈無名指與小指，應是與願印的一種變形。背面龕高 123 公分，寬 53 公分，內雕身著褒衣博帶袈裟立佛一尊（圖 68B），手印與正面龕相同。碑的左側有造像題記六行，言道：

齊永明元年歲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涼曹比丘釋玄嵩為帝主臣王、累世師

240 小野勝年，〈新昌·石城寺とその彌勒像——江南巨大石仏の史的遍歴——〉，頁 27。

241 此像的題記云：「大梁普通六年二月十五日，清信佛弟子公孫伯成夫妻，敬造彌勒像一區。上為國家、四方安靜，一切洽生之類，普同其願。」（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頁 163。圖見同書，〈附圖〉，圖 433。）

242 宿白，〈南朝龕像遺迹初探〉，頁 183-185。

長、父母兄弟、六親眷屬，及一切眾生，敬造无量壽、當來彌勒成佛二世尊像。願一切群生發弘曠心，明信三寶，瞿修十善，遭遇慈氏，龍華三會，聶豫其昌，永去塵結，法身滿足，廣度一切，共成佛道。比丘釋成操□□□，其成此功。²⁴³

由於在立佛的右上角題刻「无量壽佛」四字，故知此碑另一面的結跏趺坐佛，即是題記中所說的「當來彌勒成佛」。²⁴⁴

第二件彌勒佛像亦是 1995 年成都西安路出土的永明八年（490）釋法海與母造彌勒佛三尊像（圖 69A），該像的題記云：

齊永明八年庚午歲十二月十九日，比丘釋法海與母為亡父造彌勒成佛石像一軀。願現在眷屬、七世父母，龍華三會，希登初首，一切眾生，普同斯願。²⁴⁵

雖然此作主尊坐佛的右手略有殘缺，但從現況仍知此尊彌勒佛兩手的手印與玄嵩所造的彌勒佛像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此像背光的背面浮雕著一個屋形龕（圖 69B），中央是一尊交腳菩薩像，兩手皆殘，但很可能原來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類似的交腳菩薩像在成都商業街出土的建武二年（495）釋法明造觀音成佛像的背面亦有發現。²⁴⁶在北魏的佛教造像中，彌勒交腳菩薩像十分普遍，故知這兩件交腳菩薩像也應代表彌勒。

除此之外，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中，發現一尊高僅 10.9 公分、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金銅佛立像（圖 70），背光背面的題記云：「大同三年（537）七月十二日，比丘僧成造彌勒像一軀。」足見，六世紀上半葉南朝也出現了彌勒佛立像的形式。

在成都萬佛寺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中，雙菩薩立像碑²⁴⁷的上方殘石特別值得注意。此石的背面浮雕一幅內容豐富的彌勒經變圖²⁴⁸（圖 71）。李裕群²⁴⁹與小泉惠

243 袁曙光，〈四川茂縣南齊永明造像及其有關問題〉，《文物》，1992 年 2 期，頁 69。

244 袁曙光，〈四川茂縣南齊永明造像及其有關問題〉，頁 69。

245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簡報〉，《文物》，1998 年 11 期，頁 6。

246 張肖馬、雷玉華，〈成都市商業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 年 10 期，圖 7、8。

247 謝振發的研究指出，成都萬佛寺出土的雙菩薩立像碑與正面為須彌山浮雕的殘石本屬同一件造像碑。（謝振發，〈成都市萬佛寺址出土の南朝造像碑とその經變圖〉，《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vol. 24 (2005)，頁 168-172。）

248 趙聲良，〈成都南朝浮屠彌勒經變與法華經變考論〉，《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頁 35。

249 李裕群，〈試論成都地區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文物》，2000 年 2 期，頁 67。

英²⁵⁰推斷此件碑可能為蕭梁後期之作。此幅經變分為三層，最上層的中央為一頂有五支相輪的塔形龕，龕中主尊為一頂戴寶冠、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交腳而坐的菩薩像，代表《彌勒上生經》所說在兜率天宮說法的彌勒菩薩。彌勒菩薩龕右側有一屋形建築，屋外有蓮池圍繞，池前有一龍，龍前有一人持帚掃地。在左側與其相對應的位置也有一龍與持帚掃地的人物。左側尚有一圓塚，塚中坐著一人，三人持杖立於塚外。此外，在彌勒菩薩龕的兩側各立一柱，上安摩尼寶珠，這些畫面的內容都典出《彌勒下生成佛經》，該經言：

是時有一大城，名翅頭末，……街巷道陌廣十二里，掃灑清淨，有大力龍王名曰多羅尸棄，其池近城龍王宮殿，在此池中常於夜半，降微細雨用淹塵土。……巷陌處處有明珠柱，皆高十里，其光明曜，晝夜無異，燈燭之明不復為用。……有大夜叉神名跋陀波羅睺塞迦，常護此城，掃除清淨。……人命將終，自然行詣塚間而死。²⁵¹

足見，經變浮雕中的龍代表大力龍王多羅尸棄，持帚掃地者是守護翅頭末城的跋陀波羅睺塞迦夜叉，菩薩龕兩側的立柱乃明珠柱，左側的畫面則在表現「人命將終，自然行詣塚間而死」這段文字。

中層是三鋪樹下佛說法圖，每鋪的主尊坐佛皆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道場四周樹林環繞，在表現《彌勒下生經》中所說，彌勒佛在華林園中龍華三會說法的場面。根據經文，在這三會中，分別有九十六億人、九十四億人與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果，故畫面中聽法的群眾都作比丘形。三會說法間有水道相隔，又有橋樑相接，是翅頭末城「諸園林池泉之中，自然而有八功德水。……其池四邊四寶階道」²⁵²的寫照。最下層的中央在兩明珠柱間有一說法佛，祂的右側為人們在田中耕種的畫面，則是在描繪翅頭末城「雨澤隨時，穀稼滋茂，不生草穢，一種七穫，用功甚少所收甚多」²⁵³的情況。《佛說彌勒大成佛經》經末又載：

爾時，彌勒佛與娑婆世界前身剛強眾生及諸大弟子，俱往耑闍崛山到山下已，安詳徐步登狼跡山，到山頂已舉足大指躡於山根，……爾時……摩訶迦葉即從滅盡定覺，齊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合掌，持釋迦

250 東京国立博物館編集，《中国国宝展》，頁182、293。

251 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收入《大正藏》，第14冊，頁423下-424上。

252 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收入《大正藏》，第14冊，頁424上。

253 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收入《大正藏》，第14冊，頁424上。

牟尼佛僧迦梨授與彌勒。²⁵⁴

經變左側山林中有一尊立佛，四周眾比丘環繞，在其身前有一比丘跪在方台之上，雙手奉物，正是大迦葉傳付法衣的場面。

這鋪彌勒經變將《彌勒上生經》的彌勒菩薩在兜率天宮說法的畫面置於上方，並將《彌勒下生經》所言之龍王夜雨、羅剎掃城、老人入墓、龍華三會、一種七穫、處處皆有明珠柱、大迦葉傳付法衣與彌勒等內容，描寫在彌勒菩薩說法圖的兩側或下方，內容之豐前所未見。這種結合《彌勒上生經》和《彌勒下生經》內容的彌勒經變，顯然是在蕭齊時期結合彌勒佛和彌勒菩薩造像傳統（圖 69A、B）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據李永寧和蔡偉堂的研究，敦煌地區的彌勒經變計 98 鋪，年代最早的為隋代的作品，不過皆為彌勒上生經變，構圖簡單。到了初唐（618-712）才出現結合《彌勒上生經》和《彌勒下生經》內容的彌勒經變。²⁵⁵ 其出現的時代較成都萬佛寺出土的這件彌勒經變晚了近一百年。更引人注意的是，蕭梁彌勒經變中所見龍王夜雨、羅剎掃城、老人入墓和大迦葉傳法衣等畫面，直到盛唐（712-781）才在敦煌的彌勒經變裡發現。²⁵⁶ 因此成都萬佛寺出土這件彌勒經變不但是現存中國最早的彌勒經變，也是八世紀以前內容最豐富的彌勒經變，其在中國彌勒圖像發展上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整理以上徵引的文獻資料與現存的南朝佛教造像，南朝出現的彌勒像以佛裝的造像為多，包括（一）倚坐佛，（二）禪定佛，（三）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結跏趺坐佛，以及（四）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立佛四類。另外，南朝也出現菩薩立像和交腳菩薩像兩種彌勒菩薩的類型，只不過這兩種菩薩像的數量較少。

雖然倚坐佛為辨識南朝彌勒像的重要元素，但筆者也必須強調，並非所有南朝的倚坐佛皆代表彌勒。四川汶川出土了一件蕭梁三佛造像（圖 72），這件造像的主尊為三尊大小相當的坐佛，結跏趺坐佛居中，兩側各有一尊倚坐佛。右側的倚坐佛右手持鉢，左手握袈裟衣角，放置於左大腿上；左側的倚坐佛雙手於胸前結印，這

254 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大成佛經》，收入《大正藏》，第 14 冊，頁 433 下。

255 李永寧、蔡偉堂，〈敦煌壁畫中的《彌勒經變》〉，收入段文傑主編，《1987 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頁 247-249、267-268。

256 參見李永寧、蔡偉堂，〈敦煌壁畫中的《彌勒經變》〉，頁 268。

種三尊佛的組合在南北朝的佛教造像中為一孤例。雖然雷玉華、李裕群等認為汶川的三佛造像可能代表釋迦牟尼佛和二彌勒佛。²⁵⁷不過，筆者認為此一解釋於教理不合，故筆者對這樣的定名仍有疑異，尚待日後進一步研究。

二、綜合分析與討論

上述的分析瑣碎繁雜，實有見樹不見林之弊，今整理〈北朝彌勒菩薩圖像流傳時間表〉與〈北朝彌勒佛流傳時間表〉二表附於文後，以期對北朝彌勒圖像發展的脈絡有較全面的認識。由於現存的南北朝佛教造像恐不及當時實際造像的萬分之一，甚至於百萬分之一，若依筆者目前所收集的南北朝彌勒像進行統計分析，根本無法反映當時彌勒圖像與信仰發展的實況，故仍循前例，在二表中以不同顏色的線條標註不同類型的彌勒像出現數量的多寡。以下將在二表的基礎上，結合南朝彌勒圖像的研究成果，討論南北朝的圖像發展、地域特色，以及圖像源流與傳播等問題，並進行南北朝的彌勒圖像和信仰發展脈絡的說明。

（一）圖像發展

根據附表一和附表二，筆者將北朝彌勒圖像的發展分為（一）420至460年、（二）460至500年、（三）500至535年和（四）535至589年四期。第一期討論的作品包括十六國與北魏早期的造像，第二期相當於北魏中期，第三期相當於北魏晚期，第四期則指北朝晚期，即東魏、北齊和西魏、北周時期。其中，北魏中、晚期的彌勒造像數量可觀，應是北朝彌勒崇拜的鼎盛期。²⁵⁸

第一期出現的彌勒像數量雖然不多，但已出現5種菩薩像和3種佛像類型。在菩薩像部分，有A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菩薩立像、B式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菩薩像（圖1、4~6、8、9、19、31、58）、C式右手作施畏印的交腳菩薩像（圖7）、D式的半跏思惟菩薩像（圖4、10）以及I式的冠有化佛的菩薩像（圖6A、7、31）；在佛像部分，則包括了A式的雙手結禪定印的結跏趺坐佛像（圖54、65）、B式的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自然下垂或握袈裟衣角的佛立像（圖55、56、66），C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佛坐像。此外，由於《比丘尼傳》載，元嘉十六年龍華寺的道矯造夾紵彌勒佛倚像一軀，顯示第一期時，南方還出現了倚坐佛形式的彌勒

257 雷玉華、李裕群、羅進勇，〈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7年6期，頁92。

258 參見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頁108。

像。

雖然中國早期的彌勒圖像與印度、中亞的彌勒造像頗有淵源，可是早在第一期，中國人或在西域圖像的基礎上，加以變化；或著手於新的彌勒圖像的開創。例如，附表一右手作施無畏印、交腳而坐的 C 式彌勒菩薩像，顯然是從犍陀羅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衍化而生。又如在貴霜王朝的造像中已有半跏思惟像的發現，但起初並未與任何特定的尊格有關，後來在犍陀羅反而與觀音菩薩系列緊密結合，²⁵⁹可是在甘肅卻確立了其與彌勒或悉達多太子的關係，賦予新的圖像意涵。此外，在貴霜王朝的造像或中亞佛教藝術裡，從未發現彌勒佛的形象，²⁶⁰然而在五世紀上半葉，北魏和劉宋都分別雕造了數種不同形式的彌勒佛像。足見，隨著中國佛教的發展日益成熟，五世紀初，南北兩地都紛紛建立自己的佛教圖像系統，樹立自我民族風貌。

在第二期，彌勒像的數量迅速增加。雖然第一期所出現的菩薩立像已消聲匿跡，但在第二期彌勒像的種類更加繁多，共計 10 種。除了第一期已出現的 B、C、D 和 I 式菩薩像，以及 A、B 和 C 式的佛像外，在菩薩像方面，又發現 E 式的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持淨瓶的交腳菩薩像（圖 33、35、38）；在佛像部分，又出現 D 式的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佛像（圖 21）和 E 式的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佛像（圖 36、37）兩種形式。根據現存的南朝彌勒像，蕭齊時期也出現了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圖 69B）和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結跏趺坐彌勒佛像的形式（圖 68A、69A）。蕭齊出現的這種結跏趺坐的彌勒佛像，在北方，則遲至第三期的後半才出現，說明中國佛教圖像的發展南北有別。

第三期的彌勒龕像數量眾多，圖像變化多端，計 15 種，種類之繁為四期之最。第三期如此豐富的彌勒圖像，反映了北魏晚期彌勒信仰的發展已臻巔峰。此期的彌勒圖像除了第二期的 10 種之外，在菩薩像部分，又增加了 F 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菩薩像（圖 15、24、40）、G 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半跏垂足坐菩薩像和 H 式的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半跏趺坐菩薩像（圖 48）三種。在佛像部分，又增加 F 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結跏趺坐佛像（圖 57）和 H 式兼具佛和菩薩特徵的彌勒像（圖

259 宮治昭，《涅槃と彌勒の圖像學》，頁 268-287。

260 宮治昭，《涅槃と彌勒の圖像學》，頁 254。筆者在博士論文中，曾指出在犍陀羅有一些倚坐佛與交腳佛可以比定為彌勒（Yu-Min Lee,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pp. 215-217）。不過重新檢視這些作品，筆者認為此說的證據不夠充分，故同意宮治昭之說，主張在犍陀羅並未發現佛陀形像的彌勒造型。

26、27），不過這兩種彌勒佛像的數量不但稀少，且僅出現於某些特定的地區（參見附表二）。

第四期長達 44 年，雖然是北朝彌勒圖像發展中時間最長的一期，不過此期的彌勒像不但數量銳減，圖像種類也大幅度地減少，顯示北朝晚期的彌勒信仰漸趨式微。第四期發現的彌勒圖像有 10 種，在菩薩像方面，僅見 C、D、F、G 和 H 式 5 種。在佛像部分，除了在第三期已出現的 A、B、E 和 F 式 4 種外，又出現 G 式手作歸命印的遊戲坐彌勒佛像（圖 63A）。歸命印是貴霜王朝犍陀羅彌勒造像的特色之一，²⁶¹ 可是這種手印不見於中亞，在甘肅、陝西、山西和河南的北魏佛教造像裡也從未發現，直到六世紀中葉才在華北東部的河北出現。因此此一圖像特徵的出現，究竟是受到印度的啟發，抑或是在施無畏印的基礎上變化而生？囿於資料限制，目前無法確定。在上述的 10 種北朝的彌勒圖像中，F 和 G 式的彌勒佛像僅出現在河北地區。迄今，筆者僅發現 1 尊 F 式的彌勒佛像，即天保八年（557）黃海伯夫妻造彌勒佛像（圖 61）；2 尊 G 式的彌勒佛像，為武定七年（549）智顏娉勝造彌勒佛坐像²⁶² 和建忠寺門徒造彌勒破坐像（圖 63A），數量極為稀少。更有趣的現象是，第四期出現的 5 種彌勒佛像類型，除了 E 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佛外，其餘 4 種僅出現在河北地區。這種現象似乎意味著北朝晚期彌勒信仰在河北仍保持相當的活動力。

根據史料文獻和造像遺存，蕭梁時期，上承蕭齊傳統，南方出現了手作禪定印的結跏趺坐彌勒佛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結跏趺坐彌勒佛像和交腳彌勒菩薩像。不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內容豐富、結合《彌勒上生經》和《彌勒下生經》的彌勒經變（圖 71），這種作品在北朝藝術中從未發現，當是蕭梁畫師們的創意傑作，對日後彌勒經變畫的發展影響深遠。

經過以上的梳理，可以釐清過去學界的一些看法。例如，侯旭東曾經指出，北朝彌勒的造像型制經歷了以交腳彌勒菩薩和以佛裝彌勒為主的兩個時期。太和（477-499）以前流行交腳彌勒菩薩像，太和以後彌勒漸著佛裝。²⁶³ 可是根據附表二，早在五世紀上半葉期，佛裝的彌勒像已經出現。又，水野清一認為，北魏流行交腳彌勒菩薩像，北齊則出現倚坐菩薩像，乃交腳菩薩像的變形，到了隋唐又產

261 宮治昭，《涅槃と彌勒の圖像學》，頁 242-243；Inchang Kim, *The Future Buddha Maitreya*, pp. 96, 104, 120.

262 王巧蓮、劉友恒，〈正定收藏的部分北朝佛教石造像〉，圖 7。

263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頁 111。

生了彌勒佛倚坐像，²⁶⁴ 宮治昭也持類似的觀點。²⁶⁵ 然而依據附表二，北魏中期就有彌勒佛倚坐像的雕造，北魏晚期才開始有彌勒菩薩倚坐像的製作。換言之，彌勒倚坐佛的出現較彌勒倚坐菩薩還早，所以水野清一和宮治昭之說與事實不符。此外，有關倚坐像，除了水野清一所提交腳變形說外，趙超則主張可能是從半跏坐像發展而來，²⁶⁶ 石松日奈子又認為，北朝彌勒像的倚坐姿勢可能是受到中亞王者像的影響。²⁶⁷ 如上所述，從甘肅南、北石窟寺內七立佛和彌勒菩薩像的配置關係來看，彌勒菩薩倚坐像可能是從彌勒菩薩交腳像變化而生。不過，正始元年陝西已出現彌勒菩薩倚坐像（圖 24），較北石窟寺的倚坐菩薩像的鑿刻年代略早，故這類的彌勒菩薩像的出現是否還有其他的因素？仍有待將來進一步地探討。

（二）區域特色

宿白先生很早就注意到，由於南、北文化殊途，故南北朝二地所流行的彌勒圖像也有所不同，他指出：

彌勒菩薩像與彌勒佛像取意不同，前者處兜率內院敷演釋問，後者已於龍華樹下成道作會，普度人天。南北對彌勒的要求有別，故北方所奉之形象和南方流行的與佛無異的坐像或立像有顯著差異。²⁶⁸

的確，交腳彌勒菩薩像是北朝最流行的彌勒圖像，在甘肅、陝西、山西和河南廣泛流傳。可是從文獻資料和現存有限的南朝佛教造像來看，南朝的彌勒像主要是以佛裝的形式出現，所以宿白先生所提，北朝的彌勒像以菩薩裝為主，南朝的彌勒像則以佛裝為主之說，已普遍為學界所接受。

實際上，南北朝時期，不但南、北流行的彌勒圖像有別，就是東、西兩地也大異其趣。例如在太行山以西地區所流行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在太行山以東的河北、山東地區，就極為稀少（參見附表一），尤其是在北朝領土最東側的山東地區，僅發現北齊河清三年孔昭佛造彌勒菩薩坐像（圖 67）一例而已。此外，北魏晚期至北齊、北周，在甘肅、陝西、山西和河南等地常見的彌勒倚坐菩薩像，在河北、山東的佛教造像中卻從未看到（參見附表一）。

264 水野清一，《中國の佛教美術》，頁 253-254。

265 宮治昭，《涅槃と彌勒の圖像學》，頁 306。

266 趙超，〈略談中國佛教造像中彌勒佛形象的演變〉，頁 9。

267 石松日奈子，〈彌勒像坐勢研究——施無畏印、倚坐の菩薩像を中心に〉，頁 5-7、17。

268 宿白，〈南朝龕像遺迹初探〉，頁 193。

根據附表一和附表二，佛裝彌勒像是河北和山東地區最流行的彌勒圖像。自五世紀二〇年代至隋代，彌勒佛像在河北就雕鑿不斷，可謂源遠而流長；同時，五世紀五〇年代至東魏時期，山東地區最常見的彌勒像也是佛裝的彌勒。上述種種在顯示，即使在北朝，東、西兩地的彌勒圖像也各具特點。河北和山東彌勒佛像流行，似乎反映這兩個地區與南朝的文化關係較為密切。皇興三年以前，山東曾先後屬東晉與劉宋的管轄，無論是從地理位置或歷史背景來說，山東的文化與南朝本來就有深厚的淵源。

又，太行山以東的河北、山東流傳的佛像種類眾多，其中以 B 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彌勒佛立像的數量最多（圖 55、56、66），同時這種彌勒像除了在山西發現 2 例和在河南發現 1 例外，其他皆出現在河北和山東兩地，顯然 B 式彌勒佛像是河北、山東彌勒像的主流，區域特色濃厚。

在南北朝彌勒圖像的發展上，有些彌勒圖像僅在某些地區始有發現，流傳不廣。例如，附表二 D 式雙手交疊於胸前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佛坐像（圖 21、22）和 H 式兼具佛與菩薩雙重特徵的彌勒像（圖 26、27），都只有在陝西以及受其影響的隴東地區始有發現。北魏末，在河南的洛陽龍門石窟和鞏縣石窟裡看到的 H 式右手作施無畏的半跏趺坐彌勒菩薩像（圖 48），在其他地方也不曾發現。這些區域特色明顯的圖像類型，頗值注意。

（三）圖像源流與傳播

歸納整理北朝的彌勒圖像特徵，約可分為 17 種。這些圖像的流傳狀況十分複雜，有些圖像流傳有緒，源遠而流長；有些則曇花一現；有些則在原來的圖像基礎上，重新詮釋，又產生了新的生命。同時，隨著各地文化的發展，圖像的流傳時而由西向東，又時而由東向西；時而由北而南，又時而由南而北，關係錯縱複雜。筆者僅將目前能掌握的部分，整理於下，來說明南北朝彌勒圖像傳播的一些狀況。

印度是中國佛教的祖源，佛教初傳之際，在雕造佛教尊像時，中國匠師多以印度佛像為楷模。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持淨瓶的彌勒菩薩立像（附表一 A 式）是印度貴霜王朝最流行的彌勒圖像，²⁶⁹ 也是中國最早的彌勒像類型，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時在陝西就已出現（圖 17）。五世紀二〇年代，在北涼石塔和炳靈寺 169 窟也發

269 有關貴霜王朝彌勒圖像的研究，參見宮治昭，《涅槃と彌勒の圖像學》，頁 281-320、356-364；Inchang Kim, *The Future Buddha Maitreya*, pp. 33-122.

現 2 尊這類的彌勒菩薩像，雖然牠們的左手不執持淨瓶，但顯然與貴霜王朝的佛教造像有關。另外，如上所述，南方的戴顓也曾雕造一尊彌勒菩薩立像，只可惜此像不存，無法確知牠是否也具有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持淨瓶的圖像特徵。隨著中國佛教的日益成熟，五世紀中葉以後這類彌勒像就在中國消失無蹤了。

除了菩薩立像外，貴霜王朝時，犍陀羅流行雙手作轉法輪印、交腳而坐的彌勒菩薩像（附表一 B 式），此式圖像在十六國的佛教藝術裡時有發現，如甘肅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壁面（圖 1）和北涼石塔（圖 6A）等都可以發現這類彌勒菩薩像的蹤影。北涼時期，尚出現彌勒菩薩像與七尊坐佛所組成的三世佛圖像（圖 4-6）、冠有化佛的彌勒菩薩像（附表一 I 式）以及彌勒菩薩像的身後出現椅背的設計（圖 6A、7-9）等。這些都是貴霜王朝彌勒菩薩像的重要圖像特徵，在在顯示貴霜王朝對中國早期佛教造像影響甚鉅。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僅在甘肅、長安附近，發現與印度關係密切的彌勒像。甘肅與新疆毗鄰，是中原與西域陸路交通的必經之地，而長安又是西晉、十六國時期北方佛教的重鎮。在這些地方往來、活動的天竺僧侶與商旅甚眾，因此甘陝地區早期佛教造像流露出較濃厚的印度色彩，實不足為怪。不過，也不是貴霜王朝流行的所有佛教圖像都在中國留下印記，例如，貴霜時期犍陀羅和秣菟羅造像裡常見的右手持淨瓶、結跏趺坐的彌勒菩薩坐像，在中國的佛教造像中便從未發現。

同時，早在北涼時期，甘肅的匠師們在西域佛教藝術的基礎上，也展開了自我的詮釋與創造，製作了 C 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和 D 式彌勒半跏思惟菩薩像，這些作品都使得南北朝的彌勒圖像更加多彩多姿。

北魏恢復代國以後，為了擴張領土，獲取戰俘和財物，不斷征戰。自建都平城時（398）起，從各地掠奪來的財物以及人口多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的地區，這些被北魏征服的地區對平城文化的形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平城文化的日益成熟，平城地區的佛教藝術也逐漸展現自己的特色，雲岡石窟就是平城佛教藝術的代表。

在雲岡石窟，發現 5 種類型的彌勒菩薩像，分別為 B、C、D、E 和 I 式的菩薩像。其中，E 式手持淨瓶的交腳菩薩像，是龜茲與平城文化交流的見證。B 式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在北涼和關中地區都有發現，C 式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在北涼石窟和石塔上也屢有所見；高善穆塔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圖 6A）和敦煌莫高

窟第 275 窟的主尊（圖 7），也都作 I 式冠有化佛的菩薩像形式。這些現象清楚表明，平城的佛教造像從北涼佛教藝術裡吸收了豐富的養分。《魏書》〈世祖紀上〉提及，太延五年（439）北魏攻伐北涼，是年九月，北魏鎮北將軍封陟討都樂，掠數千家而還。十月，又徙涼州民三萬餘家於京師。²⁷⁰《魏書》〈釋老志〉又言，「太延中（435-440），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俱東，象教彌增矣。」²⁷¹文成帝復佛後所任用的道人統師賢，他雖是罽賓國人，但「東游涼城，涼平赴京」；²⁷²主導雲岡石窟開窟事業的沙門統曇曜，又是涼州人。基於這些歷史因素，雲岡的彌勒像保存許多北涼的圖像元素，實其來有自。

此外，雲岡石窟還出現為數可觀的以交腳彌勒菩薩像為主尊，代表彌勒菩薩化現的半跏思惟像分居兩側的龕像（圖 31、33、37A、38）。這種龕像的鑿刻始於雲岡石窟的第一期，直至第三期仍持續不斷。北魏早期，這類彌勒龕像在關中地區即已出現（圖 19）。據《魏書》〈世祖紀〉太延元年（435）二月，詔長安及平涼民遷徙至京師平城。²⁷³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又徙長安城工巧二千家於京師。²⁷⁴雲岡石窟出現上述這種組合方式，便是平城受到長安佛教藝術影響的明證。

除了彌勒菩薩像外，雲岡石窟的第二、三期洞窟中還發現 C 式右手作無畏印的交腳彌勒佛以及 E 式的倚坐彌勒佛像。這兩種圖像在印度、中亞和甘陝地區早期的彌勒像中都不曾發現。前文已述，C 式的交腳彌勒佛可能是從陝西的 D 式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佛像變化而來，而 E 式的彌勒佛倚坐像則是平城匠師們的創舉。隨著平城文化的外傳，北魏中期以來，甘肅、陝西、河南等地也逐漸展開彌勒佛倚坐像的雕造工作。

北魏遷都洛陽，平城流行的彌勒圖像自然也被帶到洛陽。平城地區流行的彌勒圖像，如附表一 C、E、F 和 I 式的彌勒菩薩像，都在龍門石窟的古陽洞以及洛陽地區的北魏龕像裡可以發現。不過，在數量上，河南 E 式和 I 式的彌勒菩薩像已無法與雲岡石窟相提並論。此外，雲岡石窟常見的地神上擎交腳彌勒菩薩的雙足（圖 38）、交腳彌勒菩薩居中兩側配以半跏思惟像的彌勒龕像等，在龍門石窟的古陽洞中也偶有發現（圖 46），但其數量也遠遜於雲岡石窟。

270 魏收，《魏書》，卷四，〈世祖紀上〉，第 1 冊，頁 90。

271 魏收，《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 8 冊，頁 3032。

272 魏收，《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 8 冊，頁 3036。

273 魏收，《魏書》，卷四上，〈世祖紀上〉，第 1 冊，頁 84。

274 魏收，《魏書》，卷四下，〈世祖紀下〉，第 1 冊，頁 100。

除了由西而東外，有些圖像的傳播路線較為複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附表二 B 式的彌勒佛立像。這種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彌勒佛立像集中於太行山以東的河北和山東地區，區域特徵明顯。筆者發現最早之例為太平真君五年的耿崇等造彌勒佛立像（圖 55），自此迄隋，這類彌勒佛像在河北鑿造不斷，是該地最具代表性的北朝彌勒圖像。在山東，則遲至太和年間（477-499）始有這類彌勒佛像的鑄造，較河北晚了二十餘年。許多學者的研究指出，河北與山東接壤，歷史上也頗有淵源，河北的佛教與藝術對山東影響深遠，²⁷⁵ 故而推斷，自北魏中期至東魏，山東地區流行 B 式彌勒佛像的祖源很可能來自河北。除了河北、山東以外，這類的彌勒佛像尚在山西發現 2 例，在河南發現 1 例。山西的 2 例為太和十年的彌勒佛立像（圖 41）和永安二年韓德醜造彌勒佛立像。前者原在山西五臺山的碧山寺，後者的供養人又是石艾縣人，北魏時的石艾縣在今山西省平定縣東南，二地皆位於與河北毗鄰的山西東部。河南的 1 例為孝昌四年蔣伯仙造彌勒佛立像（圖 50），此像原在河南延津東北四十里蔣村區清寺，延津地近山東。因此在上述這些地區發現河北、山東常見的 B 式彌勒佛立像，實乃地緣關係所致。此外，蕭梁大同三年成僧造彌勒佛立像（圖 70）也與 B 式彌勒佛的圖像特徵相同，雖然該像的出土地不明，但此或可作為北方影響南朝佛教藝術的一個實例。

在彌勒圖像的發展與傳播上，最令人困惑的應屬 D 式的半跏思惟菩薩像。以上分析顯示，早在北涼時期，在甘肅已有彌勒半跏思惟菩薩像（圖 4、10）的出現，同時在敦煌莫高窟北涼和北魏的窟洞中，這種菩薩像還屢屢作為龕像的主尊。在陝西、山西和河南北魏的造像裡，雖然也有彌勒半跏思惟像的發現，但牠們皆以化現的身分出現在主尊彌勒菩薩或彌勒佛的兩側。河北則遲至北齊時期，才出現彌勒半跏思惟菩薩像（圖 62）。由此看來，從地域論，作為主尊的彌勒半跏思惟菩薩像只分別出現在西北的甘肅和華北東部的河北地區，二者相距有千里之遙；以時間來說，D 式的彌勒菩薩像在甘肅流傳的時間為北涼至北魏，在河北卻僅在北齊的造像中始有發現，二者在時間上也不銜接，所以筆者認為，河北的彌勒半跏思惟菩薩像似乎與太行山以西的彌勒半跏思惟菩薩像沒有直接的關係。

東魏、北齊以來，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河北地區流行的造像題材，依據題記，其或稱為思惟像、太子像、太子思惟像，以及彌勒像和龍樹思惟像，故要一窺河北彌勒半跏思惟菩薩像的起源，就必須將其放到河北半跏思惟菩薩像的發展脈絡中來探

275 相關的研究參見李玉珉，〈山東早期佛教造像考——劉宋至北魏時期〉，頁 37-39 與註釋。

討。目前筆者發現 3 例北魏河北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除了在太和八年（484）趙口造觀世音菩薩立像²⁷⁶與太和十三年（489）志歹真等造觀世音菩薩像²⁷⁷背光背面所見的樹下半跏思惟菩薩浮雕外，另一例見於正光四年午猷造彌勒佛龕像（圖 56）。此件龕像的圖像組合複雜，主尊彌勒佛立像的兩側各有一脇侍菩薩，前有二半跏思惟菩薩像，兩側尚有二天王，在台座的兩側還有兩力士。雖然李靜杰和田軍主張，北魏晚期至東魏前期，中原東部所流行的石佛和金銅佛中，作為脇侍或輔助題材出現的半跏菩薩像，應是白石半跏思惟菩薩像的直接來源，²⁷⁸不過從實物來看，二者之間的關係似乎不是那麼緊密。那麼這些作為主尊的河北白石半跏思惟像來源為何？耐人尋味。

唐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言：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彌為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嚙。」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舶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答有是事，便指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彼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模取千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辯新舊，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闡教還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²⁷⁹

姑且不論這段記載是否荒誕不稽，但根據這則資料，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乃一瑞像。東晉末，在京城建業已摹造千軀，顯然五世紀初太子半跏思惟像已在建業廣泛流傳。後來此像的本尊被孝文帝迎入北臺，北齊後主又命常彪之迎請至鄴都（今河北臨漳縣西南）。筆者推測，河北白石半跏思惟像的出現或許與吳寺太子思惟像由

276 大和文華館，《中国の金銅仏》，圖錄 23。

277 林樹中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 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版 93。

278 李靜杰、田軍，〈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頁 74。

279 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東晉徐州太子思惟像緣〉，收入《大正藏》，第 52 冊，頁 417 上 - 中。

徐州輾轉至鄴都有關。隨著彌勒信仰的廣泛流傳，在河北這種思惟像逐漸與彌勒信仰結合，而產生了彌勒半跏思惟菩薩像與龍樹思惟像。

四川位居中國的西南，北接甘肅、陝西，蜀地的民族和文化與甘陝地區本來就有著密切的關係。四川的歷史複雜，西晉末年，五胡亂華，該地歷經成漢（306-347）、東晉（347-373）、前秦（373-383）、東晉（383-405）、譙蜀（405-413）等政權的管轄。義熙九年（413）四川三度進入東晉版圖，以後歷經劉宋、蕭齊與蕭梁的統治，承聖二年（553）又被西魏佔領。自晉以來，涼州與江南的往來，往往路經四川，而金牛道、米倉道和褒斜道，又是連接川陝兩地的交通要道，所以四川與甘陝的關係十分密切。四、五世紀，許多北方的僧人，如法和、智猛、慧覽、法成、道法、玄暢等都曾到益州（今四川盆地）弘法。蕭齊時期，益州出身的僧尼，如寶淵、寶海、智方等，又紛紛前往建康修習，返回蜀地後，他們在建康所接觸的佛教文化自然對四川產生了影響。同時，蕭齊積極經營益州，曾命宗室子弟始興王蕭鑑為益州刺史，加強對蜀地的管理。蕭梁時期，更先後派遣六位宗室子弟出任益州刺史，建康持續地為四川的佛教注入新的養分。²⁸⁰ 在四川的南朝造像中，發現西北地區流行的C式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圖69B、71），此乃四川與西北文化密不可分的具體見證。同時，在四川又可以看到江南常見的彌勒佛像（圖68A、69A）以及結構複雜的彌勒經變浮雕（圖71），則是建康文化在四川留下的印記。凡此種種，在在顯示四川的南朝造像充分反映了該地多元的文化特色。

三、南北朝的彌勒信仰

彌勒系的經典大抵可分為《彌勒上生經》和《彌勒下生經》兩個體系，因此學者們指出，彌勒信仰有上生和下生兩派。崇奉彌勒上生信仰者，希冀往生兜率天，聆聽彌勒菩薩說法；篤信彌勒下生信仰者，則祈願參與龍華三會，聽聞彌勒佛說法，證得阿羅漢果。南北朝的佛教造像也紛紛以菩薩裝和佛裝的彌勒圖像，和彌勒經典中的「上生菩薩，下生佛」的觀念相呼應。²⁸¹

280 參見陳哲萱，《南朝益州地區佛教造像研究》，頁15-37。

281 張總，〈山東歷城黃石崖摩崖龕窟調查〉，頁46；Dorothy C. Wong, "Maitreya Buddha Statu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p. 24-25；裴建平，〈西安碑林藏北魏朱輔伯造像碑考〉，頁232；王忠林，〈可能與必然——論彌勒圖像的轉型與定型〉，《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6期，頁26、30。

不過有趣的是，在敦煌出土的口吉德塔塔腹的八龕中，與七佛並列的菩薩立像，左側則刻「彌勒佛」三字。²⁸² 河北曲陽出土的正光二年張開造彌勒佛坐像（圖 57），其題記卻稱「造彌勒上生像一軀」。²⁸³ 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北魏太和廿二年（498）高楚造交腳彌勒菩薩龕像、²⁸⁴ 東魏天平二年（535）僧清長造交腳彌勒菩薩龕像，²⁸⁵ 題記都稱「造彌勒佛一區」。曲陽出土的北齊天保二年（551）張雙臥造交腳彌勒菩薩坐像（圖 59）和乾明元年（560）莊嚴寺邑義造交腳彌勒菩薩坐像，題記又言「造彌勒下生像一區」。²⁸⁶ 另外，原在河南登封少林寺北齊武平元年至二年（570-571）馮暉賓等邑義造佛碑像中的倚坐菩薩龕側，又題刻著「彌勒下生主石方懌」、「彌勒下生主董通達」等文字，²⁸⁷ 諸如此類的例子不甚枚舉。侯旭東認為，此乃北朝的彌勒信徒「對於彌勒的實際身分並不明瞭，或是未嘗注意其身分」²⁸⁸ 所致。

雖然筆者不能完全否定侯旭東說法的可能性，可是令人納悶的是，若以造像論，交腳彌勒菩薩像是北朝西北與太行山以西的華北地區彌勒圖像的主流，似乎代表這些地方的彌勒上生信仰較下生信仰流行；可是這些彌勒像的造像記中，祈願參與「龍華三會」、「龍華初會」者的數量卻是希冀往生兜率天，面奉彌勒者的數倍之多。同時，參與龍華會的願目還經常出現在北朝非彌勒像的造像題記中。²⁸⁹ 因此，若依據造像記的資料，北朝的彌勒下生信仰似乎又較上生信仰普遍。可是檢視佛教傳記，又發現兩晉、南北朝時期，大部分弘宣彌勒信仰的導師，如道安及其弟子僧輔、曇戒、法遇，以及佛馱跋陀羅、²⁹⁰ 智嚴、²⁹¹ 玄藻、²⁹² 靈幹²⁹³ 等都立誓往生兜率天，面謁彌勒，甚至蕭齊高帝蕭道成也不例外。如此看來，無論是南朝或北朝，篤信彌勒的僧尼所弘宣的彌勒信仰又好像以上生派為主。這些看似衝突的結論，究竟應該如何解釋？令人費解。南北朝造像和石窟的圖像布局，或許可以為我

282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頁 41。

283 楊伯達著，松原三郎譯，《埋もれた中國石仏の研究》，拓片 2-(1)、2-(2)。

284 劉景龍、趙會軍編著，《古陽洞——龍門石窟第 1443 窟》，〈附冊〉，頁 55，圖 218。

285 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頁 246，圖 488。

286 胡國強主編，《你應該知道的 200 件曲陽造像》，頁 103。

287 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頁 343-344。

288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頁 111。

289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頁 196-204。

290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二，〈晉道場寺佛馱跋陀羅傳〉，頁 70。

291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三，〈宋京師祇園寺釋智嚴傳〉，頁 100。

292 釋寶唱著，于儒童校註，《比丘尼傳校註》，卷二，〈吳太玄臺寺釋玄藻尼傳〉，頁 63。

293 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二，〈釋靈幹傳〉，收入《大正藏》，第 50 冊，頁 518 上。

們解惑。

前文已述，雲岡石窟第7和第8窟為一對窟，第7窟北壁主龕（圖37A）的上層龕為一個彌勒龕，以交腳彌勒菩薩為主尊，兩側分別安排祂的分身倚坐彌勒佛和半跏思惟彌勒菩薩各一身。第8窟北壁主龕的上層龕也是一個彌勒龕（圖36），則以倚坐彌勒佛為主尊，兩側分別安排祂的分身交腳彌勒菩薩和半跏思惟彌勒菩薩各一身。類似的設計在雲岡第9、10、12窟（圖38、39）前室東西兩壁的上層龕也有發現。毫無疑問地，這些彌勒菩薩和彌勒佛並出，且位置互相呼應的造像形式，表明了在人們的觀念中，彌勒上生和下生信仰實息息相關。在陝西北魏晚期的造像中，還出現佛和菩薩特徵兼備的彌勒像（圖26、27）。其實兼具彌勒上生和下生信仰特質的表現方式，並非北方的專例。蕭齊永明八年釋法海造彌勒像的正面（圖69A）主尊為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彌勒佛結跏趺坐像，可是背面（圖69B）的屋形龕中，卻以交腳彌勒菩薩為主尊。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的彌勒經變浮雕（圖71）更同時描繪了《彌勒上生經》和《彌勒下生經》的內容。這些作品都將彌勒上生和下生信仰密不可分的觀念一表無遺。

《彌勒上生經》言：「如是等眾生，若淨諸業，行六事法，必定無疑當得生於兜率天上，值遇彌勒。亦隨彌勒下閻浮提，第一聞法於未來世。」²⁹⁴ 據此，上生兜率天的最終目的，是在追隨彌勒下生人世，見佛聞法，得證佛果。無怪乎沈約〈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提到，篤信彌勒的淨秀身體違和時，時而言「須臾見彌勒下生翅頭末城」，時而又說「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²⁹⁵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也記載著，鼓吹彌勒信仰不遺餘力的玄奘，他求生兜率天的目的有二，一是為了向在兜率內院說法的彌勒菩薩請益決疑，另一則是「願隨下廣作佛事，乃至無上菩提。」²⁹⁶ 《大智度論》更清楚地說明信眾應祈求上生兜率天的原因如下：

「菩薩何以生兜率天上？而不在上生，不在下生？」答曰：「……兜率天上結使不厚不利，智慧安隱故。復次不欲過佛出世時故，若於下地生命短，壽終時，佛未出世；若於上地生命長，壽未盡，復過佛出時。兜率天壽與佛出時會故。」²⁹⁷

可見，往生兜率天是為了不會錯過彌勒佛出世的時間，因為唯有遇到彌勒佛，才有

294 沮渠京聲譯，《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收入《大正藏》，第14冊，頁420上。

295 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三，收入《大正藏》，第52冊，頁271中-272上。

296 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收入《大正藏》，第50冊，頁277上。

297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四，收入《大正藏》，第25冊，頁89中-下。

機會聽聞正法，蒙佛救度。換言之，往生兜率天是得證佛果的一大保證，所以即使對希冀往生兜率天的彌勒信徒來說，兜率天並不是他們所求的最終目的，而是為了獲取跟隨彌勒下生閻浮提，參加龍華三會，得證無生法忍的保單。這也就是說，彌勒上生與下生信仰的目標實無軒輊，二者殊途而同歸，實一體的兩面。南北朝時，人們已明瞭彌勒信仰的這個特質，他們或以雕刻、或用繪畫具體地表現這種彌勒信仰的精髓。這或許就是為何大部分南北朝的彌勒像，無論其著佛裝或菩薩裝，造像題記都僅稱之為「彌勒」的原因之一。

結 論

造像記內容豐富，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寶貴資料。一九四〇年代中國佛教史學家塚本善隆根據龍門造像記的研究成果，發表了〈龍門石窟に現れたる北魏佛教〉²⁹⁸一文。一九七〇年代佐藤智水繼踵，在佛教造像記整理和分析的基礎上，又發表了數篇北朝佛教史的重要論文。一九九〇年代中國歷史學者侯旭東收集一千六百餘種的北朝造像記，進行造像記的結構、題材、供養人身分、發願內容等探討，1998年出版《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為中心的考察》一書，此書已成為近年學界研究北朝佛教信仰的重要參考。侯旭東在此書中指出，彌勒造像在五世紀四〇年代就零星存在，六〇年代以後至北朝末的120年間，社會上崇拜者不斷。而460至529年間，應為彌勒造像與彌勒崇拜的鼎盛時期，隨後漸衰，²⁹⁹ 本研究的結論基本上與侯旭東的看法相近。可是侯旭東又提到，六世紀初至三〇年代末的四十年間，龍門石窟出現的彌勒像占同期北方彌勒像的五分之二，而北朝時期至少有22尊彌勒像雕鑿於地屬山東東北部的齊州和青州，故彌勒造像及崇拜的分布，以龍門及今山東北部地區較為集中。³⁰⁰ 然而現存的佛教造像中，大多數是沒有題記的作品，以雲岡石窟為例，該石窟群鑿造龕像的數量逾萬，可是刻具造像題記的龕像卻不到一百，提到彌勒者當然更加稀少。可是從圖像特徵和窟龕的配置關係來看，雲岡石窟至少有180個彌勒龕像，若不將這些沒有造像題記的作品納入討論，僅依造像記的內容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的成果與實際狀況可能大異其趣。因此，在佛教信仰史的研究上，圖像的分析實不容忽視。

298 塚本善隆，〈龍門石窟に現れたる北魏佛教〉，收入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頁141-242。

299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頁108。

300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頁110。

本研究運用藝術史圖像學與圖像結構學的方法，並結合造像題記和歷史文獻，進行南北朝的彌勒圖像和信仰的探討。分析過程中，筆者特別以區域脈絡為考察的主軸，希冀通過了不同區域彌勒圖像的特徵、流行的類型等的比較，能對南北朝各種彌勒圖像的出現、流傳、演變有更全面且完整的認識。

在整理北朝彌勒圖像區域研究的資料時，筆者注意到，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關中地區即有彌勒菩薩像的存在，四世紀中葉江南已開始製作彌勒像，五世紀二〇年代甘肅和河北也有彌勒像的出現，五世紀中葉彌勒龕像在雲岡石窟中也時有發現。雖然這段時期現存彌勒造像的數量有限，但考量到現存西元 450 年前後及其以前的中國佛教造像本來就不多，所以我們仍可推斷，五世紀上半葉，無論南北或東西，彌勒已成為佛教鑿龕造像的重要題材之一。換言之，當時彌勒信仰已在中國各地流傳。北魏中、晚期，在帝王皇室的支持、僧尼的弘傳下，彌勒信仰在北方的發展更加蓬勃，鼎盛一時，不但造像數量激增，圖像的類型也明顯增加。根據此時彌勒龕像的題記，供養人的身分上至皇室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無一不有。顯然，此時北方信仰彌勒者已遍布各個階層。

一般來說，學者都視經典為製作圖像的重要依據，不過在附表一和附表二所列的 17 種南北朝彌勒圖像類型中，可以找到經典依據的卻寥寥無幾。除了《彌勒上生經》所提彌勒乃兜率內院的說法菩薩、《彌勒下生經》所說彌勒將在龍華樹下成佛外，筆者只在《彌勒上生經》發現一些具體描述彌勒圖像特徵的文字。該經載：

佛告優波離：「彌勒先於波羅捺國劫波利村波婆利大婆羅門家生，却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還本生處，結跏趺坐，如入滅定，身紫金色，光明豔赫，如百千日。上至兜率陀天，……時兜率陀天七寶臺內，摩尼殿上師子床座忽然化生，於蓮華上結跏趺坐，身如閻浮檀金色長十六由旬，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悉具足。頂上肉髻，髮紺瑠璃色，釋迦毘楞伽摩尼、百千萬億甄叔迦寶以嚴天冠，其天寶冠有百萬億色，一一色中有無量百千化佛，諸化菩薩以為侍者。」³⁰¹

根據此經，結跏趺坐和冠有化佛當是彌勒菩薩最重要的兩個圖像特徵。可是在五、六世紀的中國造像裡，筆者僅在敦煌市博物館所藏的北涼沙山塔上，發現了一尊這種形象的彌勒菩薩像。此外，尚值一提的是，縱使在北涼的佛教造像裡，已發現數尊冠有化佛的彌勒菩薩像，符合經典的描述，不過《彌勒上生經》是在北涼滅亡、

301 沮渠京聲譯，《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收入《大正藏》，第 14 冊，頁 419 下。

沮渠京聲南奔建康後所翻譯出來的經典，經典譯出的年代較北涼石塔的造像晚。由此看來，南北朝圖像的製作，粉本與稿樣的流傳應較經典更為重要。

佛教源於印度，故十六國至南北朝早期，彌勒圖像大多上承印度和中亞的傳統。其中，以貴霜王朝犍陀羅和秣菟羅最流行的彌勒菩薩立像出現的時間最早，其次則是犍陀羅和中亞常見的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檢視這兩種圖像的發展狀況，發現五世紀的二、三〇年代以後彌勒菩薩立像（附表一 A 式）就鮮少出現，但是一直至北魏末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附表一 B 式）仍時有製作。以地區來說，附表一 A 式的彌勒菩薩像僅見於關中和河西這些與西域往來頻繁的地區，而附表一 B 式的彌勒菩薩像除了上述地區外，在山西和河北都還可以發現祂的蹤跡。此外，五世紀初，在西域流傳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的圖像基礎上，又演變出附表一 C 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這種彌勒圖像類型後來成為北朝太行山以西地區彌勒造像的主流，一直到北朝末都續有雕鑄。顯然上述兩種外來圖像中，手作轉法輪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對南北朝彌勒圖像的影響較彌勒菩薩立像更為深遠。

北魏早期，北魏不斷地擴張領地，被征服的涼州和關中地區流行的彌勒圖像，自然成為滋潤平城佛教藝術的養分。可是北魏中期，隨著平城佛教及藝術的日漸成熟，河西地區則反過來受到平城的影響，金塔寺石窟出現的交腳彌勒佛坐像（附表二 C 式）和彌勒佛倚坐像（附表二 E 式）即為例證。不過本研究也發現，即使平城和洛陽分別是北魏中期和晚期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可是，這二地文化上的影響力未必能與它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相提並論。例如，平城是北魏中期的都城，在雲岡第二期洞窟所見、受到龜茲佛教美術影響的交腳彌勒菩薩像（附表二 E 式），在其他地區北魏中期的佛教龕像裡均未發現。又如，洛陽是北魏晚期的都城，該地新創的半跏趺坐彌勒菩薩坐像（附表一 H 式），也僅出現在河洛地區的佛教窟龕中。此外，北魏中期平城地區出現了附表一 B、C、D、E、I 式以及附表二 C 和 E 式七種彌勒圖像類型，可是在北魏中、晚期山東的彌勒造像裡，這些類型則全未發現；在河北的造像裡，也僅發現附表一 B、C 式和附表二 E 式三種彌勒圖像類型，而且附表一 B 和 C 式的彌勒菩薩像在河北的造像中數量又十分稀少。北魏晚期都城洛陽地區所見的附表一 C、D、E、I 式以及附表二 E 式五種彌勒圖像類型，在山東北魏晚期和東魏、北齊的造像裡，除了發現 1 尊附表一 C 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外，其他各種類型完全無跡可尋。另外，自五世紀以迄北朝末，在河北、

山東兩地彌勒佛立像的數量一直居北朝各類彌勒圖像之冠，而在山西、河南地區，僅在與河北和山東緊臨的地方，才偶爾發現一、兩尊這類的彌勒佛像。這些現象在顯示，南北朝佛教圖像的發展似乎無中心可言，而造成各個地區圖像變化的因素裡，地緣關係可能比都城影響更為重要。

此外，造像數量的多寡固然是判斷信仰流行與否的一個因素，可是自創圖像的產生亦是衡量此信仰是否成熟的一個條件。早在五世紀的上半葉，在河北就發現附表二 A 式手作禪定印的彌勒佛坐像和附表二 B 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彌勒佛立像，這兩種圖像在印度和中亞的佛教藝術中都不曾發現。這種新穎圖像的出現當可視為河北地區彌勒信仰成熟的證據。北魏中、晚期，自創彌勒圖像的種類明顯增加，更具體地說明當時彌勒信仰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上已生根、茁壯。

雖然在北朝的龕像中，已發現彌勒菩薩和彌勒佛像一同出現的龕像或造像碑，以及兼具佛和菩薩特徵的彌勒像，不過蕭梁的彌勒變相浮雕（圖 71）在一個畫面上具體描繪《彌勒上生經》和《彌勒下生經》的重要內容，將彌勒上生和下生信仰的精髓一表無遺。從此經變的內容、配置和布局來看，此作誠可謂唐代彌勒經變的先驅，對唐代彌勒經變的構圖和表現影響深遠。相對於此，在唐代，除了彌勒佛倚坐像（附表二 E 式）外，大部分北朝所流行彌勒圖像不是數量銳減，如手作轉法輪印或作施無畏印的交腳彌勒菩薩像（附表一 B 式、C 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倚坐彌勒菩薩像（附表一 F 式）等，就是消聲匿跡，如半跏思惟彌勒菩薩像（附表一 D 式）、右手作施無畏印的彌勒佛立像（附表二 B 式）等。因此縱使南朝存留與彌勒信仰相關的作品不多，但南朝對唐代彌勒圖像的影響卻不容小覷。

本研究亦注意到，南北朝的彌勒經典雖分為《彌勒上生經》和《彌勒下生經》兩個系統，可是早在北涼石塔中，即發現題名稱之為「彌勒佛」的彌勒菩薩像；五世紀下半葉，雲岡石窟裡也發現彌勒菩薩和彌勒佛同列一龕（圖 36、37），或作互相呼應的配置（圖 36、37、38、39），四川成都出土的永明八年釋法海造彌勒佛坐像（圖 69）的正面雕彌勒佛坐像，背面則刻彌勒菩薩坐像，這些作品清楚說明，早在五世紀，無論南北，在彌勒信徒們的心中，就無上生派和下生派的分野，他們已體悟到這兩個經系所要闡明的精義都是蒙佛救度，證得佛果。

一般來說，佛教圖像的發展歷經草創、成熟、衰敗等過程。本文以彌勒圖像為例，從區域研究的角度出發，試圖呈現各種圖像類型的消長和不同區域間彼此影響的動態變化，並探討造成這些變化的原因。此外，又結合窟龕造像的配置關係和造

像題記的內容，嘗試從更多元的角度，去說明南北朝彌勒信仰的發展和特色。由於本文內容龐雜，難免掛一漏萬，不周之處尚請方家指正。

類型	圖像特徵		地區	年代						
	姿勢	手印或持物		420	440	460	500	535	550	581
A式	立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甘肅							
B式	交腳坐姿	轉法輪印	甘肅							
			陝西							
			山西							
			河北							
C式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甘肅							
			山西							
			陝西							
			河南							
			河北							
D式	半跏垂足	思惟相	甘肅							
			山西							
			河南							
			河北							
E式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持淨瓶	山西							
			河南							
F式	倚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甘肅							
			陝西							
			山西							
			河南							
G式	半跏垂足	右手作施無畏印	山西							
			河南							
H式	半跏趺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河南							
I式	冠有化佛		甘肅							
			山西							
			河南							

附表二 北朝彌勒佛圖像流傳時間表

類型	圖像特徵		地區	420 440 460 500 535 550 581
	姿勢	手印或持物		
A式	結跏趺坐	禪定印	河北	
			山東	
B式	立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河北	
			山東	
			山西	
C式	交腳坐姿	右手作施無畏印	甘肅	
			陝西	
			山西	
D式	交腳坐姿	轉法輪印	陝西	
E式	倚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山西	
			甘肅	
			陝西	
			河南	
			河北	
F式	結跏趺坐	右手作施無畏印	河北	
G式	遊戲坐	一手作歸命印	河北	
H式	兼具佛與菩薩雙重特徵		陝西	

引用書目

一、古籍文獻

-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第15冊，頁645下-697上。
-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收入《大正藏》，第25冊，頁57上-756下。
- （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收入《大正藏》，第14冊，頁423下-425下。
- （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大成佛經》，收入《大正藏》，第14冊，頁428中-434中。
- （後秦）鳩摩羅什譯，《妙華蓮華經》，收入《大正藏》，第9冊，頁1上-62下。
- （北魏）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北魏）酈道元著，（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南朝宋）沮渠京聲譯，《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收入《大正藏》，第14冊，頁418中-420下。
-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梁）釋寶唱著，于儒童校註，《比丘尼傳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梁）寶亮，《名僧傳抄》，收入藏經書院編輯，《卍續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第134冊，頁1-34。
- （隋）法經，《眾經目錄》，收入《大正藏》，第55冊，頁115上-180中。
-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收入《大正藏》，第49冊，頁22下-127下。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法琳，《破邪論》，收入《大正藏》，第52冊，頁474下-489下。
- （唐）房玄齡，《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唐）道宣，《續高僧傳》，收入《大正藏》，第50冊，頁425上-707上。
- （唐）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收入《大正藏》，第52冊，頁423下-425下。
- （唐）道宣，《廣弘明集》，收入《大正藏》，第52冊，頁97上-361上。
- （唐）道宣，《釋迦方志》，收入《大正藏》，第51冊，頁948中-975上。
- （唐）僧詳，《法華經傳記》，收入《大正藏》，第51冊，頁48中-97上。
- （唐）慧立本、彥悁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收入《大正藏》，第50冊，頁220

下-280上。

- (唐)韓鄂撰,(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歲華紀麗》,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1-36。
- (唐)魏徵等,《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 (清)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收入嚴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乙編之二十六》,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第98冊。
- (清)端方,《陶齋吉金錄》,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9,第7冊,頁5511-5740。
- (清)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收入嚴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乙編之十七》,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第89-90冊。

二、近代論著

-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會、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雲岡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鄴城考古隊,〈河北臨漳鄴城遺址出土的北朝銅造像〉,《考古》,1992年8期,頁741-744。
- 中國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連雲港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連雲港市博物館編著,《連雲港孔望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天水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王巧蓮、劉友恒,〈正定收藏的部分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1998年5期,頁70-74。
- 王忠林,〈可能與必然——論彌勒圖像的轉型與定型〉,《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6期,頁26-33。
- 王惠民,〈彌勒信仰與彌勒圖像研究論著目錄〉,《敦煌學輯刊》,2006年4期,頁173-184。
- 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 王裕昌、魏文斌,〈麥積山早期洞窟的彌勒造像與信仰〉,《敦煌研究》,2010年3期,頁34-41。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慶陽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編,《隴東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簡報〉,《文物》,1998年11期,頁4-20。
- 西安碑林博物館編,《長安佛韻——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 朱捷元,〈“神平三年”楊伏生造鑲金彌勒銅像〉,《文物》,1979年7期,頁80-81。

- 李少南，〈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銅造像〉，《文物》，1984 年 5 期，頁 21-31。
- 李永寧、蔡偉堂，〈敦煌壁畫中的《彌勒經變》〉，收入段文傑主編，《1987 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頁 247-272。
- 李玉珉，〈「半跏思惟像」再探〉，《故宮學術季刊》，3 卷 3 期（1986 春季），頁 41-57。
-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和北魏時期〉，《故宮學術季刊》，11 卷 4 期（1994 夏季），頁 1-80。
- 李玉珉，〈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收入邢義田主編，《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2002，頁 235-331。
- 李玉珉，〈山東早期佛教造像考——劉宋至北魏時期〉，《故宮學術季刊》，21 卷 3 期（2004 春季），頁 1-79。
- 李玉珉，〈金塔寺石窟〉，《故宮學術季刊》，22 卷 2 期（2004 冬季），頁 33-66。
- 李裕群，〈試論成都地區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0 年 2 期，頁 64-76。
- 李靜杰、田軍，〈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 年 3 期，頁 66-84。
- 季羨林，《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臺北：東初出版社，1995。
- 林樹中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 3·魏晉南北朝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肥塚隆，〈莫高窟第 275 窟交腳菩薩像與犍陀羅的先例〉，《敦煌研究》，1990 年 1 期，頁 16-24。
- 金申，〈榆林發現的劉宋金銅佛像質疑〉，《文物》，1995 年 12 期，頁 61-64。
- 金申，〈易縣北魏交腳菩薩像造型上的幾個問題〉，《文物》，1997 年 7 期，頁 61-63。
- 金申，〈關於北魏和平六年交腳菩薩像的補正〉，《文物》，1998 年 10 期，頁 41。
- 金申，〈談半跏思惟菩薩像〉，《中國歷史文物》，2002 年 2 期，頁 78-81。
- 青州市博物館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9。
-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胡國強主編，《你應該知道的 200 件曲陽造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臺北：無出版資料。
- 孫迪，〈日本藏傳陝西三原出土西晉十六國金銅彌勒菩薩立像〉，《文物》，2006 年 5 期，頁 14-16。
-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新竹：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00。
- 袁曙光，〈四川茂縣南齊永明造像及其有關問題〉，《文物》，1992 年 2 期，頁 67-71。
- 宿白，〈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收入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176-197。

- 宿白，〈南朝龕像遺迹初探〉，收入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176-199。
- 張肖馬、雷玉華，〈成都市商業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 年 10 期，頁 4-18。
- 張秩璋，《北魏小金銅佛風格與圖像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碩士論文，2011。
- 張淑敏等，《山東博興銅佛像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5。
- 張森，〈佛教“疑偽經”與彌勒信仰——以佛教經錄為中心的考察〉，《宗教研究》，2006 年 1 期，頁 171-174。
- 張焯，《雲岡石窟編年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張燕、趙景普，〈陝西省長武縣出土一批佛教石造像碑〉，《文物》，1987 年 3 期，頁 65-81。
- 張總，〈山東歷城黃石崖摩崖龕窟調查〉，《文物》，1996 年 4 期，頁 37-46。
- 張寶璽，《甘肅佛教石刻造像》，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 張寶璽主編，《甘肅石窟藝術——壁畫編》，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
- 陳明達，〈鞏縣石窟寺的雕鑿年代及特點〉，收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191-199。
- 陳明達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 13·鞏縣天龍山響堂山安陽石窟雕刻》，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 陳哲萱，《南朝益州地區佛教造像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臺北：彌勒出版社，1982。
- 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 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 黃志成，《四至六世紀山東地區佛教之研究——以寺院、僧侶與義邑為中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遼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臺北：東大出版社，2001。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楊秋莎，〈漢魏時期蜀漢、孫吳墓葬中的佛教遺物〉，《四川文物》，2003 年 5 期，頁 44-49。
- 溫玉成，〈龍門北朝小龕的類型、分期與洞窟排年〉，收入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171-224。
- 雷玉華、李裕群、羅進勇，〈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7 年 6 期，頁 84-93、96。
- 裴建平，〈西安碑林藏北魏佛龕像考釋〉，《碑林集刊》，第 7 期（2001 年 6 月），頁 114-119。

- 裴建平，〈西安碑林藏北魏朱輔伯造像碑考〉，收入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229-237。
- 趙力光，〈西安碑林藏佛教造像藝術略論〉，《碑林集刊》，第16期（2011年2月），頁1-11。
- 趙超，〈略談中國佛教造像中彌勒佛形象的演變〉，《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2期，頁4-10。
- 趙聲良，〈成都南朝浮雕彌勒經變與法華經變考論〉，《敦煌研究》，2001年1期，頁34-42。
- 劉建華，《義縣萬佛堂石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 劉景龍、趙會軍編著，《古陽洞——龍門石窟第1443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 劉鳳君，〈山東省北朝觀世音和彌勒造像考〉，《文史哲》，1994年2期，頁48-53。
- 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顏尚文，《中國中古佛教史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 顏娟英主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
- 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
- 魏文斌，〈麥積山石窟交腳與半跏思惟菩薩對稱構圖的研究〉，收入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麥積山石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68-85。
- 嚴耕望遺著，李啟文整理，《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
- 蘇玲怡，《龍門古陽洞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八木春生，《雲岡石窟文樣論》，京都：法藏館，2000。
- 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東京：國書刊行會，1980（復刻本）。
- 大和文華館，《中国の金銅仏》，奈良：大和文華館，1992。
- 小野勝年，〈新昌・石城寺とその弥勒像——江南巨大石仏の史的遍歴——〉，《佛教藝術》，第162號（1985年11月），頁11-27。
- 水野清一，《中國の佛教美術》，東京：平凡社，1990再版。
-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1-1954。
-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響堂山石窟》，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7。
- 石松日奈子，〈弥勒像坐勢研究——施無畏印・倚坐の菩薩像を中心に〉，《Museum》，第502號（1993年1月），頁4-26。
- 石松日奈子，〈中國交腳菩薩像考〉，《佛教藝術》，第178號（1988年5月），頁55-83。
- 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 佐藤智水，〈雲岡佛教の性格——北魏國家佛教成立の一考察〉，《東洋學報》，59卷1、2期（1977），頁27-66。

- 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銘考〉，《史學雜誌》，第 86 編第 10 號（1977），頁 1421-1467。
-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中国古式金銅仏と中央・東南アジアの金銅仏》，和泉市：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1988。
-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六朝時代の金銅仏》，和泉市：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1991。
- 東山健吾，〈敦煌莫高窟北朝期尊像の圖像的考察〉，《東洋學術研究》，24 卷 1 期（1985 年 5 月），頁 76-100。
- 東京国立博物館編，《シルクロード大美術展：Grand Exhibition of Silkroad Buddhist Art》，東京国立博物館，1996。
- 東京国立博物館編集，《中国国宝展》，東京：朝日新聞社，2000。
- 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 肥塚隆、宮治昭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十三卷・インド》，東京：小學館，1999-2000。
- 宮治昭，《涅槃と彌勒の圖像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
- 徐男英，〈河北藁城出土の北齊河元年銘白玉二仏坐像について——「弥勒破坐」銘の解釈を中心に〉，《美術史》，第 170 號（2011 年 3 月），頁 313-330。
- 曾布川寛、岡田健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學館，2000。
- 塚本善隆，《支那仏教史研究・北魏篇》，東京：弘文堂書房，1942。
- 塚本善隆，〈龍門石窟に現れたる北魏佛教〉，收入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41，頁 141-242。
- 楊伯達著，松原三郎譯，《埋もれた中國石仏の研究》，東京：東京美術，1985。
- 謝振發，〈成都市万仏寺址出土の南朝造像碑とその経変図〉，《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vol. 24（2005），頁 165-173。
- 譚樹桐、安陽春編輯，《新疆の壁畫：キジル千佛洞》，京都：株式会社美乃美，1981。
- 釋清潭，〈彌勒菩薩形象考〉，《國華》，第 175 號（1904 年 12 月），頁 139-144；第 176 號（1905 年 1 月），頁 153-158；第 178 號（1905 年 3 月），頁 191-200。
- Abe, Stanley K. *Ordinary Image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 Härtel, Herbert and Mariane Yaldiz, etc.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 Berlin State Museum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of Art, 1982.
- Howard, Angela F. "Liang Patronage of Buddhist Art in the Gansu Corridor during the Fourth Centu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entral Asian Style." 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的宗教藝術與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 235-275。
- Hsu, Eileen Hsiang-ling. "Visualization Meditation and the Siwei Icon in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Artibus Asiae*, vol. 62 (2002), pp. 5-32.

- Huntington, John C. "The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of The 'Tan Yao' Caves at Yungang." *Oriental Art*, vol.32 , no.2 (Summer 1986), pp. 142-160.
- Huntington, Susan L. and John C. Huntington. *The Art of Ancient India*. New York & Tokyo: Weatherhill, Inc., 1985.
- Ingholt, Harald. *Gandharan Art in Pakist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Inc., 1947.
- Kim, Inchang. *The Future Buddha Maitreya*. New Delhi: D. K. Printworld Publishers Ltd., 1997.
- Lee, Yu-Min.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83.
- Leidy, Denise Patry and Donna Strahan. *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New Haven and Londo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Sasaguchi, Rei. "The Image of the Contemplating Bodhisattva in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 Sirén, Osvald.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Bangkok: SDI Publications, 1998 (reprint).
- Soper, Alexander C. *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 Ascona, Switzerland: Artibus Asiae Publishers, 1959.
- Soper, Alexander C.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Bronzes*.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66.
- Wagner, Max. "Ikonographie de chinesischen Maitreya." *Ostasiatische Zeischriff*. vol. 15 (1929), pp. 156-178, 216-229, 252-270.
- Watt, James C. Y. etc.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New York & New Have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Wong, Dorothy C. "Maitreya Buddha Statu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rientation*, vol. 32, no.2 (February 2001), pp. 24-31.
- Wong, Dorothy C. *Chinese Steles: Pre-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4.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Imagery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Lee Yu-min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Maitreya cult spread in China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Maitreya sculptures were produced at this time featuring complex imagery. This study takes a regional approach to these images using the methods of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Along with the inscriptions on sculptur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y offer a means to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magery,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origins and circul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Maitreya imagery, and religious contents related to the cult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uddhism originated in India,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early Chinese Maitreya imagery. By the middle and lat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Maitreya cult reached a peak. Not only were many sculptures produced, their imagery underwent considerable change, among them appearing many Maitreya images with Chinese innovation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Maitreya imagery circulating in various regions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demonstrate not only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but also east and west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 Finally,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according to the placement of Maitreya sculptures, iconographic features, the names of images and prayers mentioned in inscriptions, etc., although the Maitreya cult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consisted of two aspects, that is, descending to Ketumati with the Maitreya Buddha and ascending to Tuṣita Heaven to meet the Maitreya Bodhisattva, the goal of the two actually reveals no differentiation, for they reach the same end only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Keywords: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outhern Dynasties, Northern Dynasties, Maitreya cult, Maitreya imagery, regional study



圖1 彌勒菩薩坐像 西秦建弘元年(420)
甘肅永靖炳靈寺第169窟 北壁
採自《甘肅石窟藝術——壁畫編》頁125



圖2 彌勒菩薩坐像 貴霜王朝 三世紀 犍陀羅
美國巴塞迪那諾頓賽門美術館藏 作者自攝



圖3 彌勒菩薩說法圖 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第38窟 入口上方
採自《新疆の壁畫》上冊圖85



圖4 石塔 北涼 甘肅省武威市博物館藏
採自《北涼石塔研究》圖2



圖5 白雙豎塔 北涼緣禾三年（434）
甘肅酒泉文殊山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作者自攝



圖5A 白雙豎塔（局部） 作者自攝



圖6 高善穆塔 北涼承玄元年（428）
甘肅酒泉文殊山出土 甘肅省博物館藏
採自 *Ordinary Images*, fig. 3.13



圖6A 高善穆塔（局部）
採自 *Ordinary Images*, fig. 3.16



圖7 交腳彌勒菩薩坐像 北涼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275窟 西壁
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圖11



圖8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北壁 北涼
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圖12



圖9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南壁 北涼
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圖15



圖10 彌勒菩薩坐像 北涼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275窟 北壁上層
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圖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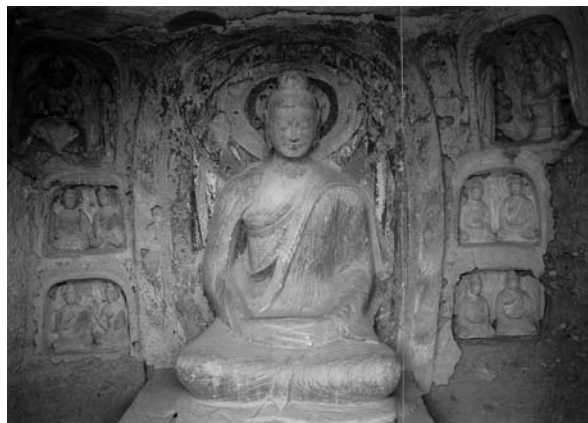


圖11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第148窟正壁 北魏中期
採自《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圖33



圖12 彌勒菩薩坐像 北魏中期
甘肅肅南金塔寺石窟西窟 中心柱
中心塔柱西向面中層 孫志軍攝



圖13 彌勒佛坐像 北魏中期
甘肅肅南金塔寺石窟西窟 中心柱
中心塔柱南向面中層 孫志軍攝



圖14 彌勒佛坐像 北魏中期
甘肅肅南金塔寺石窟西窟 中心柱
中心塔柱東向面中層 孫志軍攝



圖15 彌勒菩薩坐像 北魏永平二年（509）
甘肅慶陽北石窟寺第165窟 入口南側
作者自攝



圖16 王令猥造像碑碑陰 北周建德二年（573）
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出土
甘肅省博物館藏
採自《甘肅佛教石刻造像》圖222



圖17 彌勒菩薩立像 晉代 三至四世紀
陝西三原出土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
採自《世界美術大全集：三國南北朝》
圖254



圖18 彌勒菩薩立像 貴霜王朝 二至三世紀
犍陀羅 法國巴黎居美美術館藏
採自《シルクロード大美術展Grand
Exhibition of Silkroad Buddhist Art》圖錄5



圖19 彌勒菩薩龕像 北魏早期 陝西西安西郊出土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採自《長安佛韻——
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54



圖20 彌勒菩薩坐像 神平三年（530）
陝西西安西關機場工地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作者自攝



圖21 清信士京□□造彌勒佛坐像
北魏皇興五年（471）
陝西興平縣出土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採自《長安佛韻——西安碑林佛教造像
藝術》頁46



圖22 劉保生造彌勒佛坐像
北魏景明年間（500-503）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採自《長安佛韻——西安碑林佛教造像
藝術》頁51



圖23 佛碑像 北魏晚期 陝西西安西關出土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作者自攝



圖24 彌勒菩薩倚坐像龕 北魏正始元年（504）
法國巴黎居美美術館藏 作者自攝



圖25 徐安洛四面造像碑碑側（局部）
北魏景明二年（501）
陝西西安北郊崗家村出土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採自《長安佛韻——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3



圖26 郭伏安造彌勒坐像龕
北魏延昌二年（513）
陝西長武出土 陝西長武縣博物館藏
採自《文物》2006年1期封3



圖27 朱輔伯造像碑 北魏建明二年（531）
陝西華縣瓜坡出土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採自《長安佛韻——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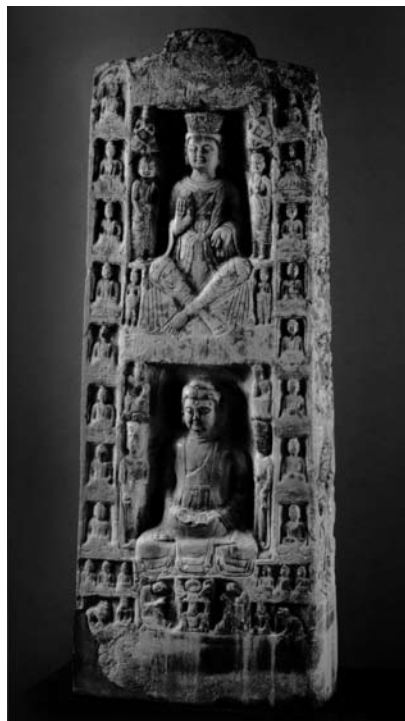


圖28 釋迦彌勒四面像 北周天和年間（566-572）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採自《長安佛韻——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31



圖29 四面造像碑 北周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採自《長安佛韻——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
頁36



圖30 荔非氏造四面像 北周 陝西碑林博物館藏
採自《長安佛韻——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
頁34



圖31 彌勒菩薩坐像龕 北魏早期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18窟
南壁下層 採自《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二）》圖174



圖32 彌勒菩薩坐像龕 北魏中期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9窟 前室北壁
採自《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二）》圖10



圖33 惠定造釋迦多寶彌勒龕像
北魏太和十三年（489）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17窟 明窗東側
採自《雲岡石窟》第12冊圖12



圖34 彌勒菩薩說法圖 新疆克孜爾石窟第17窟 入口上方
採自《新疆の壁畫：キジル千佛洞》上冊圖54



圖35 彌勒菩薩坐像龕 北魏中期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11窟 東壁第三層
採自《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二)》圖91



圖36 正壁龕 北魏中期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8窟 北壁
採自《雲岡石窟》第5冊圖29



圖37 正壁龕 北魏中期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7窟 北壁
John C. Huntington提供



圖37A 彌勒菩薩坐像龕 北魏中期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7窟 北壁上層龕
採自《雲岡石窟》第4冊圖28



圖38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12窟前室東壁
北魏中期 筆者自攝



圖39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12窟前室西壁
北魏中期 筆者自攝



圖40 四面像 北魏晚期（500-534） 山西沁縣
南涅水村出土 山西長治南涅水石刻館藏
筆者自攝



圖41 彌勒佛立像 北魏太和十年（486）
原在山西五臺山碧山寺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筆者自攝



圖42 佛碑像（局部） 北齊天保七年（556） 山西博物院藏
筆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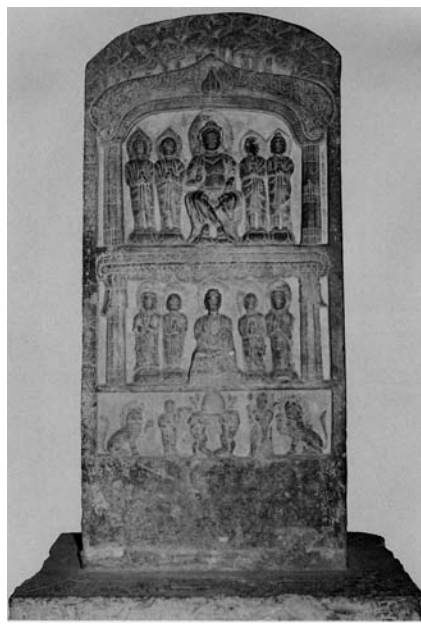


圖43 佛碑像 西魏末至北周
原在山西新絳南天王廟內
山西博物院藏 採自《中国仏教
雕刻史論》圖322a



圖44 彌勒菩薩坐像 西魏大統十七年（551）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藏
採自《中国仏教雕刻史論》圖313b



圖45 彌勒佛坐像 北周 山西博物院藏
採自《中国仏教雕刻史論》圖355b



圖46 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造彌勒菩薩龕像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
河南龍門石窟古陽洞 北壁
採自《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圖156



圖47 彌勒菩薩坐像 北魏晚期
河南偃師小灣村出土
河南洛陽古代藝術館藏
採自《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北魏圖錄7



圖48 彌勒菩薩龕 北魏孝昌三年(527)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皇甫公洞 南壁
採自《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圖188



圖49 庖脰造像碑碑側 北魏正光二年(521)
河南鄭州市西崗村紅石坡寺院遺址出土
河南鄭州市博物館藏
採自《河南石刻造像》北魏圖錄13



圖50 蔣伯仙造彌勒佛立像 北魏孝昌三年（527） 原在河南延津東北四十里蔣村區清寺
採自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vol. 2, pl. 152



圖51 佛像台座 北齊 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藏 作者自攝



圖52 張伏惠造像碑（局部） 北齊天統四年（568） 河南襄城孫莊村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作者自攝



圖53 高海亮造像碑 北齊天保十年（559）
原在河南襄陽孫莊村石佛寺 河南博物院藏
作者自攝



圖54 劉惠造彌勒佛坐像 北魏泰常五年（420）
河北省隆化縣出土 河北隆化文管所藏
劉建華提供



圖55 耿崇等造彌勒佛立像
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 義大利私人藏
採自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Bronzes*,
fig. 3a



圖56 午猷造彌勒佛龕像 北魏正光五年（524）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採自 *Wisdom Embodied*,
fig. 7a



圖57 張開造彌勒佛坐像 北魏正光二年（521）
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採自《埋もれた中國石仏の研究》圖2



圖58 彌勒菩薩坐像 北魏早期
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河北省博物館藏
採自《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
雕塑》圖78



圖59 張雙臥造彌勒菩薩坐像 北齊天保二年（551）
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採自《你應該知道的200件曲陽造像》圖68



圖60 劉白仁造彌勒菩薩坐像 北齊天保九年（558）
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採自《你應該知道的200件曲陽造像》圖70



圖61 黃海伯夫妻造彌勒佛坐像
北齊天保八年（557）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採自《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398



圖62 僧慶造彌勒菩薩坐像 北齊天保八年（557）
河北滄州博物館藏
採自〈麥積山石窟交脚與半跏思惟菩薩對稱構圖的研究〉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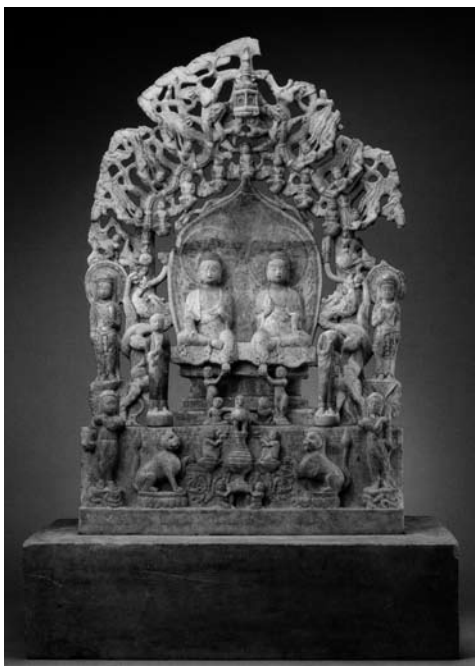


圖63A 建忠寺門徒造彌勒破坐像（正面）
北齊河清元年（562）
河北藁城縣北賈同村出土
河北正定文物保管所藏
採自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catalogue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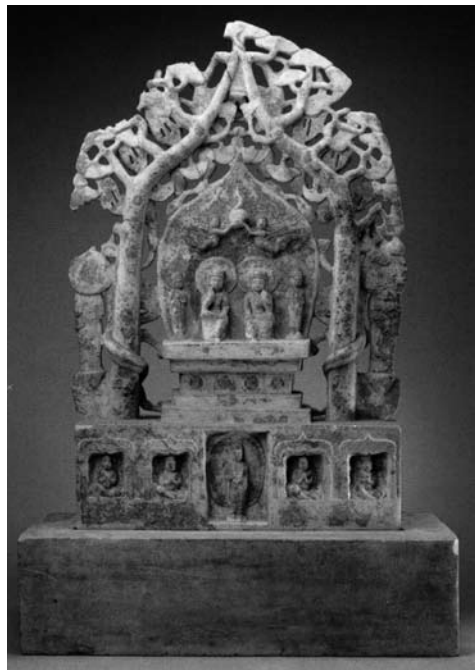


圖63B 建忠寺門徒造彌勒破坐像（背面）
北齊河清元年（562）
河北藁城縣北賈同村出土
河北正定文物保管所藏
採自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catalogue 168



圖64A 彌勒佛坐像（正面） 北齊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採自《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421



圖64B 彌勒佛坐像（背面） 北齊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採自《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422



圖65 劉國之造彌勒佛坐像
劉宋元嘉二十八年（451）
美國華府弗利爾美術館藏 作者自攝



圖66 韓小華造彌勒佛立像 北魏永安二年（529）
山東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 山東青州博物館藏
採自《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圖1



圖67 孔昭係造彌勒菩薩坐像 北齊河清三年（566） 山東博興龍華寺遺址出土
山東博興博物館藏 採自《山東博興銅佛像藝術》圖版51



圖68A 釋玄嵩造彌勒無量壽佛二面像（正面）
蕭齊永明元年（483） 四川茂縣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採自*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catalogue 122



圖68B 釋玄嵩造彌勒和量壽佛二面像（背面）
蕭齊永明元年（483） 四川茂縣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採自*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catalogue 122



圖69A 釋法海造彌勒佛坐像（正面）
蕭齊永明八年（490）
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
四川成都市博物館藏
採自《文物》1998年11期封1



圖69B 釋法海造彌勒佛坐像（背面）
蕭齊永明八年（490）
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
四川成都市博物館藏
採自〈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簡報〉圖6



圖70 成僧造彌勒佛立像 蕭梁大同三年（537）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採自《曲陽白石造像研究》圖25



圖72 三佛造像碑 蕭梁 四川汶川出土
四川汶川文管所藏
採自〈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圖3



圖71 彌勒經變浮雕 蕭梁 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採自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catalogue 126

